

智利祕密行動

政治的、懸疑的、文學的、馬奎斯經典報導文學作品

本書主角是智利著名導演，
流亡海外十二年後，化裝潛回智利，
在風聲鶴唳中，拍攝了暴露戒嚴體制下智利現況的影片。
步步驚魂，幾度陷入絕境。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
以第一人稱詳盡地記錄了這次比電影還驚悚懸疑的行動。

[哥倫比亞]

G·賈西亞·馬奎斯◎著

阮叔梅◎譯



MASTERPIECE

大師名作坊

一九七三年，信仰社會主義的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陸軍總司令皮諾契特所發動的流血政變推翻，阿葉德慘死，智利也開始了長達十六年的軍人獨裁，數萬名社會精英被殺、被捕失蹤、被流放國外。

La aventura de Miguel Littín clandestino en Chile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我名叫密戈爾·立頓(Miguel Littín)，父母為赫南(Hernán)和克莉絲丁娜(Cristina)，職業是導演。我在國外流亡了十二年，如今終於回到家鄉。只不過，我的內心還是在流放之中，因為伴著我回來的，是假身分，假護照，假妻子。藉著化妝及服裝的掩飾，如今即使是熟識的朋友，也不能在大白天裡認出我。

ISBN 957-13-0198-1 (885)



00160



時報出版

AA07

NT\$160

大師名作坊①

智利秘密行動

La aventura de Miguel Littín clandestino en Chile

著者——G·賈西亞·馬奎斯

譯者——阮叔梅

董事長——孫思照

發行人——

社長——莊展信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288和平西路二段二四〇號四F

發行專線——(〇二)三〇六六八四二

讀者免費服務專線(〇八〇)三一一七〇五

(如果您對本書品質與服務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請打這支電話。)

郵撥——〇一〇三八五四〇時報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

電子郵件信箱——ctpc@msl.hinet.net

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tw/ctpub/main.htm>

主編——吳繼文

編輯——高桂萍

校對——林則良

排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版——源耕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華展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一九八〇年九月十日

初版三刷——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日

定價——新台幣一六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八〇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 © 1990 Tuttle-mori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13-0198-1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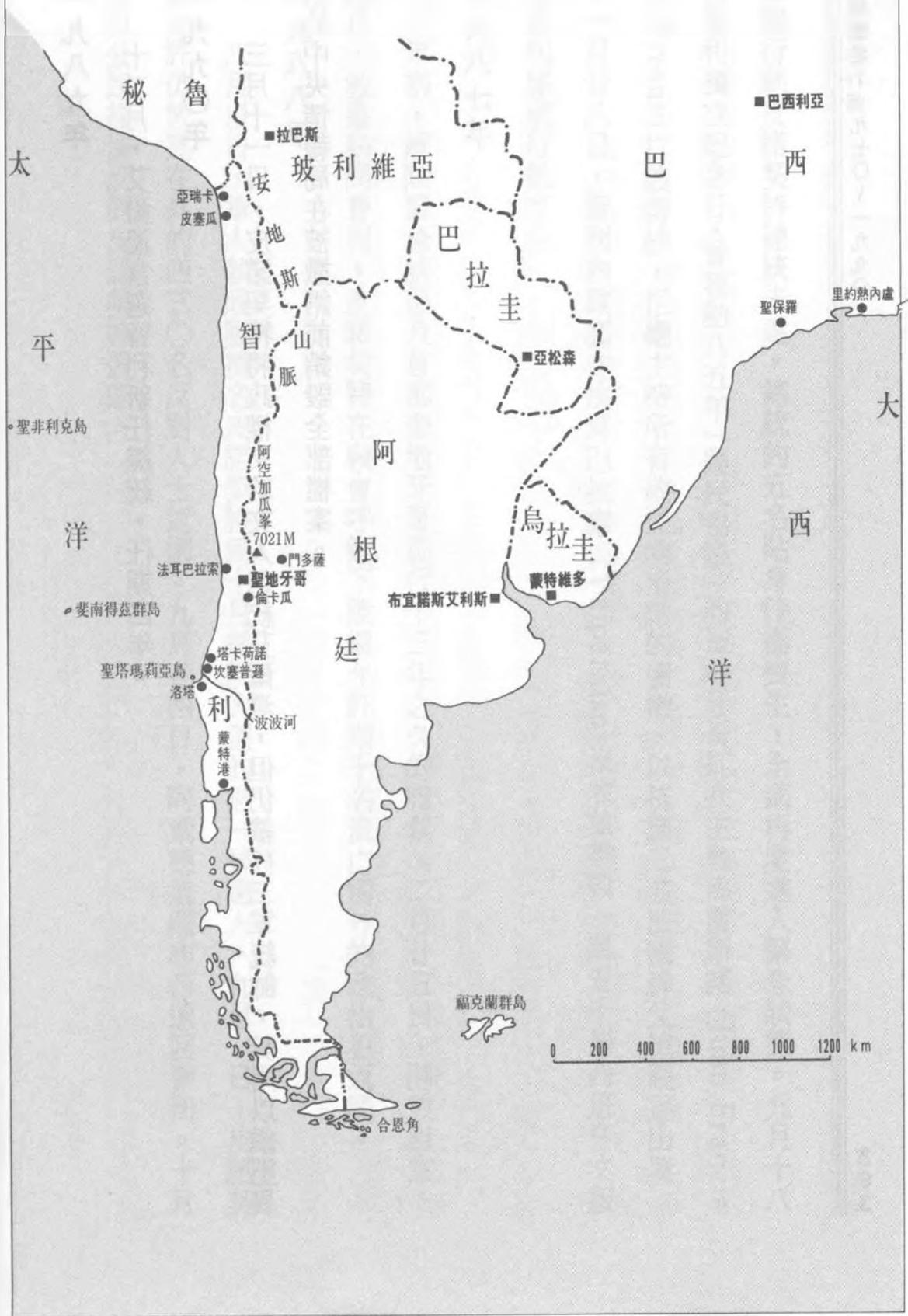
智利秘密行動 / G·賈西亞·馬奎斯著；阮叔梅
譯。 -- 初版。 -- 臺北市：時報文化，1990[
民79]
面；公分。 -- (大師名作坊；7)
譯自：La aventura de Miguel Littin
elandestino en Chile
ISBN 957-13-0198-1(平裝)

885.7357

82000856

〈附錄二〉

本書相關地名示意圖



〈附錄三〉

聖地牙哥市中心略圖



大 師 名 作 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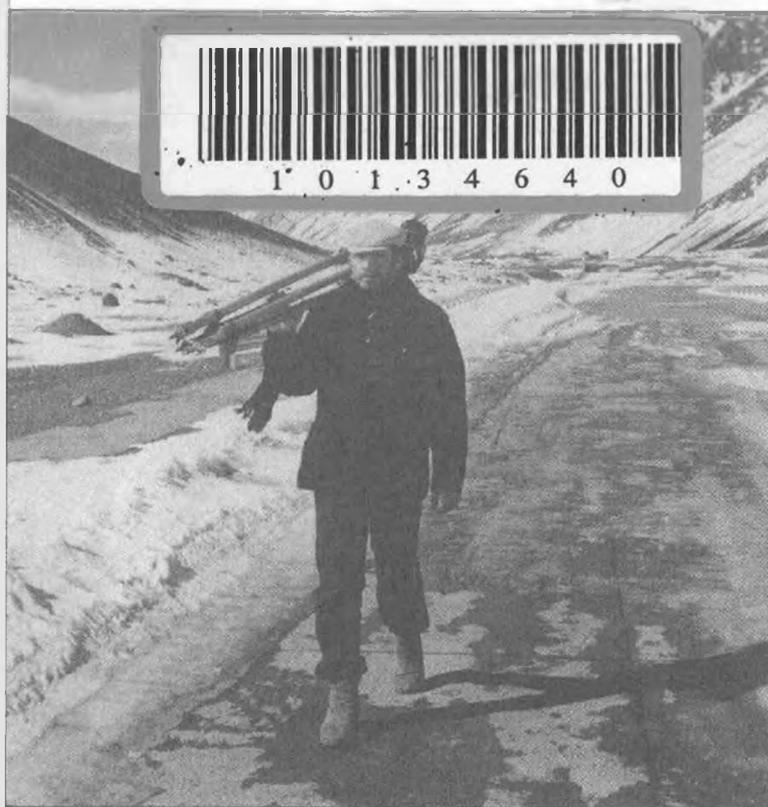
MasterPiece 7

智利秘密行動

G·賈西亞·馬奎斯◎著
阮叔梅◎譯



1 0 1 3 4 6 4 0



ISBN 957-13-0198-1

目次

第一章 密戈爾·立頓潛入智利

改頭換面

「一笑就死定了」

到皮諾契特身上釘一根長長的驢尾巴

第二章 幻想破滅：美侖美奐的城市

我竟是爲此而來？

傷懷之地

永遠難忘的肅靜

第三章 留下的人也在放逐

三條喉管換一個將軍

「恭喜你是烏拉圭人」

留下的人也在放逐

一三

一七

二〇

二五

三二

三六

四一

四五

四九

五二

五七

第四章 聖地牙哥的五個觀光據點

五個據點

我的岳母就在附近

看遍世事的橋梁

六三

六九

七四

七八

第五章 教堂前浴火的人

阿奇維多廣場的永恆之花

在坎塞普遜刮鬍子並不簡單

地獄裡的愛之天堂

海鳥聚居的餐廳

八一

八六

八八

九三

九六

第六章 兩個精神永存的人：阿萊德和聶魯達

兩個精神永存的人

黑人島的土地顫抖不停

「葛瑞西亞順利升天」

一〇一

一〇七

一一〇

一一四

第七章 警方出動：包圍圈在縮小

真正距離：十首波麗露

圓圈逐漸包緊

「喜歡我的屁股嗎？先生」

一一七

一二三

一二八

一三二

第八章 預備，有個將軍願意和盤托出一切

喜歡跳傘的奶奶

一三五

尋找電子將軍的漫長過程

一四一

辨認秘密警察

一四四

第九章 連我母親也認不出我

立頓來了，拍好了，走了。

一五一

「爲國家未來的主人翁照一張吧」

一五七

「你一定是我孩子的朋友」

一六三

第十章 警方獻上的最後慫慂

餐廳裏瘋瘋癲癲的人

一六八

出去或潛伏

一七五

有待完成的故事

一八一

〈附錄一〉智利檔案：一九七〇——一九九〇 吳繼文／輯

一八六

〈附錄二〉本書相關地名示意圖

一九一

〈附錄三〉聖地牙哥市中心略圖

一九七

二〇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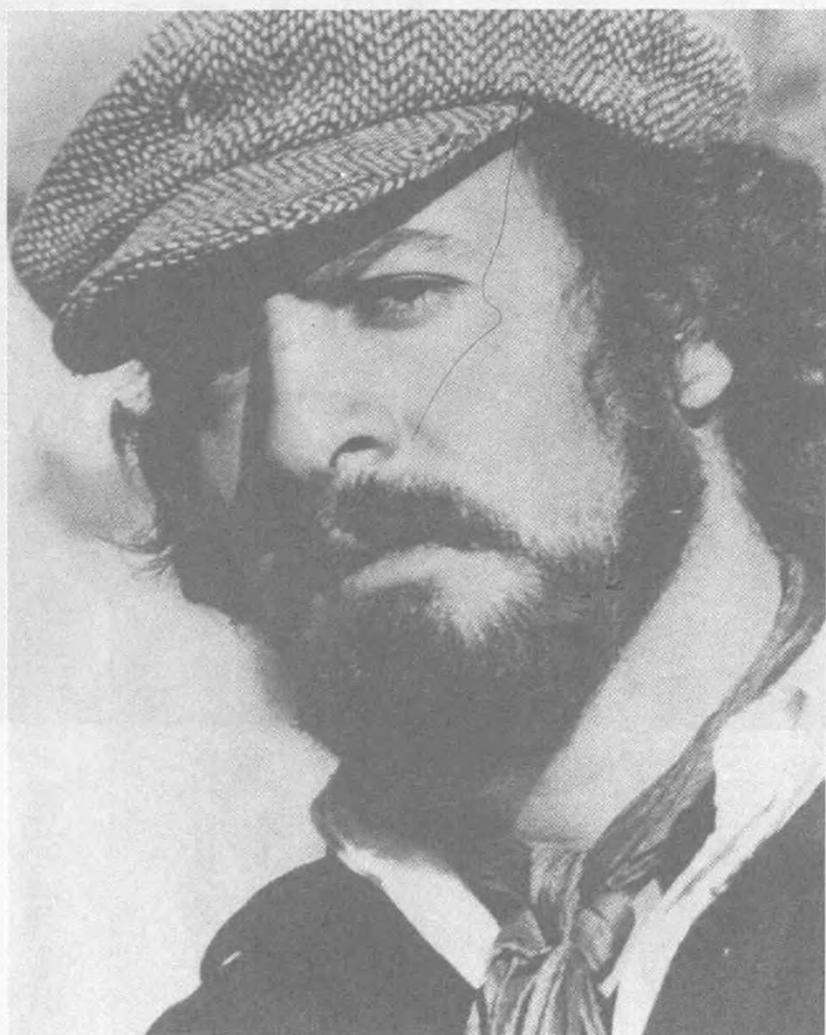
二〇五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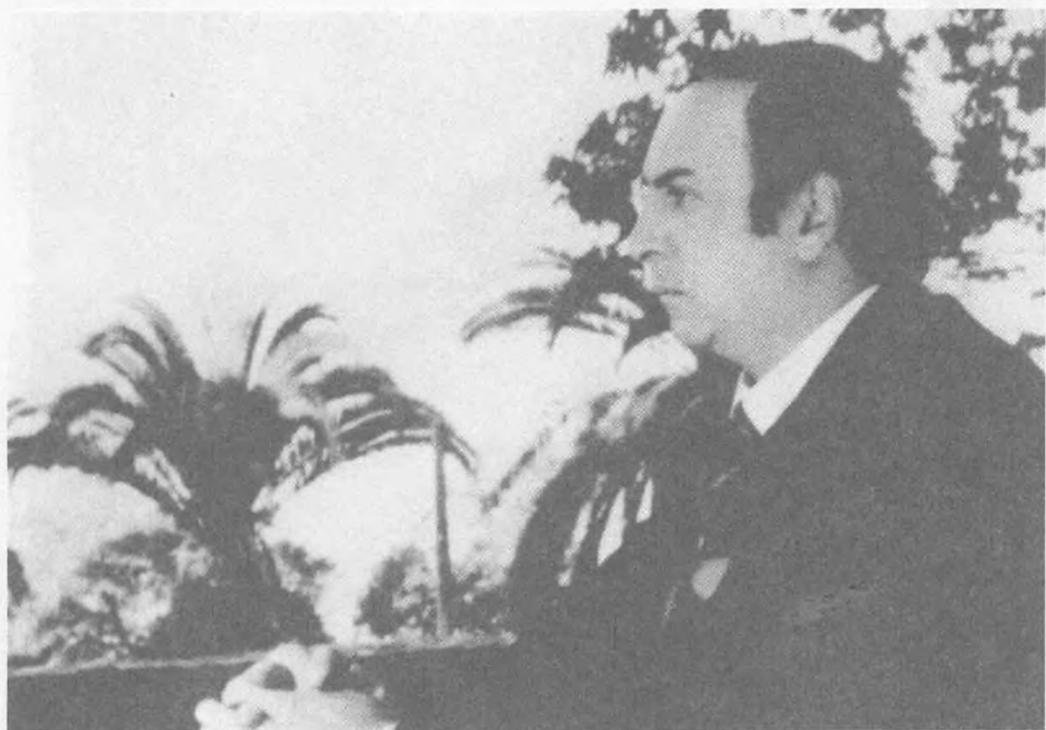
100

第一章

密戈爾·立頓潛入智利



●密戈爾·立頓原來的樣子



● 化粧成烏拉圭商人模樣的密戈爾·立頓

拉第可 (Ladeco) 航空公司一一五班機，從巴拉圭亞松森 (Asunción, Paraguay) 起飛後，比預定時間晚一個小時，就要在聖地牙哥普大宏 (Pudahuel, Santiago) 機場降落。飛機左側可以見到二萬三千呎高的阿空加瓜峰 (Mt. Aconcagua)，映著月色，鋼鐵一樣的矗立著。飛機左翼先微微斜傾，接著在不忍卒聞的金屬駁軌聲裡，生硬的在跑道上蹦跳著降落。我名叫密戈爾·立頓 (Miguel Littin)，父母為赫南 (Hernán) 和克莉絲丁娜 (Cristina)，職業是導演。我在國外流亡了十二年，如今終於回到家鄉。只不過，我的內心還是在流放之中，因為伴著我回來的，是假身分，假護照，假妻子。藉著化妝及服裝的掩飾，如今即使是熟識的朋友，也不能在大白天裡認出我。

只有極少的人知道這個秘密，其中有一個跟我在同一班飛機上，她名叫依蓮娜 (Elena)，長得年輕、漂亮，是個行動論者。她受智利的反抗組織指派，協助我的工作，擔任我與地下組織間的聯絡人，執行秘密通訊，決定適當開會地點，評估拍片環境，安排會面，留意我們的安全。她長居歐洲，可是經常進入智利，執行類似的政治任務。萬一警方發現我，或是說我失蹤了，沒有照約定和其他人連繫，她就會立刻發佈我進入智利的消息，引起國際注意。

我們的證件上並沒有註明彼此爲夫妻，可是我們卻以愛侶姿態，從馬德里(Madrid)起飛，繞過半個地球，陸續進出七個國際機場。不過，到了這段起於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途經巴拉圭的最後行程上，我們決定要分開劃位，以陌生人姿態入境。我們擔心智利機場檢查嚴密，我沒辦法過關，當場就給海關識破。如果當真發生此事，依蓮娜就會單獨入境，通知她所屬的地下組織。如果我們都能順利通關，就會在機場出口碰頭，重新扮做愛侶。

我們來智利執行一件計畫，這計畫聽起來簡單，執行起來卻非常危險。我們打算偷偷拍一部紀錄片，揭露阿古斯特·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將軍獨裁統治十二年後，日益惡化的智利。多年來，我一直想拍這樣一部影片，可是我心裡除了濃郁的鄉愁，根本勾勒不出祖國的具體影像；我記憶中的智利早就不復存在了。對從事電影工作的人而言，重新認識祖國的最好辦法，就是回到她的懷抱，深入她的土地，拍攝一部影片。一九八三年，這個夢想逐漸明晰。當時智利政府開始公佈名單，准許部分流亡的人回國，可是我的名字一直都沒有出現。到了最後，智利政府公佈一分五千人的名單，宣佈這些人仍然不得回國。這次我的名字赫然列於其上，我的夢想也終告破滅。過了兩年，我早就放棄計畫，不再夢想回智利了，

卻又得到機緣，能讓美夢成真。

一九八四年秋天，我和妻子伊莉(Ely)帶著三個孩子住在西班牙聖塞瓦斯坦市(San Sebastian)，我當時正在籌拍一部劇情片。電影開拍前一周，製片突然宣佈片子取消；這種事在電影界是常有的。於是突然間我變得無事可做，這時回智利拍片的想法又開始縈繞我心中。有一晚，在當地一家餐廳吃晚飯，我向幾個朋友提出這想法。聽完後，大伙兒都興味盎然，熱烈的討論起來。大家會發生興趣，一方面固然是基於片子的政治意義，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能到皮諾契特嘴上拔毛，太令人興奮了。興奮歸興奮，卻沒有人認真看待這件事，大家都只當它做流亡之士的清談而已。當晚散會後，古城的街道已然靜謐無聲，走向回家的路上，一整晚幾乎不說話的意大利製片路西諾·巴德欽(Luciano Balducci)，刻意以不經意的態度，握住我的手臂，拉我到一旁。

「你需要的人，」他對我說，「目前在巴黎。」

他說的沒錯。此人在智利反抗組織內身居高位，而且除了少數細節外，他完全同意我的計畫。幾個月後，我們在巴黎碰面。我們約在屋頂花園咖啡館，經由屋裡的熱絡氣氛，以及

巴德欽的積極協調，前後四小時，我的構想就完全勾勒出來了。其實這裡面的每個細節，都是我利用流亡期間，許多無法成眠的夜晚，任思維馳騁，逐步孕育而成的。

我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讓三組攝影人員進入智利：一組意大利，一組法國，一組混合國籍，可是持荷蘭護照。他們的行為必須完全合法，也就是說，他們要持合法證照進智利，事先要申請好拍攝許可，要和本國大使館做好聯繫。意大利組由一位女記者領隊，她假借的名義是拍攝意大利移民的生活，並且宣稱要以拍到賈奎諾·托斯卡(Joaquino Toesca)為第一要務，此人是著名建築師，摩尼達宮(Monedá Palace)的設計人。法國組另有藉口，他們要利用智利的地理環境，拍攝生態影片。剩下的一組則表示對智利近來頻仍的地震感到興趣。沒有一組知道另有兩組存在，也沒有一名組員能在影片竣工前，了解此行真正目的，以及幕後真正的導演。只有每一組的組長例外。身為組長，他們必須具備電影界認可的專業知識，有政治背景，並且了解此行的風險。爲了完成前述事項，我分別到三組所屬的國家，短暫停留，安排事項。我還沒進入智利，三組人員就到了智利，取得了官方許可，備齊了一切證件，準備開拍了。以上所述是全程最簡單的部分。

改頭換面

改頭換面堪稱爲最困難的部分，而且困難程度遠超出我當初的想像。雖然我下定決心，要變成另外一個全然不同性格的人，我的潛意識卻不停反抗，牢牢抓住原本的性格不肯放手，結果每天我都得和自己交戰不休。這麼一來，最難的事情倒不是像大家所想的，學著做另外一個人，而是我自己的心理上、行爲上無意識的排斥。可是我一定要擺脫掉過去的種種習性，變成另外一個人，一個完全不同的人才行。只有這樣，那些壓迫我，逼我離開自己國家的警察，才不會認出我，我要變得讓朋友也認不出來。兩位心理學家，一位電影化妝師，由一位來自智利，專門從事秘密活動的人指導，利用三周不到的時間，創造了奇蹟。他們徹底扭轉我的潛意識，讓我不能再做原來的自己。

他們首先處理我的鬍子。並不是剃一剃鬍子就好了，事情沒那麼簡單。這些鬍子早成了我人格的部分，如今要剃，談何容易，我從年輕時候就留鬍子了，那時我甚至還沒開始拍片。

後來雖然也剃過幾次，卻從來沒有選在拍片期間。換句話說，只要想到我的導演身分，就一定會想到我的鬍子。我的叔叔伯伯們都留有鬍子，這點事實無疑增加鬍子對我的吸引力。幾年前，我住在墨西哥，有一次，我把鬍子剃的乾乾淨淨，結果四周的家人、朋友，沒有一個人能接受我的新面貌，當然更別提我自己了。那時候，每個人見到我都像見到了騙子。但是我就是硬下心腸，連續幾個星期，每天剃鬍子，剃得不留一根鬍渣子。我自認可以因此年輕幾歲，直到有一天，我的小女兒凱特琳娜(Catalina)才點醒了我。

「你不留鬍子比較年輕，」她對我說，「可是也比較醜。」

基於這些因素，我的老師們決定，要一點一點的剃掉我的鬍子。這樣他們才能隨著每一刀，仔細觀察我的外貌及性格，是否出現任何變化。鬍子剃光後，有好幾天時間，我都鼓起勇氣，朝鏡中瞧瞧自己。

接下來就輪到頭髮了。我的母親是希臘裔，父親是巴勒斯坦裔，因此我有一頭烏黑的頭髮。此外，我還由父親那兒，遺傳到早禿的前額。化妝師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染髮，把我的頭髮染成淺褐色。接著，他們嘗試各種不同方式，想要梳一個新髮型，不過他們最後還是

決定順應自然。他們同時也放棄原先構想，不再遮掩我的禿頭，反而想辦法擴大它。他們把頭髮全部往後梳，不僅如此，還用鑷子把稀薄部分拔得精光。

我從來都不知道，僅僅微小的變化，就能讓臉部完全改觀。我的臉一向圓如滿月，即使身體瘦下來時也不例外。可是眉毛尾端拔掉之後，我的臉卻拉長了，整個人也散發出一股東方感。其實只要知道我祖先的背景，對於我的東方感，也就不該覺得奇怪了。

最後一個步驟，是戴隱形眼鏡。開頭幾天，我不習慣，頭疼的不得了。可是習慣之後，我眼睛的形狀，眼部的神情，都出現另一個樣子。另外我也嚴格節食，幾週下來，總共瘦了二十幾磅。到了這兒，外形改造算是大致底定了。

改變外形並不困難，比較困難的是，我必須改造自己成爲另一個經濟階層的人，因此，我隨時都得保持高度的警戒。我不能再穿從前的皮夾克、牛仔褲，要改穿英國西裝，訂做襯衫、小牛皮鞋，手繪圖案的意大利領帶。我不能再操直率的智利鄉下口音，要有烏拉圭富人階層的腔調；我們認爲烏拉圭是掩飾我身分的最佳國籍。我要學會不同的笑法，發出不同的笑聲，要氣定神閒的走路，要不時以手勢加強說話語氣。總之，我不再是電影導演，不能再

那麼隨興，那麼自在，我必須變成我自己最討厭的人：衣履光鮮的資產階級。

「一笑就死定了」

我一邊忙著學做另一個人，一邊就和依蓮娜搬往巴黎，共同住進一間十六世紀的房子裡。房子不是我的，在這次之前我甚至沒有住過類似的房子。但是我卻必須利用這段時間，在裡面製造足夠將來採用的回憶，以免日後發生紕漏。那段經歷真是非常奇怪。依蓮娜很迷人沒錯，跟她在一起，誰都可以感覺到這點，但是，我卻沒辦法勉強自己跟她一塊。專家選中她，隨時看著我，不讓我任意做隨興的事，乃是基於她過去豐富的經驗，以及她的政治背景。但是，電影導演出身的我，可是一點也不感激這種善意的桎梏。直到影片順利拍完，我才發現，自己從來沒有合理對待過她。我一直在潛意識裡，以她喬裝改扮後的模樣，做為評判她的依據，卻不曾想到，我需要偽裝，她當然也不會例外。如今回想那段日子，也堪稱現代婚姻的最佳寫照：一個屋頂下兩個人，兩個人都不想跟對方在同一個屋頂下過日子。

依蓮娜的身分沒有問題。過去十五年來，她雖然從未在智利長住，拿的依然是智利護照。

此外，她未遭流放，沒有在警方通緝名單上，由她來掩護，自然是最理想不過了。依蓮娜曾經到過不同國家，執行重要政治任務，這次能有機會潛回自己的國家，拍一部影片，也讓她覺得神往不已。我的問題就比較多一點。我要假扮烏拉主人；我們認為在技術層面上，這是最適合的國籍；我也要表現出一種跟自己本性相悖的性格，更要以一個全然陌生的國度為背景，捏造一段過去的生活。儘管如此，限定期限還沒到，我就能在聽到化名的刹那，立即反應過來。我也能夠回答有關蒙特維多市(Matevideo)所有最細微的問題。我知道回家的公車路線，我知道發生在第十一中學同學之間的鮮人逸事。我還知道這個學校旁邊兩條街，有一家很有名的雜貨店，旁邊一條街有一家新開張的超級商店。唯一我必須銘記在心，不能做的事，就是大笑。我的笑聲很特殊，只要一笑，別人就會識破偽裝，知道是我。爲了讓我牢記此點，負責偽裝的人沈下聲調，特別警告我：「只要大笑，你就死定了。」還好，沒有人會懷疑，板著臉的商場大亨有什麼不妥。

就在我接受改造的時候，出現了一件意外：皮諾契特宣佈了新的管制條例。芝加哥學派受智利政府委託，在智利推行自由經濟制度，結果卻一敗塗地。隨之而來的是經濟紊亂，以

及反抗組織大團結。這是反抗組織首次結合在一起，凝聚的力量不容忽視，連社會上最進步的中產階級，也加入各個合法或不合法的反抗組織，共同進行為時一天的總罷工。這次行動展現了人民的力量和決心，也觸怒了皮諾契特，結果就公佈了新的管制條例。

「如果情況一直不改善，九月十一日事件必然重演。」皮諾契特恐嚇道，明顯的暗諷一九七三年的九月十一日，他在經濟混亂中，顛覆薩維多·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政府。就拍片而言，新法規對我們有利，畢竟我們不是只想拍一些表面的東西。可是，戒嚴之後，我們周遭的監視會更嚴密，鎮壓會更殘暴，因為宵禁的關係，工作時數也會大幅縮短。反抗組織內部的人衡量過利弊得失，決定計畫照舊。我們仍然在預定日啓程。

到皮諾契特身上釘一根長長的驢尾巴

我回到馬德里，預備出發，卻遇到首次的考驗。過去幾周，我一直努力著要變成另外一個人，也一直沒有和伊莉及三個孩子碰面。當時大家一致認為，我不需要把此行透露給家人，免得臨行時，場面不勝唏噓。起先我們以為，我的家人不知道這件事，對每個人都有好處。後來我們才發現，並不盡然如此，最起碼，沒有人能代替伊莉，做個最好的後盾。她也是現成理想人選，能夠來往馬德里和巴黎之間，巴黎與羅馬，甚至布宜諾斯艾利斯之間，接運我運出智利的片子。而在必要的時候，她還能設法籌到款項。

我回到馬德里做一些最後準備，孩子們逐漸發現我變了。凱特琳娜在我房間發現新衣服，都不是我慣常穿的，她非常的不安，也非常的好奇，我別無選擇，只有集合孩子，把事情全盤說出。他們聽著，臉上有欣喜也有一絲參與感，彷彿我們又像平常一樣，坐在一起杜撰電影故事，一時間都溶入其中了。後來他們到機場送行，見我一身烏拉圭富人裝扮，才更加領

悟，這部電影不僅真實，而且危險。不過他們仍然一致表示支持，還要我代他們玩一個遊戲。「千萬別忘了。」他們說，「到皮諾契特身上釘一根長長的驢子尾巴。」那是我們玩過的遊戲，蒙上眼睛的孩子必須把尾巴釘到紙驢子上。

「沒問題，」算算預計拍攝的膠卷長度，我答應下來，「那條尾巴會有兩萬呎長。」

一星期後，我和依蓮娜順利到達聖地牙哥。途中我們特別經過七個歐洲城市，好讓我適應新的身分。我護照上的姓名及資料都是真實的，是一位烏拉圭人所提供，他知道我們需要護照，就提供出來做政治奉獻。我們僅只取下他的照片，代以我偽裝後的照片。舉凡我的襯衫上，公事包上，文具用品上，都印有護照主人的姓名，或是名字縮寫。我練習了幾小時後，也能夠非常順暢的簽出他的名字。遺憾的是，我們時間不夠，沒有申請信用卡。這是蠻嚴重的疏忽，以我偽裝的身分而言，動輒掏出現金購買機票，並不是合理的事。

我跟依蓮娜之間衝突不斷，換做真正的夫妻，早就分手了，但是我們卻強裝幸福，像一對不懼衝擊的儼人。我們必須共同構思，捏造屬於兩人的回憶，其中有趣事，有糗事，有各自的嗜好，也有共同的品味。我們把所有資料放入腦中，一一儲存。我們兢兢業業，絲毫不

敢疏忽自己的任務。我當時曾想，即使有人分開訊問我們兩個人，得到的答案大概也是大同小異的。我們杜撰的故事大致如下：我們是導演，任職廣告公司，我的總公司在巴黎，來這兒是拍攝香水促銷廣告，以備明秋歐洲播放。選擇智利做拍攝背景，是因為這裡隨時可見四季不同的氣候，既有熱帶沙灘，又有冰天雪地。依蓮娜穿戴上昂貴的歐洲服飾後，流露出一種自信幹練的風情，跟她在巴黎的時候，簡直判若兩人。那時候她披散著長髮，穿格子襯衫，一臉無邪的表情，活脫脫是個女學生。而我，也終究在一個偶然機會裡，習慣了自己的商賈面貌。有一天，我經過商店櫥窗，看到鏡子裡自己的倒影，那時候，巴黎的房子離我老遠，指導員也離我老遠，然而鏡子裡的人，卻完完全全是另外一個人。「真是奇怪，」我心裡在想，「如果我不是我，一定就是這個人。」當時，我身邊除了一本翻爛了的小說，沒有任何東西屬於原本的那個自己。小說是阿利喬·卡本堤耳(Alejo Carpentier)的名著《消失的足音》(The Lost Steps)。過去十五年來，只要出門旅行，我的行李中一定有這本書，唯有如此，我對飛行的恐懼才得稍減。不過這一次，除了飛行的恐懼，我還得進出各國國際機場，不斷承受折磨，希望早些剷除我心中對於假護照的緊張與不安。

第一次通關是在日內瓦。雖然最後一切順利，那次嚴酷的考驗，卻讓我永遠難忘。移民官非常仔細的檢查護照，幾乎到了一頁一頁翻的地步。翻完後，他拿著護照上的照片，比對我的臉，我舉目向他回視，心裡太過緊張，連呼吸都摒住了。第二次經歷這種頭暈目眩、心跳不已的感覺，是飛機降落聖地牙哥機場的時候。經過十二年，我終於又呼吸到安地斯山脈的清新空氣。機場大廈的正面，懸掛著一個巨大的標語牌：智利在安定、和平中求進步。我看看手錶，還不到一小時，宵禁就要開始了。



第二章

幻想破滅： 美侖美奐的城市



● 走在聖地牙哥街頭的密戈爾·立頓



● 在聖地牙哥街頭向學生示威隊伍射擊的國家警備隊員
(一九八四年)

美英由城市

移民官員檢查護照時，如果直視我的雙眼，必然會揭穿我偽裝的秘密。機場內共有三處檢查檯，各自駐有穿制服的男性檢查官，我向最年輕的一位走去，他的速度似乎最快。依蓮娜排在另一排人裡面，我們裝做互不認識，這樣萬一有人出了意外，另一個人還可以出去聯繫。結果我們發現自己太多慮了，移民官跟旅客一樣，也不想撞上宵禁，他們幾乎不看旅客的證件。由於烏拉圭不用簽證，輪到我時，他連翻都不翻，直接打開第一頁蓋上入境戳印。把護照遞還給我的時候，他深深注視我的雙眼。頓然間，我只覺背脊發涼。

「謝謝。」我鎮定的說。

「歡迎光臨智利。」他回答，同時咧嘴而笑。

行李很快傳送到，現代都市裡，很少再見到這麼快的速度了。我先拿我的箱子，然後依蓮娜的。我們先前協議過，由我拿行李出境，節省一些時間。我拿著行李走向檢查檯，那兒的檢查官對宵禁似乎也憂心忡忡，他們不停催促旅客，並沒有仔細檢查行李。我把行李放上檢查檯，他問我：「一個人？」

我答是。他草草看一眼兩隻箱子，揮手要我過去。就在這時候，我背後響起叫聲：「那個人要檢查。」是一名女官員，穿著雙排扣制服，髮色金黃，體格健壯。我一直不知道她在旁邊，直到她叫住了我，我才想到，待會該怎麼解釋一箱子的女人衣服。我不相信，她會單爲了我的行李，把我獨自從旅客行列中叫出。眼看男檢查官在撥弄我的衣服，她取過護照，仔細核對。我塞了一大塊糖進嘴巴，免得待會回答問題時，烏拉圭口音瀉了底。男檢查官開始發問了。

「準備在智利待多久，先生？」

「等辦完事情吧。」我含含糊糊的回答。

嘴裡含著糖，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說些什麼。那個人倒不在意，他要我打開另一隻箱子，但是箱子上鎖了。我一籌莫展，只有四處張望，向依蓮娜求救。她還在排隊，等著檢查證件。她的表情鎮定，對眼前的不幸一無所知，情急之下，我決定說出箱子的主人，不管後果如何了。就在這時候，檢查官遞還我的護照，轉身去檢查下一個旅客。我再度回頭，尋找依蓮娜，卻不見她的蹤影。那一刻，我終於明白，我不僅危急的時候缺不了依蓮娜，整個行程都缺不

了她。

不知道怎麼回事，依蓮娜不見了。後來她告訴我，她看到我拿她的箱子，就覺得很冒險，直到見我離開海關，才鬆了一口氣。一名搬運工幫我推行李。穿過近乎沒人的候機室，我感到回來之後的第一個震撼。

這裡一點都沒有我預期的戒嚴氣氛，也嗅不到一絲貧窮的氣味；到底不是洛斯賽利路（Los Cerrillos）機場，那個地方又空曠，又陰暗。十二年前的十月，我從那裡開始流亡生涯；那天晚上下著雨，我心裡忐忑不安，望著四周，只覺得世界完全幻滅了。我現在是在現代化的普大宏機場。軍事政變前，我只來過這裡一次。我相信不是我的主觀意識在做祟，然而機場裡，的確沒有一點點武裝管制的跡象，當時還實施戒嚴呢！舉目望去，每個角落都乾乾淨淨，燈光也照得清清楚楚，四處還可見鮮明的廣告招牌，寬大的商店裡滿是進口商品，甚至連為摸不清方向的旅客服務的駐衛人員，都不見一個。機場外，破舊的計程車不見了，由新出廠的日本車取而代之，所有車子整齊的排了一列。

我知道還沒到下結論的時候，我把行李堆進計程車。宵禁迫在眉睫了，依蓮娜仍然不見

蹤影。現在我必須面對一個問題：我們早就約好，如果有人不慎耽擱，另外一個人一定要繼續行程。但是我不想先離開，因為我們沒有約好當晚住那個旅館。雖然我在入境單填上「康奎斯泰達(El Conquistador)旅館」，但也並不表示我們就要住那兒。我填那個旅館，完全是因為那是商人最喜歡投宿的地方，況且意大利組也住在那裡，只是我不確定依蓮娜是否也知道這點。

心中焦慮，加上夜氣陰寒，我不住的顫抖。就在我準備放棄的時候，依蓮娜朝著我跑來，後面還有一個平民模樣的人，手拿深色外套，跟著她跑。我呆立當地，預備面對不幸。那人追上依蓮娜，遞上她忘在海關的雨衣。那名女官員不僅盤察我，也留住了依蓮娜。她看依蓮娜不帶行李，決定檢查她的手提袋，從證件到化妝品，她檢查的仔仔細細，一樣都不放過。

可是她沒料到，依蓮娜箱子裡，有一台小型電晶體收音機，也可以做為武器。那是我們與國內反抗組織聯繫的唯一管道。我們兩人心情都不好，可是我更生氣，我認為她至少失蹤半小時，她卻堅持只有六分鐘。不過最後我們都鬆了一口氣。計程車司機告訴我們，宵禁要一小時二十分以後才開始，並非我們以為的二十分鐘。原來我們的錶還在里約熱內盧時間，

聖地牙哥應當是十點四十，夜寒正似水呢！

我竟是爲此而來？

車子向市內駛去。愈向前駛，我返鄉的喜悅愈是低落，懷疑不安就愈是高漲。記得從前在通往洛斯賽利路機場的路上，總會見到無數殘破的工廠和破舊的住屋；軍事政變期間，那兒曾遭到殘酷的鎮壓。反觀嶄新的普大宏機場，不僅面對寬敞的高速公路，沿路上還有現代化的照明設備。對我來說，這是不利開端。我深信獨裁會帶來惡果，如今我要親眼目睹這些惡果，如何顯現在街道上，如何深入日常生活，如何影響人民的行爲。我要拍出影片，公諸於世。但是眼前，我卻對這個任務的成功機率產生了懷疑。後來依蓮娜告訴我，過去幾年她也多次回國，可是卻沒有一次像這次，覺得大惑不解。

這不是容易解開的謎，相對於我在國外的聽聞，聖地牙哥竟是如此的亮麗。令人崇敬的紀念碑閃閃發亮，街道井然有序，纖塵不染。街上的警察也少得可憐，大不同於紐約、巴黎等都會。伯納度·歐赫金大道(Bernardo O'Higgins Boulevard)以中央車站——這個車站歷

史悠久，設計人也設計了巴黎艾菲爾鐵塔——為起點，無限延伸於我們眼前，像條銀河閃閃發亮。我甚至覺得，人行道上縹縹渺渺的行人，也少了從前的那股喪氣，那股窮困。驀地，摩尼達宮浮現路旁，像個幽靈，望之令人生厭。我最後一次見到這建築，是軍事政變未期，那時整個房子燒的只剩殼子，如今重建好了，座落在法國花園裡，簡直就是童話宮殿再現。

我們逐一校閱市內著名的建築：聯合俱樂部，那是本地富賈政要聚集之地，他們在此進行政治角力；窗內一片漆黑的大學；國家圖書館華麗的宮殿建築；巴黎百貨公司。依蓮娜坐在我旁邊，努力說服司機，要他送我們去康奎斯泰達旅館。司機堅持去另一個地方，顯然是爲了佣金的緣故。爲了避免疑竇，依蓮娜說得很技巧；聖地牙哥的計程車司機有許多是警方線民。我坐在一邊，精神恍惚，幫不了什麼忙。

車子進入市中心後，我決定轉移注意力，不再沈溺在物質成就上。獨裁政權不就是用這些假象，粉飾成千上萬遭到殺戮、受到流放、失蹤不見的人嗎？我開始留心街上的人。也許是宵禁逼近的關係，他們走路速度很快，沒有人交談，沒有瀏覽四周。同時沒有人做手勢，沒有人笑，沒有人有表情，讓人知道內心感覺。夜幕之中，每個人都像在陌生的城市裡，孤

獨無依。每一張臉都是空白的，沒有表情，連恐懼都沒。我的心情不一樣了，外面的引誘太大，我一定要下車，我要跟人群在一起。依蓮娜要我打消念頭，但是她不敢大聲爭辯，她怕司機聽到。我終究克制不住高漲的情緒，我要司機停車，跳了下去，摔上車門。

我忘了宵禁就在眼前，沿著伊斯塔都街(Calle Estado)和赫法諾街(Calle Huérfanos)走下去，走到一個新設的行人徒步區，車輛就在四周川流不息。這種徒步區類似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弗羅里達街(Calle Florida)，羅馬的維坎多第(Via Condotti)，巴黎的波布兒廣場(Place de Beaubourg)，墨西哥市的羅沙區(Zona Rosa)。很顯然，這是獨裁政府的另一項德政。徒步區設有長凳，可以休息聊天，漂亮的花器裡有修剪得宜的花草，還有柔和的燈光四處投射。儘管做的這麼漂亮，真象仍然掩不住洩露了出來。只有街角處看得到人在交談，他們聲調微弱，避免獨裁政府的爪牙竊聽。一大堆小孩子，混雜在攤販裡面，向人乞討。不過最醒目的，還是出售偏方的福音傳道人，他們賣永恆的快樂。我向前走，轉入赫法諾街，突然間，我見到第一個警察。有一名武裝警察在人行道上，沿街踱步，附近崗哨亭裡還有幾位。我覺得胃部開始抽冷，兩膝也禁不住發軟，同時心裡又氣自己不中用，僅僅見到武裝

警察，就怕成這副德性。不過很快我就發現，從他們注視路人的焦灼情形看來，他們也很緊張。這點倒是令人略感安慰。他們緊張是有原因的，幾天前，地下組織才把同一區內一座崗哨亭，炸了個粉碎。

傷懷之地

現在進入我從前的活動範圍了。電視台就在這兒，廣電大樓也在附近，兩者都是我開始電影事業的地方。戲劇學院也在這一帶；十七歲那年，我從家鄉來參加入學考試，決定了一生的方向。一九七〇年那次聯合執政大遊行，人群就是在這裡匯集，支持阿葉德。我也在這裡度過最慘綠、最好批判的歲月。我走過電影院，我在裡面首次接觸到經典之作，其中最難忘的要屬「廣島之戀」(Hiroshima, Mon Amour)。就在這時候，有個人從我旁邊走過，嘴裡哼著帕布羅·米拉尼(Pablo Milanes)的歌：我要回聖地牙哥，走上鮮血染過的街道。我忽然忘了偽裝，變成原本的自己。我心裡有一股衝動，想說出自己的身分，叫出自己的名字，讓全世界知道，我有權利回家。

我流著淚回到旅館，正好趕在宵禁前一剎。旅館大門剛關上，服務人員不得不讓我進去。依蓮娜幫我們兩人都辦好了登記，我進房間時，她正忙著架收音機天線。她看來平靜，可是

才看到我，就立刻變成標準的妻子，大罵了我一頓。在她想來，一個人冒險上街，直到宵禁前幾分鐘才回來，是沒有道理的事。我沒有心情爭辯，只好也做個標準丈夫，捧上門出去。我跑去找意大利組員，他們也住這飯店。

我往下走兩層，輕敲一扇房門，準備說出冗長的暗語。兩個月前我在羅馬就跟領隊約好了。裡面傳出睡意矇矓的聲音：「誰呀？」

「加百列(Gabriel)。」我答。

「然後呢？」

「大天使。」

「聖喬治和聖馬可嗎？」

我說得愈多，她的口氣愈不信任。真是奇怪，我們在意大利有過長談，她應該聽得出我的聲音呀。我連大天使都說出來了，她居然還要繼續下面的暗語。

「沙克。」她說道。

那是在聖塞瓦斯坦原本要拍的片子的主角，我接著說出姓氏。

「尼古拉斯。」

到了這兒，葛瑞西亞(Grazia)仍不滿意。她是個記者，大風大浪的任務經歷過幾次。

我終於了解，她想從頭到尾，把暗語全部說完。但是這種對話太奇怪，我擔心附近的房客會聽到。

「總共幾尺影片？」

「別扯了，讓我進去。」我忍不住低吼。

她絲毫不為所動。往後幾天，我進一步見識到她那無時不在的幹勁。除非說完暗語，她是不會開門的。

「他媽的！」我喃喃自語道，腦海中同時浮現出依蓮娜和艾莉的影像。「全都一個德性。」我繼續回答她的盤察，低聲下氣的態度，正是我生平最厭惡的小丈夫模樣。最後一個問題答完，房門大開，當門就站著葛瑞西亞，年輕、迷人，跟我們在意大利見面時沒有兩樣。她瞪著我看，活像見了鬼，然後當著我面關上房門。後來她才解釋道：「你很像我認識的一個人，可是我一下子想不起來是誰。」我知道她的意思。她認識的密戈爾·立頓不是中規中矩的人，

那個人穿著隨便、留著鬍子、不戴眼鏡。反觀眼前這個男人，禿頭、近視、鬍子剃得乾乾淨淨，穿得像銀行家。

我對她說：「讓我進去，別擔心，我是密戈爾沒錯。」

儘管盤察過老半天了，進去後，她還是不放心，一直盯著我瞧。她打開收音機，轉到最大聲，這樣才能蓋住我們的談話，不讓人竊聽。她看起來很鎮定。一個星期以前，她和另外三個組員就到了，透過大使館，他們也取得了拍片需要的證件。他們甚至開始工作了，還拍到「蝴蝶夫人」演出當時政府要員觀賞的鏡頭。這場演出由意國大使館贊助，也邀請了皮諾契特將軍，只是臨到演出，他才表示不能前來。意大利組能夠進去這麼重要的場合，表示官方認可了他們的行動，從此他們隨意在街上取景拍攝，都不會遭受懷疑了。這時候，他們也遞上了申請書，準備進摩尼達宮拍攝。葛瑞西亞向我保證，一定會順利申請到證件。

聽到這些消息，我覺得興奮極了，真想立刻開始拍攝。要不是實施宵禁，我真的可能要葛瑞西亞叫醒組員，拍攝當晚我們到達的情形。當時我們決定，隔天一早就出去拍片，而且組員們事先都不能知道行程，也不能知道我是真正的導演，而非葛瑞西亞。至於葛瑞西亞，

自然也不知道另外還有兩組人員了。我們正忙著排行程，電話鈴聲突然響起，我們兩人都跳了起來。葛瑞西亞抓起話筒，沒說幾句就掛了。原來有房客向櫃檯反應，要我們把收音機關小聲點。

永遠難忘的肅靜

這一天，也真夠我受的了。回到房間，依蓮娜睡得正熟。她在我的床頭几上留了一盞燈未熄。我無聲無息更衣上床，等我放鬆四肢，閉上雙眼，才感覺到四周嚇人的靜。宵禁之下，整個城市一片死寂，聽不到一點聲響。既聽不到滴水的聲音，也聽不到依蓮娜的呼吸，更聽不到我身體運作的聲音。

心情緊張，加上睡不著覺，我下床走到窗前，向下眺望空曠的城市，設法吸一點街上新鮮的空氣。然而此刻的聖地牙哥，流露出的卻是前所未有的孤寂和落寞。我們的房間在五樓，正對一條小巷，小巷兩邊是沾滿煤灰的牆壁，透過灰濛濛的迷霧，僅見得到若隱若現的天空。我一點都不覺得回到自己國家了，只覺得自己像馬叟·卡奈(Marcel Carné)拍的那些老電影裡面，被逼到死角的囚犯。

十二年前，一天早上七點鐘，一名陸軍士官朝我頭上放過一陣機槍後，命我加入一群人

犯，朝我工作的地方，智利電影大樓出發。當時整個城市都在顫動，到處是隆隆炮彈爆炸的回聲，機槍聲，飛機盤旋的聲音。那名士官似乎分不清情勢，還問我怎麼回事。「我們是中立的。」他說。抓到一個我們獨處的空檔，他問道：「你是不是導過『納灰爾托羅的夏卡爾』(Chacal de Nahuatoro)？」

我答稱是，一時間他便忘了一切，再也聽不到子彈聲，轟隆爆炸的聲音，燃燒彈落在摩尼達宮的聲音。只是央求著我，要我解釋，電影裡頭怎麼能讓鮮血汨汨流出，就像真的從死人身上流出來一樣。他聽我解說，聽的入了迷，但是沒一會就回過神來了。

「不准朝後看，」他對著我們大吼，「小心我轟掉你們的腦袋。」

幾分鐘前，要不是我親眼看到那些死人的屍體，任何人告訴我下面的事情，我都是不會相信的。我看到一個人倒在人行道上，渾身浴血，氣如游絲，可是卻沒有人去救助他。我還看到平民模樣的人，拿著棍棒，把阿葉德的支持者活活打死。我更看到一排人犯，背對著牆站立，面前是一小隊做勢要處決他們的軍人。但是押解我們的軍人卻頻頻問我們怎麼回事，並且不停重複：「我們是中立的。」

軍人重重包圍了智利電影大樓，甚至對著入口擺放著機槍。守門員走出來迎接我們，他戴著呢帽，上面有社會黨的徽記。

「啊哈！」他指著我，大叫起來，「他就是立頓先生，這裡的事情都是他負責的。」先前那個士官用力推他一把，推得他跌到地上。「閉嘴，混賬。」他對著他吼道。

士官要我打電話，弄清楚到底怎麼回事。我打了一陣子，但是什麼人都找不到。不斷有軍官進進出出，才傳達下來的命令，不一會兒，就完全倒反過來。先是可以抽煙，然後不能抽煙，先是可以坐下，然後又要全部起立。大約過了半小時，一名士兵進來，拿槍指著我。

「喂，士官，」他說，「外面有位女士找這位先生。」

一定是伊莉了，士官出去見她。原來她是來這兒領我屍體的。混亂之中，有朋友誤傳，說我在電影大樓前給槍決了。這時候，軍人們開始告訴我們，他們一大早就起來了，也沒有吃早飯，也不能接受任何饋贈，他們現在不僅寒冷，而且很餓。我們也幫不了忙，只有把香煙分給他們。

一名少尉隨著士官回來，逐一找出人犯，送往體育場。點到我時，士官搶著回答。

「等一等，少尉，」他說，「跟這個人沒關係。他是來這邊申訴的，幾個鄰居砸了他的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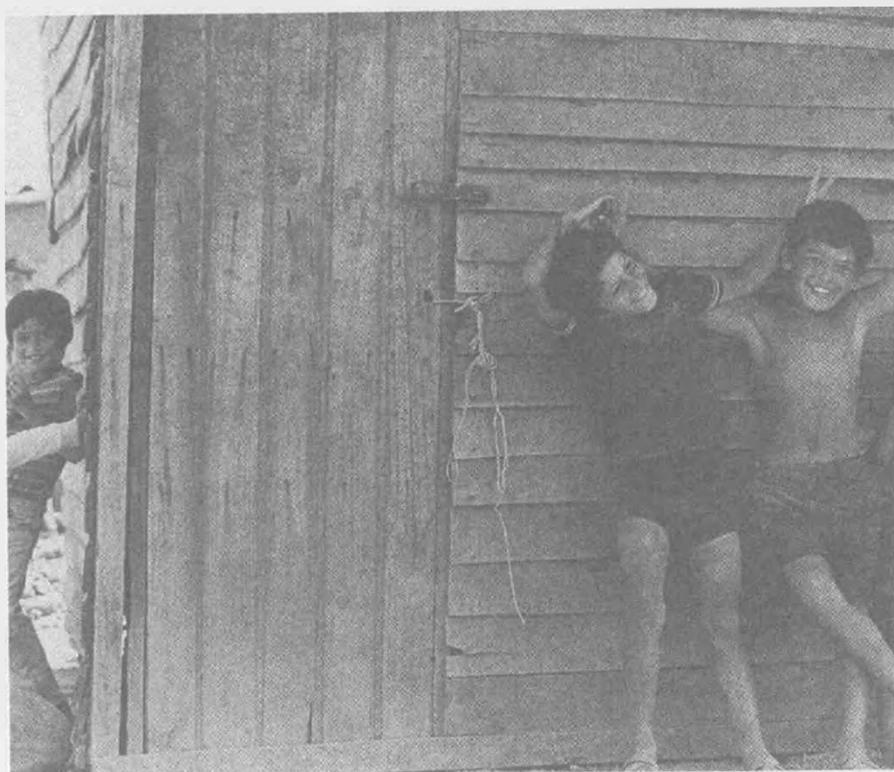
少尉看看我，滿臉不屑。

「人渣。什麼時候了，還有人拿這種事情出來申訴。叫他滾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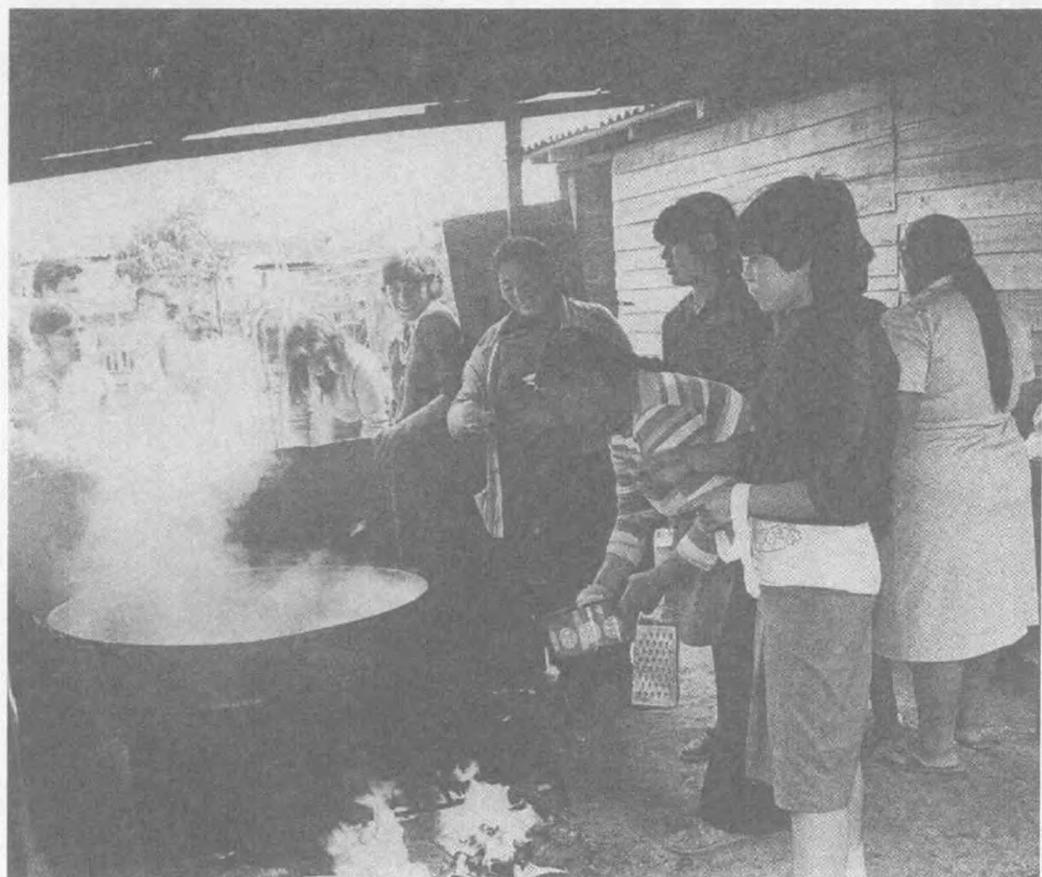
我拔腳向外跑，心中堅信，他們會從背後開槍，然後再給我冠上脫逃的罪名，可是他們沒有開槍。我們家那一帶，許多人家早掛上了旗子，好讓軍方分辨，那些人是支持者。鄰居中有一個女人，把我和伊莉都給告發了。她知道我們跟政府的關係，知道我大力幫助阿葉德競選總統，也知道軍事政變前夕，在我們家召開的會議。所以我們決定不回家。接下來的一個月，我們帶著孩子，還有最簡單的隨身衣物，從一處住所奔波到另一處住所，直到最後走投無路，只有踏上流亡一途。

第三章

留下的人也在放逐



● 聖地牙哥貧民窟的小孩



● 聖地牙哥勞工居住區吃大鍋飯的人們

第二天早上八點鐘，我要依蓮娜撥一個只有我知道的電話，找一個我們暫且名爲弗朗基(Frankie)的人。電話中，依蓮娜表示，她代加百列打這個電話，請弗朗基來康奎斯泰達旅館五〇一室。依蓮娜隨後便出門了，我則繼續躺在床上。半小時不到，有人輕叩房門，我立刻拉過床單，蓋住頭部。弗朗基並不知道要跟誰見面。早先我們協議過，只要是用我的名義打的電話，一定都是我示意的。過去一周，他接過三通加百列的電話，都是攝影組員打的，其中一通還是葛瑞西亞。所以呢，現在他絕對想不到，這通電話真的是我打的。

我還沒上大學，就認識了弗朗基，我剛開始拍片時，也跟他合作過。近年來，我們一起參加過幾次影展，一年前，也在墨西哥見過面。儘管如此，我拉下床單，露出臉孔時，他卻認不出我是誰。直等我爆笑出聲，他才發現真象。從此，我對自己的新面貌，又增添了不少信心。

我在前一年的年底，就吸收了弗朗基，加入攝影工作。他的工作包括：接待攝影人員；給他們初步指示；在依蓮娜工作範圍之外，爲我們安排一切事項。弗朗基沒有不良紀錄，未遭當局起訴，可是軍事政變之後，他卻自我流放到委內瑞拉。這段期間，由於他能自由活動

於這塊土地上，因此曾多次回到智利，執行違法任務。他在電影界人緣很好，加上個性積極，反應敏捷，膽識又夠，使我肯定在這次冒險中，他必能成爲很好的搭檔。照著我們原先計畫好的，一星期前，他走陸路，從秘魯進入智利，然後分別接上三組人員，安排他們如期投入工作。法國組前往北方，已經開始拍了，拍攝的範圍北起亞瑞卡(Arica)，南至法耳巴拉索(Valparaiso)。他們的行程是幾個月前，我跟他們的導演在巴黎商量妥當的。荷蘭組也依樣前往南方。意大利組待在聖地牙哥，由我執導，同時肩負任務，拍攝無法預知的突發狀況。我們給三組人員指示：只要沒有危險，不會引起懷疑，就盡可能的和民衆談論阿葉德。我們認爲，要知道智利人對國家當前的看法，對將來的期望，這位爲國殉道的總統是最好的話引子。

弗朗基有每一組人員的日程表，隨時都能跟他們聯繫，傳達我的指示，他同時假扮我的司機，駕駛租來的車子。每隔三、四天，我們就換一家租車公司。綜觀全程，我們幾乎沒有分開過。

三條喉管換一個將軍

我們在早上九點動工。這時的南方秋天，只殘存微弱的陽光，映照在阿瑪斯廣場上(Plaza de Armas)，分外的迷人。意大利攝影師迅速架好機器，拍攝早晨街道上日常所見的景象：坐在木台階上看報的退休人員，餵鴿子的老人，攤販，速寫畫家，威信為警方眼線的鞋匠，拿著老式相機的照相師，抓著彩色汽球圍在冰淇淋車旁的小孩，走出教堂的人群。廣場一角，守著慣常等在那兒，沒有工作的藝人，他們希望能有私人宴會需要他們。這些人裡面，有知名音樂家、魔術師、小丑、雜耍的人。這是個美麗的早晨，廣場四周可見全副武裝的警察站崗，附近貨車頂上，擴音器正大聲傳送流行歌曲。

後來我才知道，街上難得一見警察，是爲了觀光客的緣故。其實主要的地鐵站裡，全天候都有鎮暴部隊駐守，街道旁也隨時停著鎮暴消防車，兩者都是用來對付無日不現的示威遊行的。阿瑪斯廣場是監控最嚴密的地方，這兒是聖地牙哥的神經樞紐，也是教區民主聯盟

(Vicariate of Solidarity)辦公室所在地。教區民主聯盟由哈瑞奎斯(Cardinal Silva Henríquez)領導，所有為民主智利努力的人，都是它的支持者，在道德層面上，它具有很深的影響力。無論是什麼階層的人，只要受了迫害，都會到這個殖民建築前面，充滿陽光的寬大天井上，尋求庇護，覓得支持。任何人只要有需要，都可以在教區民主聯盟得到幫助，政治犯和家屬們對此感受尤深。透過這兒，受到迫害的案件得以提出反訴，各種不合正義公理的事情，也才得以受到反擊。

就在我潛返智利前幾個月，專制政府針對教區民主聯盟做出反撲行動。一九八五年二月底，三名反對派好戰分子遭到綁架，整個事件顯露出的強大力量，很清楚的說出了幕後主使人。教區民主聯盟的幹部，社會學家荷西·馬納爾·巴拉達(José Manuel Parada)在孩子的學校前面，被人當著他孩子的面帶走。當時三條街以內的交通都封鎖了，空中還有軍用直升機在監視。另外兩名活躍分子，也在幾小時內，分別在城裡不同地點遭到逮捕。其中一個是馬納爾·戈瑞諾(Manuel Guerrero)，他是全智利教師工會的主席，另外一個是聖地牙哥·納堤諾(Santiago Nattino)，一位著名的平面藝術家，從來沒有人知道他是政治好戰分子。

隨後的三月二日，震驚全國的事發生了。有人在機場附近，一條荒僻小徑上，發現這三個人的屍體。三個人喉管都斷了，身上都有刑求的痕跡。警政署長兼立法委員凱撒·曼多薩·杜朗(César Mendoza Durán)召開記者會，宣稱這宗三人命案是國內共黨派系鬥爭的結果，幕後還有莫斯科在操縱。可是卻有許多人認為，杜朗將軍就是幕後主使，逼得他不得不辭去政府的職位。從那時候開始，四條通往阿瑪斯廣場的街道之一的龐蒂街(Calle Puente)，就不知給什麼人塗掉，書寫上荷西·馬納爾·巴拉達這個享譽全國的名字了。

「恭喜你是烏拉圭人」

那天早上，我和弗朗基以遊客姿態，慢慢踱入阿瑪斯廣場；空氣裡，仍可嗅到慘案留下的不安氣氛。攝影人員把機器都架好了，正在我和葛瑞西亞前一晚商議好的角度上。我注意到，葛瑞西亞看到了我們。弗朗基隨後走離我身邊，我便依照早先的約定，著手導演。我先沿著舖有圓石的走道走一段路，其間每隔一段距離就停下一陣子，讓葛瑞西亞知道每個鏡頭的長度，然後再沿著原路回來，讓她知道取鏡的角度。雖然我們可以從街上的一些小地方，看出鎮壓的痕跡，我們卻不打算拍攝。我們打算利用這個早晨，全力捕捉日常生活的氣氛，特別是一般人的行為舉止。我發覺自己前一晚的觀察正確：人跟人之間不太說話，大家走路的速度快了許多，對四周圍也不怎麼關心了。智利人的肢體語言一向豐富，那些流亡人士就是這樣。可是那天早上，廣場上的人交談時，卻很少用到手勢，他們似乎很壓抑。我隨意閒逛，遊走人群之間，口袋裡放著一台高敏感度錄音機，隨時收錄片斷的談話。日後整理這段

影片，這些錄音或許會有幫助，說不定我還能依據這些錄音，決定影片的方向。

安排好拍攝角度後，我在廣場上坐下，準備做些札記。我坐的凳子上，刻滿了心形圖案及名字縮寫，看起來像是好幾代戀人的傑作。我身上沒有記事本，只好在吉塔尼(Gitanes)空煙盒上書寫；我從巴黎帶來這些煙，以便應付這陣子需要。接下去的拍片期間，我一直維持這種札記習慣，後來我也從中獲益匪淺，整理出許多資料，供這本書使用。

我一面寫東西，一面注意到坐在旁邊的一個女人，不斷拿眼角打量我。她年約半百，衣著過時，看起來像中下階層，頭上的帽子和鑲有毛皮領的外套都很陳舊了。我想不透她在那兒做什麼，也沒有伴，也不說話。她不像在看什麼地方，連鴿子飛過我們頭上，落到地上啄我們的鞋子，她都沒有反應。稍後她向我解釋，她才做完彌撒，覺得有點冷，想在太陽底下坐幾分鐘，然後搭地鐵回家。當時我假裝看報，卻見她從上到下打量我。也許問題出在我的衣著，這種時間，廣場上難得見到像我這樣的人。我向她笑笑，她問我從那兒來。我伸手進襯衫口袋，神不知鬼不覺按下了錄音開關。

「我是烏拉圭人。」我對她說。

「哦，」她說，「那真要恭喜你了，你的運氣真好。」

我知道她的意思，她在說烏拉圭回復民主選舉的事。她同時說起自己的境遇，語氣中帶著淡淡的哀愁。我假裝心不在焉，希望她會因此多說一些。只可惜我並未如願。不過她還是說了很多，態度也很坦誠。她說到智利失業的問題，也說到缺乏個人自由的情況。其中一點，她提到失業的音樂家、小丑、藝人，說他們的人數不斷在增加。

「看看那些人，」她說，「他們枯立終日，只等差事降臨，我們的國家太饑餓了。」

我只是任她暢談。我在廣場走過一趟後，眼看也過了半個小時，我於是起身告辭，準備回去走第二趟。葛瑞西亞告訴攝影師，不要靠近我取近景，她還告訴攝影師要特別當心，別讓武裝警察注意到我的方向。只不過問題不在那兒，問題出在別的地方。我才真的沒辦法不往武裝警察的方向看，他們似乎有特別的吸引力，教我不能抗拒。

聖地牙哥街頭一向攤販林立，可是此刻攤販之多，卻是前所未見。走進商業中心，隨便什麼角落，都可以看到成列的攤販，他們只是靜靜站著，賣的東西五花八門。攤販人數不僅多，背景更是複雜，他們自己就構成一齣社會劇了。他們裡面有不得行醫的醫師，有窮困的

工程師，有拿著從前穿過的華貴長袍任人殺價，女公爵模樣的婦女。還有無家可歸的孩子，拿著偷來的東西在賣，也有家庭主婦，在家裡烤好麵包，帶出來賣。在這些人裡面，很多人過去是專業人士，可是今天，除了尊嚴，他們什麼都沒有了。他們站在攤位後面，身上穿的還是從前到辦公室上班的衣服。有一次我坐計程車，開車的司機原本是紡織商人，家中很有錢。那天他開了幾小時車子，載我繞過半個城，卻不肯收取分文。

攝影師一邊拍廣場，我一邊就混進人群，錄取片斷對話，留到日後當做聲軌。我同時必須非常小心，不讓這些人日後在銀幕上給認出來。這時葛瑞西亞已換了一個角度，她不停的看着我，我也不時的注意她。她照著我的指引，從最高的建築開始拍攝，再讓鏡頭下移，掠過全部建築，落到邊緣，然後終結於武裝警察。我們希望拍到警察臉上緊張的表情。時間愈近中午，廣場上活動的人愈多，他們就愈緊張。可是沒多久他們就發現了攝影機，也知道自己成了拍攝對象，立刻就要看拍攝許可。我看到葛瑞西亞向警官亮出證件，後者似乎很滿意，我鬆了一口氣，繼續往下走。後來葛瑞西亞告訴我，那名警官要攝影機別照他們，可是經她力爭，表示許可中沒有這一條，對方才不了了之。很顯然，她充分利用了外國人的身分，拒

絕掉一個上級沒有批准的命令。由此可知，我們的確有先見之明，歐洲人到智利拍片確實是較爲方便。

留下的人也在放逐

武裝警察堪稱我的心頭陰影。有好幾次，我故意走過他們身邊，希望找到機會和他們交談。終於有一次，我憑著一股衝動，走向一列巡邏警察，詢問其中一個人，有關市內廣場上一棟殖民建築的問題。在前一年三月的地震中，那棟建築震毀了，當時正在重建。那警察一面回答問題，一面卻看著廣場上的人群，根本不看我。他旁邊的隊友也一樣，只不過他不會時拿眼角，從側面瞟著我看。慢慢的，他注意到我故意問一些很蠢的問題，他失去了耐性，轉過臉正對著我，皺起眉頭怒喝道：「走開。」

可是我解除魔咒了，原本我一看到警察就驚慌失措，現在卻變得非常興奮。我不理會他的命令，反而告訴他一番大道理，說警察有責任幫助外國遊客，滿足他們的好奇心。當時我都忘了，我那口假冒的烏拉圭口音可能會露出破綻。早在我想到之前，那名警察就聽夠了我的演講，要我拿證件給他看。

我想就我整個行程而言，大概沒有一刻像那個時候，受到那麼大的驚嚇。我想到各種敷衍方式：拖延時間，拒絕拿出證件，逃走，只差沒想到遭他們逮捕。我還想到依蓮娜，可是只有天知道當時她人在那裡。我只剩下攝影師這個希望了，他會拍下全部過程，證明他們把我抓走了。我相信弗朗基也在這附近，據我對他的了解，他不會讓我走出他的視線。不過最簡單的辦法，當然還是拿出護照，證明我自己了，我在多少機場都通過了這個考驗。可是我卻擔心他們會搜查我，因為我犯了一個大錯，依舊在裝護照的皮夾裡，放著智利身分證和信用卡，而這些證件上都有我的本名。我猶豫了一下，拿出護照。那警察似乎不肯定該做些什麼，匆匆看一眼照片，就把護照遞還給我了。這時候，他的表情和緩了許多。

「你對這棟建築還有什麼問題？」他問道。

我從肺葉深處，長長吐出一口氣，回答道：「沒什麼，我只是想找個人隨便聊聊而已。」經過這次，我的警察情結就不藥而癒了，我終於也能像合法的智利人，毫無所懼的面對他們，即使面對秘密警察，也不例外；智利的秘密警察為數頗多。有幾次，我甚至跑到他們面前，要他們幫一些忙，他們也都客氣的回應。最明顯的例子，要屬離開智利的那天，我跟

他們之間的一段小插曲了。依蓮娜一直想不通，竟有人爲了克服緊張，故意接近警察。我們之間的關係，原本就摩擦不斷，經過這次，更加快了瓦解的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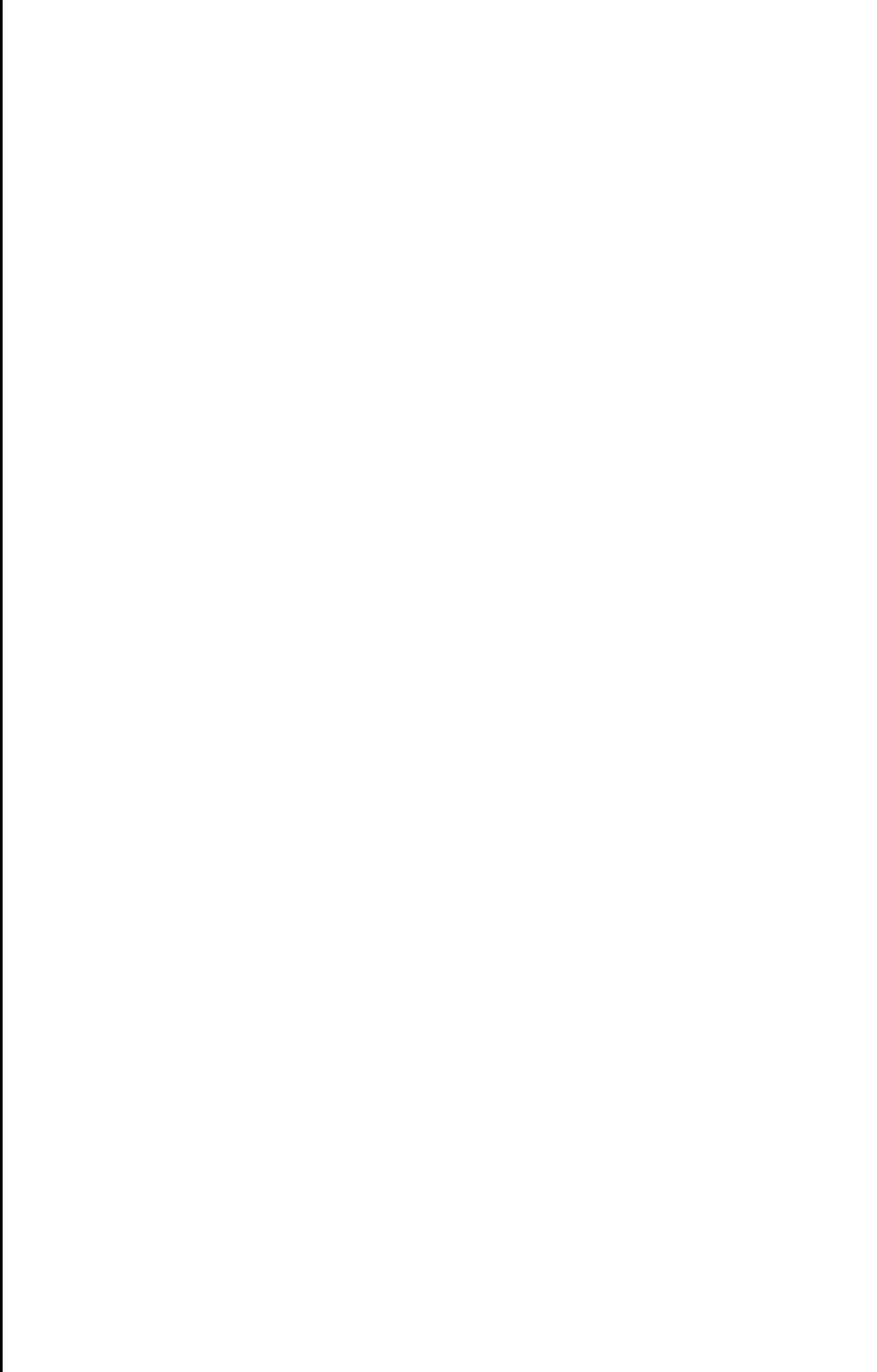
不過有一點我很肯定，早在她責備我之前，甚至於說，早在任何人責備我之前，我就很後悔自己的莽撞了。武裝警察才遞還我護照，我就給葛瑞西亞暗號，要她收工。弗朗基一直在廣場另一頭目擊整個事件，心中緊張不下於我。這時候他衝到我身邊，可是我要他吃過中飯，再來旅館接我，我想一個人靜一靜。

我坐在凳子上看報，眼光逡巡過紙面，卻看不進一個字。在這明麗的秋日上午，我心中百感交集，注意力絲毫不能集中。忽然間，十二點整的砲聲響起，鴿群受驚，紛紛四散飛逃。大教堂的鐘樓開始播放樂曲，是薇莉塔·佩拉(Violeta Parra)最感人的歌：「向生命致敬(Gracias a la Vida)」。我幾乎控制不住激動的情緒，我想到了薇莉塔，想到她在巴黎時，不時挨餓，不時居無定所。我也想到她的自尊——那沒有人動搖得了的自尊。智利政府不讓她回國，還漠視她的歌曲，嘲弄她的叛逆。有一個總統一定得死去；智利人一定得拿起槍桿子，流血犧牲，爲國殉道，爲祖國的歷史寫下最慘烈的一頁；薇莉塔也一定得死在自己的筆

下，而彼時她的國家還不能發現她歌曲蘊含的人性真理，摯美情懷。連警察也陶醉在歌聲裡了，他們自然不知道她是誰，她在表達什麼，她的目的在那裡。如果她也在這個迷人秋天裡的廣場上，一定會鄙視他們無疑的。

我獨自離開廣場，向著市內的一家餐廳走去。我和伊莉戀愛時，常去那兒，餐廳裡景物依舊：桌椅還是放在榆樹底下，一簇簇的鮮花也依舊怒放；只是人事早就全非。裡面半個人也沒有，我等了好久，才有人幫我點菜，等我要的烤肉上桌，時間都過一小時了。我快要用完餐時，進來一對夫妻，是耳尼多(Ernesto)和艾維拉(Elvira)，他們在附近經營一個小店，做些小生意，雕刻念珠、聖骨盆、墓地飾品，他們性好玩樂，有點玩世不恭，曾有幾次夜晚，我們看夜色不惡，一塊兒喝酒、玩樂過，看他們手挽著手，跟從前一樣走了進來，我不免感到意外。這些年來，智利改變的何其多，然而他們對這家餐廳的忠心，卻始終不變。我也對他們的衰老感到驚心，他們就像一面鏡子，毫不留情，照出我的老態。如果他們看到我，一定也會非常驚訝，盯著我瞧。只可惜我做了偽裝，成了烏拉圭人。他們選的桌子離我不遠，我可以聽到他們說話，聲音仍然宏亮，只是少了一些急迫。偶而他們會別過頭看我，投射過

來的目光中，沒有好奇，沒有熟悉感，一點都認不出旁邊這個人從前跟他們同桌共飲過。這一刻，我才體會到，這些年的流放生涯是何等漫長，又何等艱辛。從前，我以為只有我們這些離開的人如此，如今，才知道留在國內的人也不例外。



第四章

聖地牙哥的五個觀光據點



● 舉著有阿塞德照片的標語在聖地牙哥市中心示威的學生
(一九八三年)



● 聖地牙哥的示威者在散發有阿萊德照片的傳單

我們在聖地牙哥連續拍了五天，經過這五天，我們才能了解運作上是否完善。一邊拍片，一邊我也不斷和北方的法國組聯繫，南方的荷蘭組當然也不例外了。在此同時，依蓮娜一直設法聯絡地下組織，找到我們想採訪的人。她的辦事效率很高，讓我陸續採訪到多位領導人，包括少數幾位公開從事政治活動的人。

不能夠做原來的自己，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犧牲。因為我不能會見任何親友，連父母也不能見，更不能重溫過去的生活點滴。至少要等影片竣工了，我才能再百無禁忌。於是，我只有盡力壓抑心裡的感情，很奇怪的在自己的國家裡，過著流放的生活。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還有比這個更痛苦的事情。

我出門的時候，幾乎都有人隨行保護，可是每次我都覺得很孤單。無論走到那裡，我都只能迎接到陌生而且冷漠的目光，其實他們那裡知道，他們都是我認識的人。我只有一個機會，能夠單獨出門，就是和身分極端隱密的人會談的時候；我不能暴露他們的身分，連新朋友也不行。後來，拍過一陣子之後，我得到了很多經驗，等到依蓮娜不能再幫忙了，我也知道怎麼保護自己，沒有出任何差錯。我們拍片完全照計畫進行，我沒有讓任何一位工作伙伴

因爲我的大意而遭到不幸。不過等我們離開智利了，卻有一名負責調度的人員很幽默的對我說：「我們看起來很安全，實際上危險得很。這種境遇，恐怕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最重要的是，第一周還沒結束，我們在聖地牙哥的進度就超前了。我們事前計畫時，特意讓行程富有彈性，這樣我們才能因地制宜，隨時修改。事實上，等我們開始拍攝了，才深切了解這些是唯一可行之道。聖地牙哥根本無法預測，隨時都有驚喜，隨時都能激發我們產生新的點子，這些都不是事先規劃得來的。

我們這時候也換了三家旅館了。康奎斯泰達很舒服，也很方便，只不過住的人太多，想必監視也會很嚴密。至於其他的五星級旅館，也好不到那裡去。每一間旅館都容納了大量外國人，而外國人在智利正是最具嫌疑，最會破壞社會安定的。但是我們又不能搬進二流旅館。雖然警方較少來這些地方查閱房客登記，我們出現在這種地方，卻很容易引起好奇。所以最安全的辦法，就是每隔三、四天搬一次家，而且同一間旅館絕不住兩次。我有一個心結，如果我在一個地方遭遇過危險，就會很害怕再回到這兒來。這點得回溯到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那天空軍轟炸摩尼達宮，市內一片混亂。我跑回電影大樓，想看看是不是有辦法不讓

政變發生。我原本可以安全離開的，可是那時我車上有一群朋友，由於他們都面臨著危險，於是我把他們都送到弗瑞特(Forestal)公園去。送完之後，我卻犯了大錯，又跑回電影大樓。一如前文所述，要不是出現奇蹟，押解我的軍人是影迷，我不可能保全住性命。

在我們待過的旅館裡，有兩間特別啓人疑竇。第一間是喜來登(Sheraton)。我們搬進去的頭一晚，我才睡著，電話突然響起。那天依蓮娜去參加秘密會議，因為會議延長，撞上宵禁，所以沒辦法回來；這種事情前後發生過幾次。我睡的迷迷糊糊，伸手拿起話筒，完全忘了自己身在何處，也忘了偽裝身分。話筒裡傳出帶智利腔的英語，一個女人指名找我，說的是我的假名。我正想說沒這個人，卻猛然驚醒，我想起眼前的時間、地點，可是怎麼說，都不該有這樣的電話呀。

那人是旅館總機，她要我接一通長途電話。可是除了弗朗基和依蓮娜，沒有人知道我的住處。他們不會這麼晚找我，還要假借長途電話的名義，除非發生了生死攸關的大事。我決定接電話。話筒裡傳出女人興奮的聲音，她說的是英文，一疊聲的喊我「親愛的」、「甜心」、「蜜糖」。我好不容易才讓她相信，我不懂英文，她於是嘆口氣，嬌滴滴的罵道：「狗屎。」

並掛斷電話。我沒有找總機理論，那是浪費時間，她只會告訴我，另外有兩個房客跟我同名同姓。我再也睡不著覺。第二天一早七點，依蓮娜回來後，我們立刻搬到別家旅館。

第二次出事，是我們搬出坎瑞拉(Carrera)旅館之後。那家旅館很有名，站在房間窗口，可以遙見整個摩尼達宮。就在我們結帳之後沒幾天，一對年輕夫婦搬進我們原來房間的隔壁，在房裡架起照相用的三角架，並在上面放一枚火箭炮，對準皮諾契特的辦公室。無論就構想或技術而言，這件計畫都堪稱一流，火箭發射時，皮諾契特也在辦公室裡。只是三角架支撐不住發射震動，垮掉了，炸彈就爆在房間裡。

五個據點

到了第二周的星期五，我跟弗朗基決定在隔天離開聖地牙哥，開車去內陸。我們在聖地牙哥只剩兩部分未拍，一個是摩尼達宮，一個是反對組織領袖。想要訪問反對組織領袖不是容易的事，依蓮娜卻安排得相當妥當。至於摩尼達宮，許可是下來了，只是證件還要等一周才能到我們手上，這麼一來，我跟弗朗基就有了足夠時間，拍攝內地的影片。考慮過這些情況後，我們打電話給法國組，要他們拍完北邊部分後，立刻回到聖地牙哥。至於荷蘭組，就繼續往南，一直拍到蒙特港(Puerto Montt)，然後等待我們進一步的指示。我自己則和意大利組一起工作。

我們打算利用那個星期五，拍下我在街頭的情形，以免獨裁政府日後否認，說片子不是我回智利拍的。我們選了五個地點，都是聖地牙哥最具特色的地方，包括：摩尼達宮外面，弗瑞斯特公園，麻波強(Mapocho)橋，聖克里斯托伯(San Cristóbal)山，聖方濟各(San

Francisco)教堂。按照計畫，我們每個地方最多只待兩小時，因此總共合計為十小時。幾天
前葛瑞西亞就研究過每個場景，也構想好攝影機的角度了。屆時，我會比攝影人員晚十五分
鐘到達，若無其事的走進去，向葛瑞西亞發出訊號，要她開始拍攝。

摩尼達宮處在廣場區中間，整棟建築有兩個主要面，一面向著臨近布耳尼斯廣場(Plaza
Bulnes)的林蔭大道，一面向著坎斯特得遜廣場(Plaza de la Constitución)。政變期間，
摩尼達宮幾乎全毀，辦公室只好全部遷走，搬到原為聯合國貿易發展委員會的大樓內。由於
急於取得合法性，軍事政府以唐·迪亞哥·波特耳(Diego Portales)為大樓命名，他是智利
的自由之父。過了三年，摩尼達宮重建完成，他們才遷回去。摩尼達宮不只地上重建，地下
也建了一個堡壘，那裡有配備精良武器的暗室，秘密通道，緊急出口，出口並可直達林蔭
大道下面的停車場。聖地牙哥流傳著一種說法：皮諾契特雖然自稱合法，可是因為他從未在
公開場合，配戴歐赫金(O'Higgins)的總統肩帶，所以地位就大打折扣了。自從摩尼達宮大轟
炸，這個智利總統即位不可缺的肩帶，就一直不知去向。會有個親近獨裁的人寫了一篇報導，
說軍隊佔領大樓後，領隊的軍官就從火焰中救出肩帶了。只是說歸說，從來就沒有事實證明

得了。

早上九點不到，意大利組就拍好了摩尼達宮向著林蔭大道的一面。那前面是一個紀念碑，紀念智利國父伯納度·歐赫金，碑前有由丙烷燃燒，永遠不滅的「自由火焰」。接著他們便移往另一面，拍攝衛兵交接儀式。表演交接的衛兵，都是武裝警察中的菁英，也是皇宮衛隊中，最傑出的一支隊伍。四周圍觀的人潮雖略遜於白金漢宮，表演的精采度卻不在其下。相對的，廣場上這一帶的警戒也森嚴得多。意大利組才準備開拍，立刻就有警衛衝過來，要他們出示許可證；他們拍另一面時也同樣要出示證件。其實，只要我們拿起攝影機，不論置身市內那個角落，一定會有警察過來，要看我們的許可證。

我就在這時候到達。我們的攝影師名叫雨果（Hugo），他是個親切而認真的青年，對於拍片期間的冒險充滿興趣，好奇得像日本觀光客。這時他架好了機器，正一手展示證件，一手拍下不知情的武裝警察。弗朗基在四條街之外就讓我下了車，我們約好，十五分鐘之後，到下車地點四條街之外碰面。那天早上很冷，還有薄霧，是典型的聖地牙哥秋天早上。我穿了冬天的大衣，還是禁不住顫抖。我踩著碎步，快走在匆促的人群之間，希望保持體溫。走過了

四條街，我又繼續多走兩條，好讓攝影人員有足夠時間，展示他們的證件。等我轉身回頭，他們便拍下我走過摩尼達宮的鏡頭；一切都很順利。十五分鐘過後，攝影人員收拾好機器，前往下面一個地點，我則走向弗朗基的車子。他把車子停在雷奎利(Riquelme)街，正對著洛赫羅斯(Los Héroes)地鐵站。我們朝著下個目標緩緩駛去。

我們花在弗瑞斯特公園的時間，不若預計般長。可是因為我拂不去心底的愁緒，結果便在那兒盤桓良久，不忍離去，公園裡景色優美，深具特色，尤其到了秋天的早晨，滿天的黃葉會像雨點一樣，陣陣的落下；那天早上就是這樣。美術學院也在公園裡。當年我由家鄉來此，幾個月後，便是在學院的石階上，完成了第一部戲劇作品。過了幾年，我變成初出茅蘆的導演，幾乎每天都要從公園走過。每當夜色降臨，月光會在樹葉上映出柔和光輝；這些光輝也永遠映進了我的頭幾部電影。我漫步樹林之間，四周是陣陣落葉，綿綿細雨，攝影師都一一攝進了鏡頭。離開公園後，我繼續往下走到商業中心，弗朗基在那兒等我。

天氣還是很冷，可是轉晴了，遠處山脈的輪廓清晰浮現。這是我回聖地牙哥以後，第一次見到這些山脈。聖地牙哥處在群山之間，是山谷地形，在這兒，通常只能透過污染了的空

氣，遙見迷濛的山脈。我們到達伊斯塔都(Estado)街時，距離正午還有一小時，街上人潮洶湧，人群正走入電影院，準備看第一場電影。離我不遠的雷克斯(Rex)戲院在演米洛斯·弗曼的阿瑪迪斯(Milos Forman, AMADEUS)，我想看這部電影想瘋了，可是這次我努力克制自己，如約和弗朗基礎面。

我的岳母就在附近

拍片期間，我在街上看到許多認識的人，也看到熟識的記者、藝術家，甚至看到一些政治家，可是他們沒有人看我一眼，露出一點點認識我的表情。星期五傍晚，終於發生了一件早晚都該發生的事。打從大老遠，我就看到一位女士朝著我走來。她的神態優雅，穿著乳白色套裝，沒有加外套。等她離我不到十呎遠了，我才認出來，她是我的岳母莉歐(Leo)。六個月前，我們才在西班牙碰面，而且我們一向相熟，如今離得這麼近，她不可能認不出我。我想到轉過身去，可是有人警告過我，絕對不能這麼做，這麼做只會讓人認出背影，反而更危險。我信任我的岳母，我相信，就算她認出我了，也不會大驚小怪的。問題是，她不是單獨一個人，她姊姊米娜(Mina)跟她在一起，而米娜姨也認識我。她們兩個人正低聲交談，近似於竊竊私語。我只擔心她們會有一些突然的舉動，好比說當著街上大聲叫喊：「密戈爾，孩子，你回來了，太好了。」或者其他類似的事情。況且讓她們知道我秘密跑回智利來，對她

們來說，也是很危險的事情。

我別無選擇，只有繼續向前走。我專心看著莉歐，萬一她認出我，我立刻就可以警覺。她走過我身邊，連眼皮都不抬，當然也沒有看到我嚇壞的眼神了。她只是不斷和米娜姨說話，根本對我視若無睹。我們之間距離很小，我可以聞到她身上的香水味，看到她柔和的美麗眼睛，甚至清楚的聽到她的聲音。她低聲說道：「孩子大了問題更多。」然後就走過去了。

前不久，我從馬德里撥電話給她，告訴她這次街頭相遇的事，她嚇了一大跳，表示當時毫不知情。事情發生的太快，我必須趕緊找個地方，調整紊亂的心情。我跑進一家電影院，裡面正在放印度電影，名為「快樂島」，是部徹頭徹尾的色情片。整整十分鐘，我盯著畫面，看著豔陽天下，一群俊男美女在天堂的某處游泳嬉戲。我讓黑暗掩蓋我，慢慢恢復平靜。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前面幾天的日子實在太規則，太安穩了。十一點四十五分，弗朗基在伊斯塔多街和林蔭大道的交口接我上車，開往下一個地點，麻波強橋。

麻波強河貫穿市內，河床上佈滿圓石。河面有幾座鐵橋啣接，造型美觀，結構堅固，具有防震功能。每逢乾季，河水會大減，整條河就成了濕漉漉的泥帶，襯著兩岸殘破的木屋，

星星點點。等雨季一來，急速的水流從山上衝下來，立刻會漫上河岸，形成一片滾滾泥海，只剩點點木屋在裡面載沈載浮。軍事政變後的數月之間，麻波強橋變成惡名昭彰之地。那時候，河面上常常出現浮屍，都是軍隊夜間巡邏，攻擊貧民區的結果。貧民區在智利稱做帕布羅西尼(poblaciones)。如今，這些飢餓的暴民更得和野狗、兀鷹爭食，搶奪從大眾市場傾倒出，流入河裡的殘餘。這幕悲劇是「智利奇蹟」的另一面，贊助人是軍事政府，導演是芝加哥經濟學派。

阿葉德時代結束之前，智利一直是簡樸的國家，即使國內保守的中產階級，也視其儉樸為一大美德。等軍事政府上台，爲了很快創造出富裕的假象，阿葉德時候國有化的資產，全部都給私有化了，所有具有價值的資產，都賣給了私人企業、跨國公司。這樣就出現了一個結果：市面上充滿了華麗的奢侈品，公共建設盡皆華而不實。於是，一時之間，人人都以爲國家富裕了，經濟繁榮了。

那時候，五年內進口的物資，比過去兩百年還多。那些錢全部來自國家銀行的抵押貸款，至於國家銀行的錢，則來自國營企業私有化。當時美國和國際信貸機構也聯合起來，接手處

理了其餘的事項。不過等付款期限一到，所有的假象立刻就幻滅了。六年的繁榮，只消一年，就煙消雲散。智利的外債當時累積到二二〇億美元，幾乎是阿葉德時代的六倍。只要沿著麻波強河，走一趟大眾市場，就知道浪費掉一九〇億美元，會在社會上造成怎樣的悲慘後果了。所謂的經濟奇蹟，就是讓少數富人更富，其餘的社會大眾更窮。

看遍世事的橋梁

在生與死的嘉年華會上，瑞克里塔(Recolta)橋就像紊亂的愛人，同時接納了市集與墓地。白天，送葬行列穿過人群，從這兒經過。夜晚只要沒有宵禁，這裡是通往探戈俱樂部的唯一通道。俱樂部裡最棒的舞者，到了白天都成了掘墓人。經過這麼多年，那個星期五，我又回到橋上。那天最讓我矚目的一點，就是岸上人數頗多的年輕戀人。他們互以手臂環繞對方，在那兒慢慢踱步，緩緩戀愛，對時間無情的消逝，似乎毫不在意。我只在巴黎見過類似的情形，而且也是多年以前了。在我記憶裡面，聖地牙哥是個相當含蓄的城市。可是如今我卻親眼目睹這一幕，一幕巴黎已不多見，至於世界其他城市，我想是根本無緣再見的畫面。我想起不久前在馬德里聽到的一句話：「愛情在苦難中滋長。」

曾經一度，智利的男人喜歡穿深色西裝，手拿長柄傘，女人則時興追逐歐洲時尚。至於嬰兒車裡的小娃娃，也往往給裝扮得像兔寶寶。直到披頭風掃過，才改變服裝走向，帶來一

股清新的氣息。只不過，那些都是聯合執政之前的事了。接著下來，兩性服裝出現混淆局面。女人把頭髮剪到髮根，穿緊臀、寬褲腿的男褲，男人則長髮披肩。等到獨裁者上台，他們擺出一套假道學，一律不准這些現象存在。年輕人必須自動剪短頭髮，否則碰上巡邏的軍隊，頭髮就會給刺刀整得亂七八糟。軍事政變後的初期，街上常見到這種畫面。

那天佇足麻波強橋，我才體會到年輕一代轉變之劇烈，也才知道，這個城市已屬於我下一代的人了。當年我離鄉時年僅十歲、不識人間的幼童，如今都二十二歲了。薩瓦多·阿葉德時代還在念小學的孩子，也都成了反對組織的領袖。有了這層體會，我既覺高興，又覺喪氣。長時間以來，我首次對自己起了懷疑，我這麼大費周章回到故鄉，真的有必要嗎？

懷疑給了我新的動力，不過首先我仍須完成當天的工作才行。我先匆匆掠過聖克里斯本山，然後再到聖方濟各教堂。夕陽餘暉下，教堂墓碑都覆蓋著一層金色光影。接著我要弗朗基回旅館，帶著我的衣箱，三小時以後到雷克斯戲院接我，我會在那兒看「阿瑪迪斯」。我同時要他轉告依蓮娜，我們兩個人會消失三天，其他的就不用多說了。這麼做自然破壞了我和依蓮娜的約定，按照計畫，她有權利隨時知道我的去向，可是我就是沒辦法克制自己。我和弗

朗基搭上當夜十一點的火車，直奔坎塞普遜（Concepción），要等事情辦完了，我們才會回來。

第五章

教堂前浴火的人



●參加聖地牙哥勞動節集會的七三年政變失蹤者家屬
(一九八四年)



● 在聖地牙哥阿瑪斯廣場抗議出版檢查制度的人羣

雖然我們在一時衝動下展開這趟旅程，但是我們卻神智清明。依我看來，火車應是深入智利內地的最佳工具，一則機場與高速公路都會盤察旅客身分，二則我們正好在火車上利用宵禁的夜間時間。可是弗朗基對火車的安全性卻深表懷疑，他表示當局最爲嚴密監視的就是這種交通公具。我反駁說正因爲如此才最安全，警察絕對想不到，偷渡回國的人竟敢在層層監視下搭乘火車。弗朗基又反駁，其實警方也知道地下人員喜歡搭火車旅行，因爲他們認爲愈是嚴密的監視，愈是安全。他同時堅持認爲，一名來自歐洲，既富有，又饒富經驗，同時還主持重要業務的廣告商，搭乘歐洲的火車還情有可原，搭乘智利內地破舊的火車就不合理了。不過最後他還是聽從我的意見，同意搭飛機。到坎塞普遜可能無法控制行程，畢竟當地大霧經常使飛機無法降落。坦白說，我會偏好搭火車，實則得歸咎無法克服的飛行恐懼症。

我們由中央車站搭上當晚十一點的火車。那是一座鋼骨建構的火車站，正如艾菲爾鐵塔，有一分無法名狀的美麗。等我們將自己安頓在臥車車廂，一間清爽舒適的舖座內後，我才開始覺得饑腸轆轆。在戲院裡，我曾一面看少年莫扎特在奧國皇帝面前表演特技，一面吃了兩塊巧克力當早餐，除此之外，我一直滴水未進。列車長指示我們，車廂中有節餐車，但是按

照規定，臥鋪車廂與餐車之間是封鎖的。他建議我們，不妨在火車開動前登上餐車，盡情飽食之後，待下站再回到我們的臥車。下一站是倫卡瓜(Rancagua)，預定一小時後抵達。我們拚盡全力飛奔下車，耳邊聽到宵禁開始的聲響，身後則有列車長在催促，大聲喊叫：「快點，先生們，快點，這是不合法的。」然而抵達倫卡瓜站之後，凍得半睡半醒的警衛卻絲毫不以我們的行爲爲忤，畢竟我們觸犯的戒嚴令是如此輕微而又不可避免。

這個車站空洞而酷寒，荒涼的被鬼魅般的霧氣包圍著，很像電影中，納粹德國驅逐犯人出境的車站。就在列車長吆喝著要我們上車的同時，突然間，餐車內跑出一名穿著雪白古典款式制服的侍者，如脫兔般像前奔跑，手掌上還穩健的擺著一個盤子，盤中是覆有荷包蛋的米飯。他將盤子遞進最後一節車廂窗內，並在我們回到臥車前，攀爬進餐車。

我們要穿過三百哩路才到坎塞普遜。沿途只覺一片死寂，宵禁的壓迫力，似乎不僅及於夢遊似火車上的乘客，同時也遍於所有大自然中的生物了。我斷斷續續的望向窗外，霧中，只分辨得出空蕩蕩的夜色。唯一足以證明地球上還有人類存在的痕跡，便是鐵路右側綿延不盡的鐵絲網牆，然而牆後什麼都沒有，沒有人，沒有花，沒有動物……空無一物。我思及帕

布洛·聶魯達(Pablo Neruda)的詩句：「麵包、米飯、蘋果，四處漫佈；到了智利，鐵絲網、鐵絲網、鐵絲網。」早上七點，隨著前方土地上依舊一望無際的鐵絲網，我們到達了坎塞普遜。

在決定下一步行動之前，我們認為應該先找個地方刮刮鬍子。其實我是一直很想找個藉口留鬍子的，只是我怕這麼一來，我們會成為警察眼中的流浪漢，而所有智利人都知道，這個城市一向是智利重大社會抗爭的溫床。這裡孕育過七十年代的學生運動，這裡提供了薩瓦多·阿葉德當選所需的決定性支持，這裡也是蓋卜瑞·崗薩里·維德拉(Gabriel González Videla)總統展開一九四六年血腥鎮壓之處。隨後他設立了皮塞瓜(Pisagua)集中營，年輕軍官阿古斯特·皮諾契特就在這個集中營接受訓練，學習恐怖與死亡的藝術。

阿奇維多廣場的永恆之花

我們開車穿過濃密而寒冷的霧氣，前往市中心，並在路上看到教堂前庭上那個孤零零的十字架，以及恆久由知名人士置放的花束，那是兩年前，煤礦工人阿奇維多(Acevedo)引火自焚的地點。由於非法持有武器，他二十二歲的兒子及二十歲的女兒遭到逮捕，為不使兒女繼續受折磨，他費盡心力請人到國家情報中心說項，卻未獲致任何結果。

阿奇維多沒有懇求，他只提出警告。由於大主教當時正外出旅行，他告知主教區的官員、大報社記者、政黨領袖、工商界名人，任何願意聆聽的人，甚至告知政府官員，他告訴每個人同樣一句話：「如果你們不想想辦法，免除我孩子的折磨，我就在身上澆汽油，到教堂前庭引火自焚。」有些人不相信他，有些人不知如何是好。到了預定日，阿奇維多立於前庭上，倒了一整桶汽油上身，他警告街上圍觀的人，只要有人越過黃線一步，他即刻點火。為了阻止自焚，一名警察跨過黃線，阿奇維多立刻變成了一個大火球。

他活了七個小時，神智清醒而且沒有任何痛楚。群眾的憤怒升騰到極點，逼使警方不得不讓他女兒到醫院見他最後一面。但是醫師不答應她見到父親的恐怖身形，只讓他們以答話機交談。「我怎麼知道妳是坎德拉瑞雅(Candelaria)？」阿奇維多聽到她的聲音後詢問，她說出小時候父親時常喚她的乳名。正如父親期望，並以生命的代價換得，這對兄妹走出了酷刑室，按照正常司法程序接受審判。從此以後，坎塞普遜人民便給這塊犧牲之地一個秘密名稱：阿奇維多廣場。

在坎塞普遜刮鬍子並不簡單

清晨七點出現在一個歷史要塞，喬裝成外國商人，但是門面未修，顯然是相當冒險的事。任誰都清楚，現代總裁的公事包內，除了放置小型錄音機以便隨時記錄點子外，必定備有電動刮鬍刀，方便機上、火車，甚至開會前車上使用。即便是如此，星期六早上七點鐘，找個人替我好好的整理門面，應該也不會太冒險吧。於是我走向阿馬斯廣場附近，此刻唯一營業的理髮店，它的門上掛著一個牌子：雙性（UNISEX）。裡面有一名年約二十的女性，正在清掃地面，另一名約略同齡的男子則在排架上的罐子。

「我想要刮鬍子。」我告訴他們。

「我們這裡不做這個。」男子回答。

「那裡有呢？」

「試試過去那邊，那邊有很多理髮店。」

我穿過馬路走向弗朗基，他正在安排租車，身旁還站了兩個警察，在盤察他的身分。他們也看了我的證件，沒有發現問題。不僅如此，弗朗基忙著租車的同時，他們之中一個人還陪我走到另一家剛開門的理髮店，與我道別後握手離去。

它的門上同樣有一塊牌子：雙性。正如同第一家店裡的光景，一名卅五歲左右的女性與一名年輕男子在其內。男子問我有何貴幹，我表示要刮鬍子，結果引來兩人奇異的注視。

「抱歉，先生，我們沒有這項服務。」他說道。

「我們是雙性的。」

「沒錯，」我向他們說：「即使你們是雙性的，但是如果有人要刮鬍子，你們仍然可以幫客人服務，不是嗎？」

「不對，先生，」男子答道，「這裡沒有。」

說完他們轉身不再理我，我只有穿過重重霧氣，繼續走在沒有人跡的街上。坎塞普遜有這麼多雙性理髮店，也著實令人意外，同樣令人意外的是他們政策的一致：沒有一個人願意幫我刮鬍子。走著走著，我迷路了，直到一名擦身而過的男孩問我：「你在找什麼，先生？」

「男士專用而不是雙性的理髮店，就像從前那樣的。」我告訴他。

他帶我到一家理髮店，店門前有紅白相間的迴轉圓柱，裡面擺放老式的旋轉椅。兩名理髮師穿著髒兮兮的圍裙，正在照顧唯一的顧客。一名師傅在剪他的頭髮，另一名則刷掉他臉上、肩上的細屑。走到店裡，可以聞到一股特殊氣味，屬於擦傷藥、薄荷酒精及老式雜貨店的混合；驀然間，我才憬悟，其他店裡缺少的正是這種味道，一種我少年時代的味道。

「我想刮鬍子。」我表示。

兩名師傅及顧各驚奇的瞪著我，蓄鬍子的老人提出了顯然是三人共同存在的問題：「你來自那裡？」

我毫不猶豫的回答：「智利。」但是立刻又更正，「不過我是烏拉圭人。」

沒有人注意到，更正較之原來的錯誤更糟。不過我卻由他們的反應發現，我用來表示「刮鬍子」的字眼，在智利早就過時了，如今人們都用較時新的字彙了。正如這間店裡的人，雙性理髮店裡那些年輕人，聽到我說過時的字也大惑不解，唯一不同的是，眼前的每個人都因我的到來而精神一振，因為我說的，正是從前那些好日子人們慣用的語言。空著手的師傅安

排我坐上他的椅子，熟悉的在我頸上圍上一塊布，並取出一把老舊且略現缺口的剃刀。他看來起碼七十歲，身上滿是風霜刻痕。他的身形高瘦虛弱，頭上全是白髮，臉上覆著至少三天沒刮的鬍渣子。

「您喜歡熱水修面或是冷水？」他問。

他顫抖的手幾乎握不住刀片。

「當然熱水了。」

「如果是這樣，我們就有點麻煩了，先生，」他說，「因為我們這兒沒有熱水，只有冷水。」我走回第一家雙性理髮店，當我用新字眼說出刮鬍子的要求時，立刻受到了接待，只是他們有個附加條件，頭髮必須一併整理。經我同意，這對年輕人才卸下冷漠，展開一長串繁複的儀式。首先，她在我頸上圍一條毛巾，並用冷水為我洗頭，這兒也沒有熱水。然後她問我希望選用那一種敷面劑，三號？四號？還是五號？接下來，他們又建議我採用防止落髮的藥劑。我配合他們，完全遵辦，直到擦乾臉部時，她突然停下來並且自語道：「真奇怪。」我張開眼睛，問她怎麼回事。

她顯然比我更緊張，但又不得不回答：「你的眉毛拔掉了。」

我並不欣賞她的發現，於是決定開她一個最惡劣的玩笑。懶洋洋的看了她一眼，我說：「有什麼不對？難不成妳對同性戀有偏見？」

她搖搖頭，整張臉紅到了髮根。接下來是由理髮師接手。他毫不理會我的細心指示，將頭髮剪得較我希望的短，還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梳理，結果，我就變回原來的密戈爾·立頓了。其實這是合理的，巴黎的美容專家在處理我的頭髮時，原本就逆著我頭髮的生長方向進行，坎塞普遜的理髮師只不過將它們歸順原位而已。因此頭髮會變回原本形狀，也就是從前的樣子，真是最自然不過的事了。但是我卻需要強烈意志，才打消了心中回歸自我的念頭，畢竟在這遙遠而又霧濛濛的城裡，根本沒有人會認得我。理髮之後，年輕女人領我進入店後頭，並且像要進行什麼見不得人的事般畏畏縮縮的，將電動刮鬚刀在鏡子前插好插頭遞給我。還好，不需要用到熱水。

地獄裡的愛之天堂

弗朗基已租好車子，我們於是走到販賣機前準備買早點，可是那兒只有冷咖啡還是沒有熱飲。我們向著洛塔(Lota)及史坎維吉(Schwager)煤礦出發，途中經過智利最湍急的波波(Bio-Bio)河，濃霧掩蓋下，我們幾乎無法見到金屬色澤的夢幻水流。十八世紀時，曾有一名智利人巴得米洛·利洛(Baldmero Lillo)，以細膩的筆觸描述礦工生活及礦場，時至今日，這些描述依然真確。置身礦區，恍若置身百年前的威爾斯(Wales)，無論就煤灰滿溢的空氣或工作條件而言，活生生就是工業革命之前的寫照。

我們必須通過三道檢查站，才能到達目的地，其中以第一道最嚴格，這點我們事先就知道了。因此當警衛問我們爲什麼去洛塔及史坎維吉時，我們真是卯盡了全力。說完之後，我自己都很驚訝，竟可以答得那麼流暢。我們的說辭是：爲了目睹有全美洲最美公園之譽的風景；爲了瞻仰巨大的古南洋杉(araucaria)，爲了奇特的雕像；也爲了圍繞雕像，代表惡兆的

孔雀和黑頸子天鵝。我進一步解釋，我們打算以公園做背景，拍攝香水促銷廣告，這項新產品準備以南洋杉為名，廣告拍成後，除了可對此優雅之地表示尊崇外，並可使此地譽滿全球。

沒有任何智利警察抗拒得了這麼長的解釋，更何況其中還非常誇張的讚美了他國家的天然美景。他們不僅表達出歡迎之意，想必還通知了下一個檢查站，因為他們不再要求我們出示證件，只有行李和車子仍須檢查。唯一引起他們注意的是那架超八釐米攝影機，攝影機其實也非專業所用，可是除非經過特許，礦區內是不准攝影的。我們表示最遠僅會到達雕像與天鵝之處，也就是山頂部分，同時我還刻意以輕鄙口吻做下結論。

「我們對那些窮人是沒有興趣的。」我說。

仔細檢查每件物品後，一名警察看著他處回道：「這裡的每個人都是窮的。」

他們很滿意檢查結果，半個小時後，我們通過位於狹長礦脈尾端的第三座檢查站，到達公園。這是個詭異的公園，由著名葡萄酒商唐·古希諾(Don Matías Cousiño)建立，目的是取悅他心愛的女人。他由智利各處搜集奇特的樹木置放公園之內，參養神話故事中的動物，還豎立代表精神世界的神像，諸如歡樂、悲傷、思鄉、愛情等。公園後面有一座神話宮殿，

立於宮中陽台上，可以遙望太平洋彼岸。

我們整個早上都以超八拍攝，俾便日後攝影組員獲得特許後，能夠據以拍片。我們才開始拍攝，一名警衛就過來，表示不准攝影。我們於是重複一次發行世界促銷廣告的故事，但是他依然堅持遵守命令。也同時提議陪我們去下面的礦區，由我們親自向上級請示。

「我們不會再拍了，」我告訴他，「不過如果你樂意，不妨和我們一塊走走，免得不放心。」他同意了，我們於是和他一塊遊覽公園。他很年輕，長著一張憂鬱面孔。弗朗基不斷和他交談，我則盡可能保持沈默，免得蹙脚的烏拉圭腔洩底。後來，他表示想抽根煙，我們便傾出所有香煙給他。不久他轉身他去，我們方才繼續拍攝所有用得上的畫面，其中有山頂公園，山下風景，也有礦區四周。拍攝時，我必須先建立架構，再決定角度，鏡頭、距離、大公園的遠景，然後轉到下面污穢地區。那是礦工和漁民混居之處，雖然難以想像，但是千真萬確。

海鳥聚居的餐廳

我們下來時已是傍晚，每日開往附近聖塔瑪莉亞(Santa María)島的船隻正要出發。船上可見載滿全家大小的幾戶人家，還有他們的老舊工具、私人物品，和準備烹食的動物；他們正要航過波濤洶湧的深黑海域。煤礦工人在海床底下極深的隧道內工作，那裡面環境惡劣，然而卻有成千的工人身處其內。礦坑外，則有數以百計的男人和女人，帶著他們的小孩，像地鼠一樣挖著隧道入口處的泥土，用他們的指甲掰開散落土中的煤渣子。位於上方的公園，空氣在樹木淨化之後，聞起來清甜而乾淨，而下面，礦工在滿是煤煙的迷霧中呼吸，他們的肺中也滿是煤煙在燃燒。由上而下俯瞰，海水美得離奇，由下面近觀，海水澎湃而洶湧。

這裡是阿葉德的據點之一，一九五八年的「煤礦遊行」就由這兒出發。當時礦工們走過波波河上的大橋，以漆黑而沈默的暴民之姿占據坎塞普遜。他們手中的旗幟飛舞，木牌高舉，強烈的抗爭意願，嚇得政府噤若寒蟬。這次事件由舍喬·布拉瓦(Sergio Bravo)收錄進他的

電影「人民的大旗(Banderas del Pueblo)」中，堪稱智利最動人的紀錄片之一。阿葉德當時也在人群中，我相信他就是由那兒得到人民堅定支持的。不久後，在他當選為總統的一次巡訪中，他來到洛塔廣場，與礦工聊天、交換意見。

當時我也是他的隨員之一，聽過他說的話，我心裡一直感動不已。他雖然年高六十，年輕時又衝力十足，多所做為，可是還是由衷的說出如下的話：「我不再年輕了，我是不折不扣的老人了。」多年來，礦工們早就聽膩了競選諾言，你只能在他們臉上看到疲憊、陰鬱、麻木，甚至冷酷。可是此刻，他們卻開啓心扉，熱烈擁戴阿葉德的信念。當選總統後，他做成幾項決定，其中之一就是煤礦國有化，實現了那天下午在洛塔和史坎維吉的諾言。皮諾契特首先實行的政策之一則是煤礦歸還私有，他幾乎將每種企業都化為私有，像是：墓地、鐵道、港口，甚至收集垃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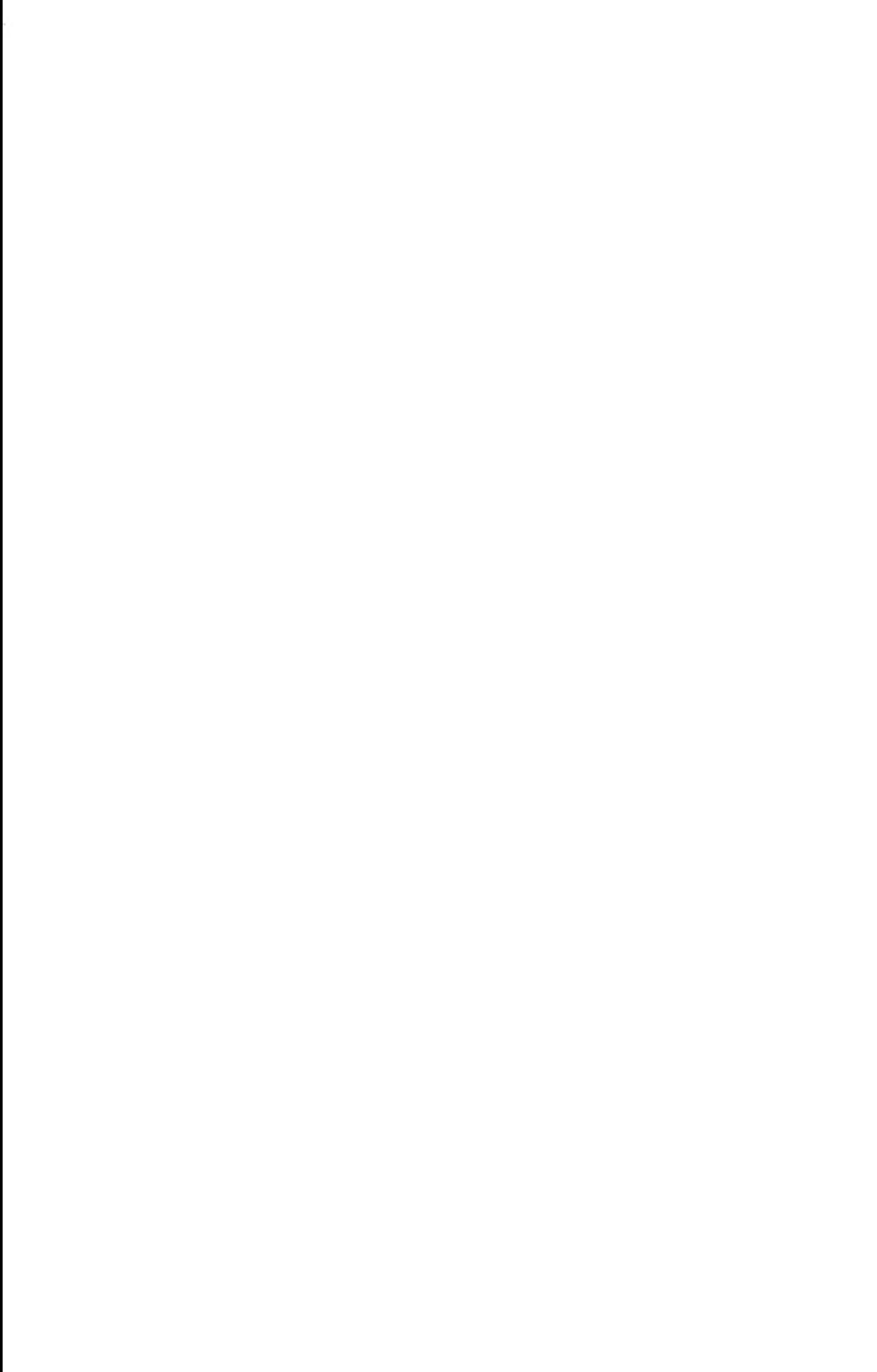
下午四點，礦區拍攝在未受軍方或民衆干涉下完成，我們於是取道塔卡荷諾(Talcahuano)回坎塞普遜。沿途我們穿過摩肩擦踵擠成一團的礦工，霧中，只見他們拖著裝滿剛由礦坑內挖出的煤礦的板車，向著回家的方向走去。他們身旁還混雜著拿著大袋大袋煤礦，身形矮

小、望之似鬼的男人，以及短小精壯的女人。他們彷彿惡夢中飄出的怪物，霍然現身薄暮之中，幾乎無法在車燈中分辨出。

塔卡荷諾設有訓練初級海軍軍官的學校，也是智利的主要軍港和吞吐量最大的海港。那兒的空氣惡臭，四處瀰漫著魚工廠的腥羶，海港的焦油味，以及海水的腐敗味。政變之後，它不幸的成爲犯人要前往多森(Dawson)島那個地獄前，登船與離岸之地。街道上，可以看到年輕軍校生穿著畢挺制服，行走於衣服破爛的礦工之間。

出乎意料之外，這些軍人並不檢查旅客。在這兒，絕大多數的房子都是漆黑的，而少數房舍透出的亮光，似乎還是油燈的光芒。由於除了早餐的咖啡，我們一直沒有進食，因此當我們猛然見著一間燈火通明的餐廳時，幾乎懷疑自己見到了鬼怪。等到進入餐廳，見到由海邊懸崖飛來，盤踞滿室的海鷗，我們更加強了這層觀感。我從未見過這麼多海鷗，更未見過牠們自暗夜中升起，盤旋在麻木的顧客四周，既像瞎子跌跌踉踉，又像一隊喝醉酒的飛行員，胡亂的衝向母艦降落。我們在該吃晚餐的時候進早餐，食用智利蛤蜊，品嚐冰冷的深海滋味，然後返回坎塞普遜。租車公司早就休息了，我們在路上轉了四個小時，才找到人退還車子。

等我們匆忙趕上通往聖地牙哥的火車，車身都已經啓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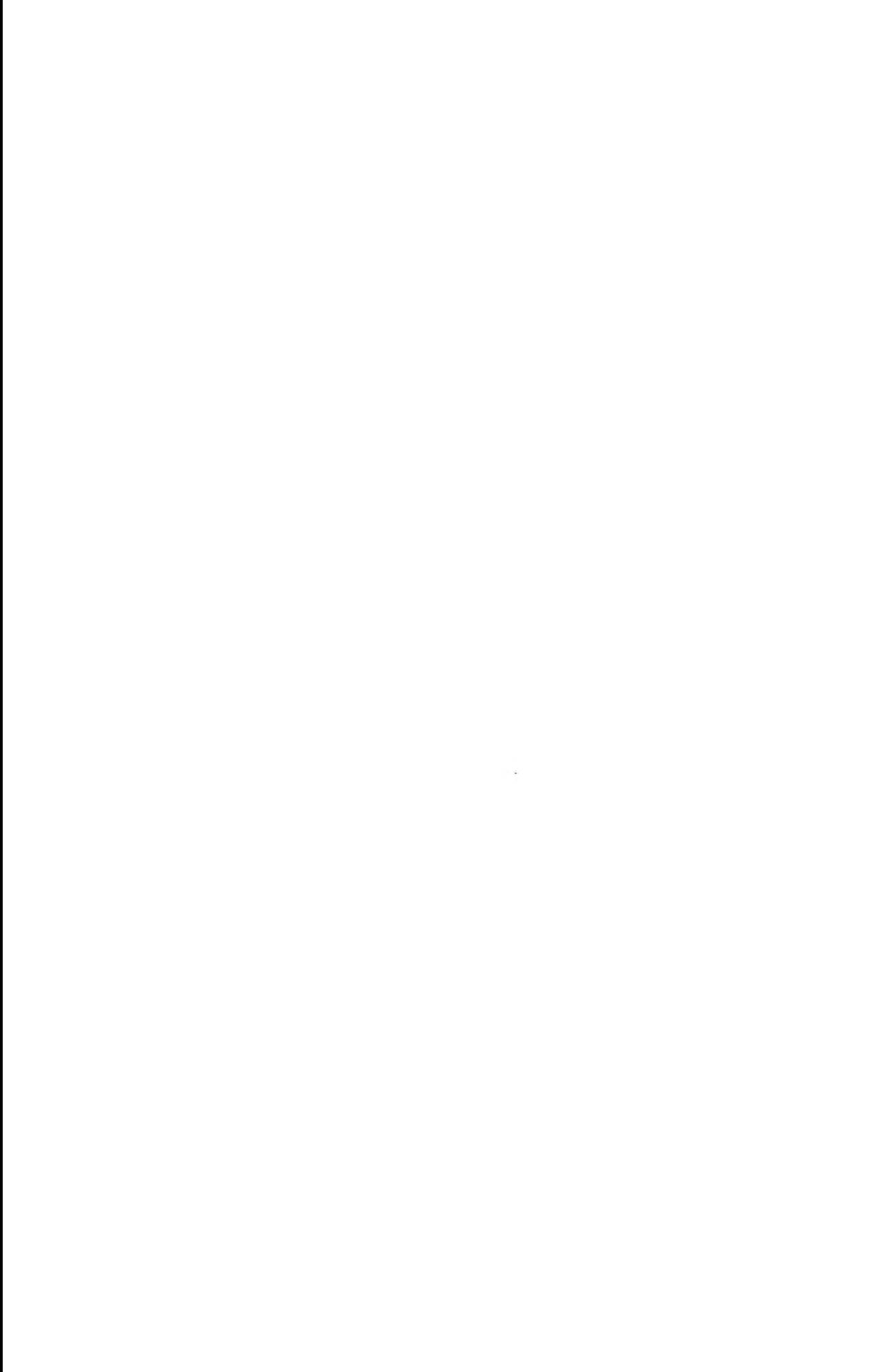
第六章

兩個精神永存的人·阿葉德和聶魯達



●阿葉德(上)與聶魯達





舉凡智利的大城市，都有一處稱作「帕布羅西尼(poblaciones)」地區。那是智利的貧民窟，範圍廣大，宛若迷宮，類似阿拉伯城內的阿爾及爾舊城區。由某方面觀之，帕布羅西尼足可稱爲化外之地。在這兒，居民獨自發展了一套顛覆文化，無論是軍人或警察，若需進入此地，都會躊躇再三，因爲即使是大象，也可能絲毫不留痕跡在此湮滅。這些貧民窟一直是當局的心頭之患，即使在智利民主派當權時代，帕布羅西尼依然由於傳統上具備的地位，成爲政治不滿分子的聚集中心。我們希望透過攝影機，捕捉貧民對獨裁政體的看法，以及阿葉德政府存留在他們心中的印象。

我們意外發現，流亡海外的反抗組織領袖，對於新一代的反抗人士，早已不具任何意義。海外領袖已經是過去輝煌年代裡的英雄，與現在沒有什麼關聯了。不論是否覺得諷刺，但是反對派系裡出現這種結果，堪稱軍事政府的一大挫敗。只要回想皮諾契特將軍當初即位即誇下的豪語，就知道此言不假了。當時他曾說，他準備一直掌權，直到民主制度的最後一抹痕跡自新一代心中消失爲止，他卻沒有想到，他自己的政權有一天也可能消蝕無蹤。不久前，一些男孩僅憑石頭，就勇氣十足的和鎮暴警察對抗了起來，他們還計畫重建社會制度，建立

一種他們自己從來沒有體驗過的制度。此舉使得皮諾契特大為震怒，他表示，年輕一代對抗他，完全是出於對從前的民主智利一無所知之故。

過去的歲月，早已和阿葉德這個名字交織在一起，密不可分。在帕布羅西尼，人們僅憑記憶，依舊崇拜他，而比例之高，幾可稱為傳奇了。我們特別希望透過這兒，了解此地人民的生活狀況，他們對獨裁的反應，以及他們抗爭的方式。他們回答問題時永遠坦白而直接，永遠與記憶中的阿葉德息息相關。許多人的答案近乎一致：「我一向把票投給他，從不投給他的對手。」阿葉德參加過很多次總統競選，他甚至說過，日後墓誌銘上必要書以：這裡躺著薩瓦多·阿葉德，智利未來的總統。在他任職代議士期間，他是北起智利邊境，南至巴塔哥尼亞(Patagonia)區之間，大部分省分的候選人。雖然他不斷當選議員，在贏得總統選戰之前，卻足足打了四次艱苦的仗。正因為如此，他熟悉這個國家，他熟悉它的土地，它的人民，它的習俗，它的失望，和它的夢想。至於他自己，也給這個國家的全體人民了解的透透徹徹的了。許多候選人利用電視、報紙、廣播推介自己，阿葉德卻是透過家庭，透過與人民的直接溫馨接觸。他就像個家庭醫師，事實上，他也正是家庭醫師。在政治運作上，他那近乎動

物本能的行止，使得支持者也不時覺得矛盾。在他當選爲總統後，有一次，一名男子持抗議標語走到他面前，那句標語相當特別，上面寫道：這個政府是狗屁，不過卻是我的政府。阿葉德站起來，鼓掌，走下去和他握手。

在我們遍訪這個國家的漫長行程中，每到一處，都可見到他經過所遺留的痕跡。有人和他握過手；有人的孩子以他爲教父；有人喝過他採自家中後院，親自製成的茶葉，並且醫好了頑咳。否則就是有人因他推薦而獲得工作，或是輸過他一盤棋。每一件他碰過的東西，都給當成紀念品保存了起來，有時候，不經意間，有人會指一張顯然維護得較好的椅子給我們看，並告訴我們：「他在那兒坐過。」或是拿一座小雕像給我們，說道：「他給我們這個。」一名育有一子，並正懷孕的年輕婦女告訴我們：「我總是告訴孩子從前的總統是誰；雖然我自己對他的認識也很有限，畢竟他走時我才九歲。」我們詢問她還記得什麼，她回答：「我當時和父親一塊，看到他在陽台上揮舞白手帕。」在一間供有聖母神像的屋內，我們問神像所有人，她以前是不是支持阿葉德。「不只從前，現在還是。」她不假思索答道，並挪開神像，露出隱藏於後的阿葉德照片。

前總統的小型半身肖像，仍在大眾市場內販售，流傳於崇拜者之間。這些肖像都給置放家中，供上了鮮花及許願燈。他的影像依然存在人們心中，鮮活的烙印在投他四次票的老人心中，在投他三次票的人心中，在推舉出他的人心中，以及透過故事了解他的孩童心中。幾位我們訪問過的婦女均一致表示：「阿葉德是唯一維護女性權益的總統。」他們很少直呼他的名字，他們叫他「總統」。他似乎仍然是他們的總統，似乎是他們僅知的一位，而他們仍在等他回來。他不只影像鮮明，他那富含人道精神的哲理，也同樣深印在帕布羅西尼人心中。「我們擔心的不是吃飯、穿衣問題，把尊嚴還給我們，」窮人說道，「把從我們這兒拿走的還回來，我們要對自己的生活有發言權。」

兩個精神永存的人

阿葉德崇拜以法耳巴拉索(Valparaiso)最明顯，這個熱鬧的港都正是他出生、成長，以迄奠定一生政治方向之地。在那兒，他由一名篤信無政府主義的鞋匠家裡，首次接觸理論書籍，並為鞋匠終身熱愛棋藝而傾心不已。他的祖父是羅蒙·阿葉德(Ramon Allende)，他設立了智利第一所非宗教性學校，並建立共濟會(Masonic)學舍，薩瓦多·阿葉德即在此獲得最高碩士學位。他的政治生涯起始於「十二名社會主義者年代」，這段時期由傳奇人物葛羅夫(Marmaduke Grove)擘劃。葛的弟弟是阿葉德的姊夫。

令人不解的是，獨裁政府竟將阿葉德埋在法耳巴拉索，若讓阿葉德挑選，大概也非此地莫屬了。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夜晚，他的屍首運達當地，身旁除了妻子卜昔(Hortensia Bussi)和姊姊蘿拉(Laura)，沒有其他人，也沒有任何儀式。當時他們搭的是空軍老舊的螺旋槳飛機，沿路上，刺骨的南風透過隙縫，不斷灌入。一名前軍事會議的情報官，也是首批進

佔摩尼達宮的軍人，告訴美國報社記者湯瑪士·霍索(Thomas Hauser)，他親眼見到總統的屍體「腦袋開花，腦漿濺在地板上、牆上。」這點正好說明，當阿葉德遺孀要求見他棺中最後一面時，他們爲什麼斷然拒絕，僅允許她見到覆著床單的屍身了。他被埋在聖塔埃尼斯(Santa Inés)墓園，葛羅夫家族的豪華墓地內，墳前除了花束，別無祭品。當時他的遺孀曾口念：「智利總統薩瓦多·阿葉德埋葬於此。」按照獨裁政府的本意，是想讓阿葉德的墓地與世隔絕，使人民無法親臨憑弔，但是他們卻打錯了算盤。因爲即使政府不惜散佈謠言，表示屍體已經他移，朝拜者仍絡繹於途，墓碑前也永遠有不知名者獻上的鮮花。

帕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同樣受到年輕一代熱烈崇拜，這位詩人位於黑人島(Isla Negra)上的舊居甚至成了當地聖地。儘管名稱如此，這塊傳奇之地卻是既非島嶼，亦非黑色，而是個小漁村。村內有黃土徑蜿蜒於巨大松樹間，村旁還有波濤盪漾的洶湧大海。這村子距離法耳巴拉索南邊不過二十五公里，鄰近聖安東尼奧高速公路。弗朗基和我先行至此，準備擬定拍攝計畫，當時意大利組仍在法耳巴拉索拍攝最後幾個鏡頭。值勤的武裝警察指給我們

看大橋所在，還告訴我們旅店的位置，以及其他幾處詩人吟詠過的地點，但是他警告我，不得探訪他的房子。

待在旅館等待其他人的當兒，我們慢慢了解到，詩人是如何做爲黑人島的靈魂的。無論何時，只要有他在，當地必然擠滿年輕人，手上拿著他的《二十首情詩》，做爲唯一的指引。他們或是想看他一眼，或是想要得到他的親筆簽名，不過對大多數的人而言，只要能帶走屬於當地的回憶，就心滿意足了。那時候，旅店充滿了歡樂和喧囂。聶魯達不時的出現，穿著色彩俗麗的防水衣，頭戴安地斯山便帽，身形龐大，像教宗一樣緩步走動。爲了不受干擾，他拆掉家中的電話，因此不時會來打個電話，有時候則來和旅店女主人阿蓮娜商議，如何爲當晚家中客人預備鮮魚。聶魯達是美食專家，烹調手藝已達專業水準。事實上，他不僅講究美食，連桌上最細微的擺設，他都錙銖必較。他會毫不猶豫的更換桌布、餐盤、銀器，直到與桌上菜色調配合和諧。如今經過十二年，一切往事都寂寥的隨風逝去了。心中充滿痛苦回憶的阿蓮娜早已遷去聖地牙哥，旅店也幾近傾頹，只有殘破的詩篇遺留了下來。自從上回地震，黑人島不分日夜，每隔十至十五分鐘就有餘震出現。

黑人島的土地顫抖不停

我們在交織的松樹影中，找到聶魯達的房子。詩人在房子四周豎立數尺高的圍牆，藉以保護自己的私生活。樹叢裡仍可見朵朵鮮花迸放，一塊牌子警告說，房子已由警方封鎖，不得進入，也不得攝影。一名武裝警衛定時巡行四周，他說得更直接：「在這裡，什麼事都不准。」我們事先就知道了這情形，意大利攝影師刻意帶來笨重而醒目的器材，繳交到崗哨亭去，另外他則在衣服內，藏了一台手提式機器。我們還把全部人員分三組，各配一輛汽車，以利行進，唯有如此，拍竣的片子才能即刻送到聖地牙哥。除非我們給逮捕了，否則攝影機內的膠卷絕不可能遺失。萬一發生此事，其他組員會立刻假裝不認得我們，弗朗基和我也會裝成無辜的遊客。

房子的門均由屋內反鎖了，窗戶也拉下了白窗簾，表示聶魯達在此地的旗子更不在桿上飄動。面對如斯景物，花園內卻繁茂如常，不知是由什麼人在細心照料。聶魯達的遺孀馬堤

笛(Matilde)在我們探訪前不久過世，政變之後，她便搬走了屋內家具、書籍，以及聶魯達遊走各地搜集的奇奇怪怪收藏品。他在世界各地的房子均非以儉僕聞名，而是以豪華著稱。他熱愛自然，不僅充分表現在詩作中，日常生活裡，他也大量搜集螺旋貝，船首破浪神，古怪的飛蛾和蝴蝶，還有特殊的玻璃杯及高脚杯。他有一間房子的辦公室中央，站著一匹栩栩如生的馬，訪客必須走近了，才分辨得出那只是填充標本。有時候心血來潮，聶魯達會拆掉房子重蓋。有一次，他大膽的在客廳與餐廳中間，蓋起一個花園，做為兩邊往來的唯一通道，每逢雨季，他還好心的提供雨傘。聶魯達認識一些委內瑞拉朋友，他們認為，粗俗的品味會招致惡運，因此勸告他，不要留著那些收藏品，免得受到傷害。他卻樂不可抑，並且回答他們，他的詩作正是惡運的解毒劑，而他駭人的收藏品就說明了這點。

他最常待在聖地牙哥的房子裡，政變後沒幾天，他正是死於此屋之內，死因是悲傷過度，造成慢性白血球過多症惡化。這棟房子後來遭到士兵劫掠，書籍都被扔到花園焚燬了。聶魯達曾利用他的諾貝爾獎金，在諾曼地(Normandy)購買一間古堡的馬廐，整修成為住家。那房子依傍著一池的蓮花，頂上有類似教堂的高挑拱形屋頂，四面有鑲著彩色玻璃的窗子。詩

人常常沐著透過窗子照進來的陽光，坐在床上，接待來訪友人。然而這種生活他享受不到一年。

讀者們爲了感應聶魯達的詩作，紛紛湧向他黑人島的房子，時至今日，新一代的崇拜者依然如此；其實詩人在世時，他們還不滿八歲。這些讀者來自世界各地，他們在圍牆上畫心形圖案，署下名字縮寫，還題寫愛情詩句。句子形式雖異，主題卻大致相同：喬璜與蘿莎因帕布洛而相愛；謝謝你，帕布洛，教會了我們愛情，我們要愛得像你一樣深。另外有些句子，武裝警察就不得不抹掉了，像是：愛永不止息，阿葉德和聶魯達長存；短暫的黑暗不會矇蔽我們的雙眼。這種句子通常寫在最隱蔽的角落。由於牆面空間有限，站在牆前，會產生一種錯覺，以爲牆上留字是好幾代戀人的傑作。如果耐性足夠的話，將戀人們僅憑記憶，零散寫出的詩句組合起來，必可呈現聶魯達的全部詩作。由於每隔十到十五分鐘，土地就會猛烈搖晃一次，留字似乎也就有機會重生一次。那時，圍牆會拚命往上拔起，樹的枝桠會吱軋亂響，如果正巧有遊艇飄過，更會添進一片玻璃、金屬的叮噠聲。那房子花園裡遍佈的愛，似乎感染了整個世界，教她全身顫動，無法自己。

一旦置身真理，所有的謹慎小心都變成了多餘。我們的攝影機既然安在，而警衛又午餐去了，不再干涉我們，我們於是拍下一切預定畫面，甚至預定外的畫面。這點得感謝雨果，震動製造出的效果，使他變得發狂，一個人直奔海中，走到海水沒到腰際才止住。只見大浪在他四周翻騰，猛烈拍打岩岸。他根本是在玩命，即使沒有地震，海浪強大的回潮力也可能將他拖倒，但是沒有人勸得住他。雨果不停的拍，絲毫不須指引，眼光完全膠著在鏡頭上。任何人只要真正了解電影事業，必然能理解，攝影師一旦著魔，就不再受任何控制或任何指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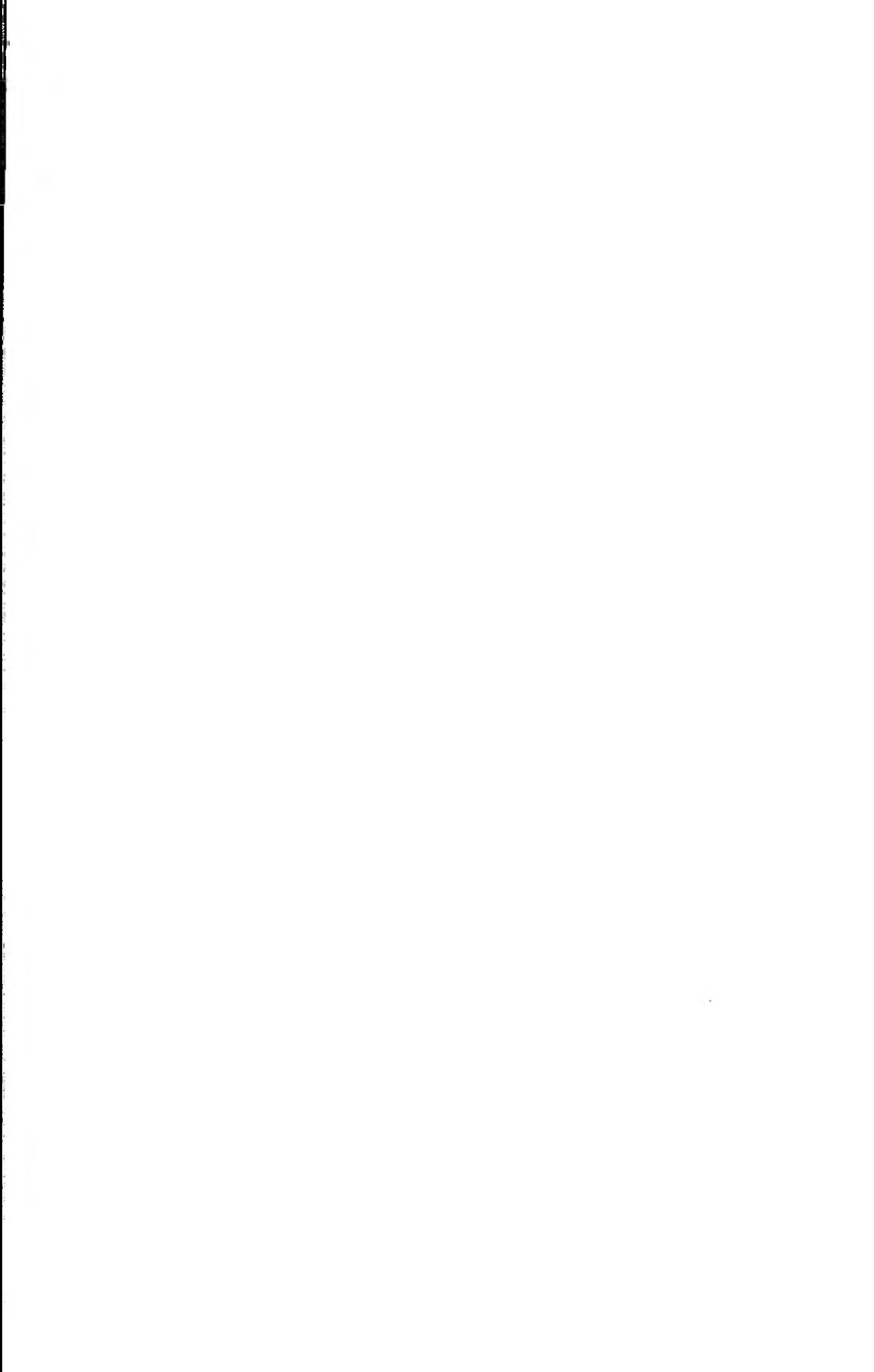
「葛瑞西亞順利升天」

我們按照計畫，每拍完一卷片子，就火速送到聖地牙哥，以便葛瑞西亞立刻帶往意大利。過去一周以來，我們一直在討論，想找出一個理想辦法送出影片。原先地下組織提供我們一條管道，可是如今卻行不通了。正當我們苦思對策之際，出來一條新聞，智利新任的樞機主教弗瑞斯諾(Monsignor Francisco Fresno)即將到達聖地牙哥，取代七十五歲退休的樞機主教席爾維(Silva Henríquez)。席爾維主教在任內展現出無比的勇氣與抗爭，為智利人民樹立了典範，並在廣大民衆心中，留下深遠的印象。他透過教區聯盟推行工作，一直是獨裁政府的背上芒刺。

他的教士們帶著博愛的胸懷，與貧窮的帕布羅西尼人並肩而立，共同從事木工，泥水工，以及其他勞力工作。他們之中有些人，甚至因為參與街頭抗議，而遭警方殺害。為了歡迎弗瑞斯諾，政府預備舉行盛大的慶祝會，即便是宵禁，也要暫停二十四小時。由於新任樞機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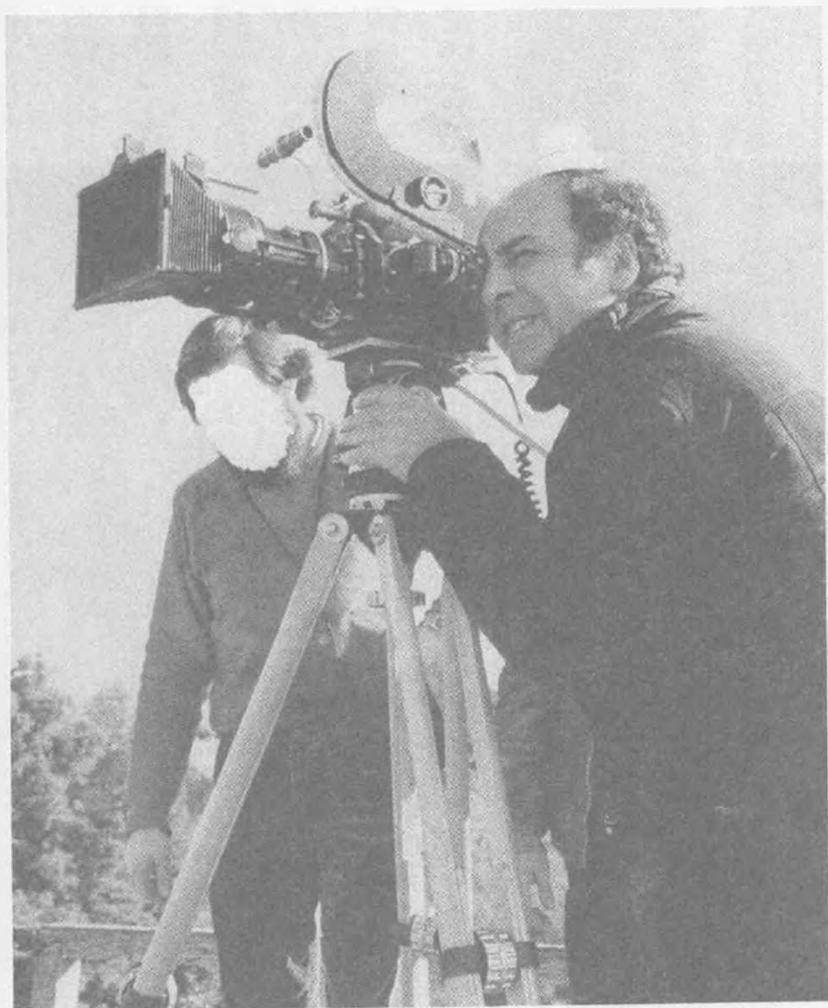
教的地位仍未定，我們大多數人都認為，皮諾契特根本是藉這場盛大歡迎會，慶祝席爾維樞機主教退休。至於將軍本人，則帶著家人，率同一班次級部長們，前往北邊，度二周的假去了。這麼做，也許可以免除他們現身歡迎會，製造一些不必要的紛爭。然而官方行動上的矛盾，卻攪得大眾迷迷糊糊，結果，阿瑪斯廣場只來了寥寥數千人，較之預計的六千人少了許多。

任何人都料想得到，這種官方混亂的日子，正是運送第一批影片出境的大好時機。葛瑞西亞到機場時，那兒的警衛雖較往日森嚴，但是一片混亂，加上擁擠不堪，連警察都伸出援手，幫忙她盡速通關，以便趕上樞機主教落地搭乘的同一班飛機，順利出境。當夜稍晚，我們收到法耳巴拉索來的暗語：葛瑞西亞順利升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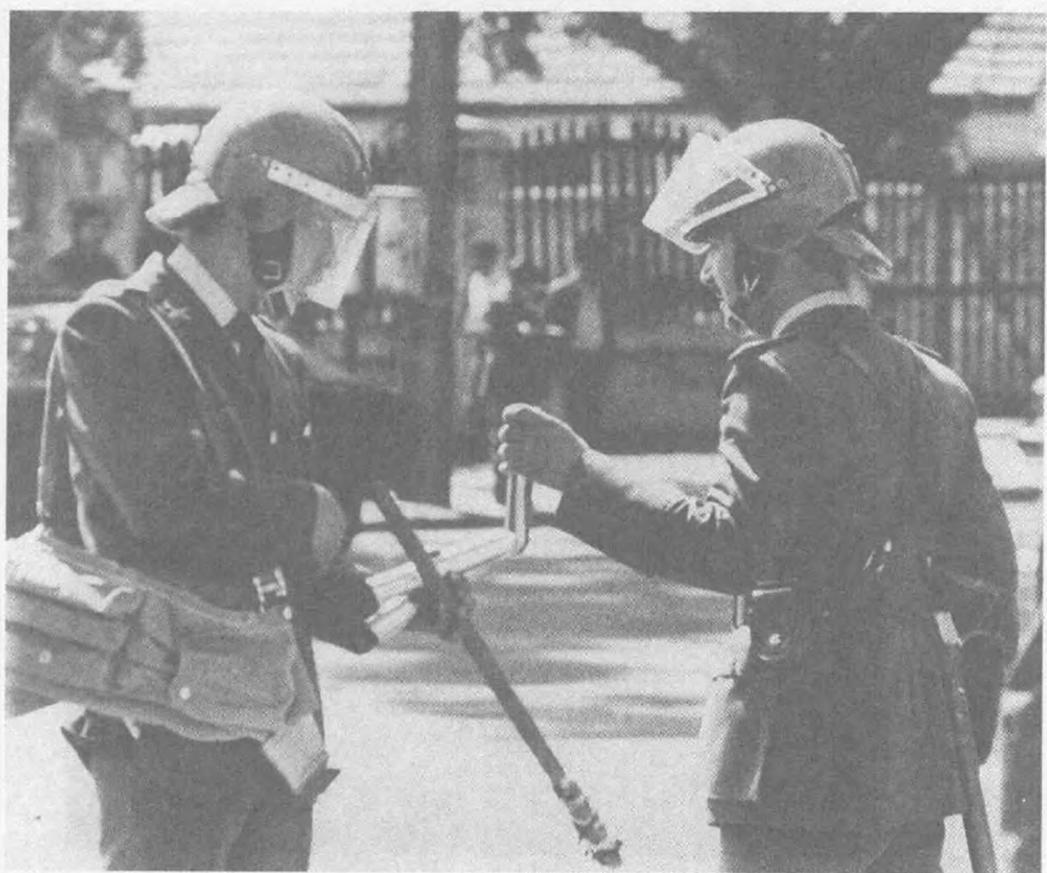


第七章

警方出動：包圍圈在縮小



●攝影中的密戈爾·立頓（照片左方的人為了安全起見將臉部隱去）



●全副武装的國家警備隊員
(聖地牙哥·一九八四年)

我到坎塞普遜和法耳巴拉索拍片，並沒有知會依蓮娜，因此她著急透了。她雖有責任報告我失蹤的消息，但是她了解，我這個人隨心所欲慣了，所以決定多等一些時候。星期六，她徹夜守候，到了星期天，仍不見我出現，她開始打電話，四處詢問可能知道我下落的人，可是沒有人知道。就在她下定決心，準備在星期一中午發佈警訊的時候，我卻門面未修、滿臉惶忪的走進了旅館。依蓮娜鄭重告訴我，她擔任的重要任務及危險任務不知凡幾，也見過許多不受約束的假丈夫。但是沒有一個人像我，讓她擔驚受怕到這個程度。這一次，我沒話說，她的確有理由大發雷霆。那天上午十一點，在費過極大力氣，撲過無數次空，不斷聯絡協調之後，她終於安排妥當，約好羅德魁斯愛國陣線(Manuel Rodríguez Patriotic Front)的領袖跟我碰面。

綜觀所有任務，毫無疑問的，這次最危險，也最重要。陣線成員都很年輕，皮諾契特上台時，他們大約才小學畢業。一如其餘的民主團體，這個組織的宗旨也是反獨裁、擁護民主、維護人權。他們的組織名稱取自一名智利傳奇人物，一八一〇年獨立運動時，此人得天獨厚，竟能避開國內外所有的監控。羅德魁斯不斷設法，使智利地下武力——愛國人士失敗，勢力

遭保皇派收回後，殘餘的反抗武力——經常與活躍於阿根廷門多薩(Mendoza)的解放軍保持聯繫。今日的智利較之當時，似乎仍無二致。

任何優秀記者，只要採訪到愛國陣線領袖，一定會覺得自己達成了一次圓滿任務，我當然也不例外了，我們早先就跟陣線約好了，到了那天，攝影組員就依約定，分別在指定位置等候。我到了最後一刻，才到達指定的公車站，還按照約定，拿一份當日的水星日報(El Mercurio)以及《¿Que Pasa?》(What Happen?)雜誌。我只要站在那兒就行了，自然有人會過來問：「去海邊？」我就回答：「不是，去動物園。」這種暗語聽來滑稽，秋天裡，那有人去海邊。事後，陣線的兩名聯絡官告訴我，就是因為荒謬，才不會被人誤用。等了十分鐘，我開始擔心四周投注的目光，一個中高度，身材極瘦的男孩，跛著左脚向我過來。他戴著軟呢帽，在我看來，徹底洩露了他的身份。他相當自在的走向我，還沒說出暗語，我就迎上前去了。

「你只能裝扮成這樣嗎？」我笑著問，「連我都一眼識破了。」

「有這麼容易？」

「一里外就看破了。」

他很有幽默感，也很好相處，氣氛一開始就輕鬆起來。他才靠近我，一輛麵包車就開了過來，停在路旁，我於是上車坐在司機旁邊。我們開進市區，到各個指定地點，搭載散布各處的意大利組員。車子才走一陣子，我和意大利人便分別在五個不同地點下車，各自上一輛車子，再繞過一陣之後，才又全部上了一部小貨車。貨車內有攝影機，也有燈光和錄音設備。儘管事情很嚴肅，也很重要，我卻不覺得自己在冒險，只覺得在拍攝偵探片。就在上車、下車之間，戴呢帽男孩自動消失，從此，我就沒有再見到他。取代他的是一名司機，他雖然也喜歡開玩笑，處理事情卻很謹慎。我坐在他旁邊，其餘組員爬進卡車後面。

「我帶哥兒們四處溜溜，」他對我們說，「讓你們聞一點智利的海風。」

他打開收音機，調到最大聲，開著車子在市內四處打轉。轉到最後，我都分不出東西南北了，他還嫌不夠，繼而要求我們閉上眼睛。他說了一句智利話，我都忘了什麼意思。「好了，孩子們，」他說，「現在你們養養神吧。」

看我們沒有絲毫反應，他說得更白，更強烈。「好了，現在閉上眼睛，直到我說可以，才

准張開。如果有人張開眼睛，行程即刻結束。」

他告訴我們，以往搭載乘客時，他都會讓他們戴一種盲人眼鏡。這種眼鏡看似太陽眼鏡，其實是不透明的，可是今天他忘了帶眼鏡，我們只好閉上眼睛了。意大利人不懂智利俚語，我只好權充翻譯。

「睡覺。」我告訴他們。

他們更迷糊了。「睡覺？」

「照著做，」我指示，「趴下，閉上眼睛，我沒說話就別張開。」

真正距離：十首波麗露

攝影人員擠在一塊，躺到卡車上。我繼續注視外面，想要辨認自己的位置。司機毫不放鬆，緊接著對我說，「你也不例外，老哥，閉上眼睛。」

我倚上座位頭靠，向後仰坐閉上雙眼，靜聽收音機流瀉的波麗露(boleros)樂曲。都是一些最流行的歌，有莫里諾(Raúl Chu Moreno)唱的，也有卡帝卡(Lucho Gatica)、羅梅尼(Hugo Romani)和馬瑞尼(Marini)。歲月流逝，江山更迭，只有波麗露永遠是智利人心中的最愛，這種情形別的國家是看不到的。偶而，卡車會停下，我們會聽到竊竊私語聲，然後司機會說：「好了，回頭見。」我心中暗想，一定是其他工作人員，在重要據點上，指示他前進方向。有一次，心想反正他在分心說話，我張開了眼睛，卻不料後視鏡早斜成一邊，顯然無論開車或說話，他的目光都不用調離我們。

「不乖，不乖，」他厲聲說道，「下次有人再張開眼睛，我們立刻就調頭，打道回府。」

我趕緊閉眼，跟著收音機唱和：我愛你，你會明白我的愛。後面的意大利人也應和起來，司機大為高興。

「這樣好，孩子們，唱歌。唱得很好，」他說，「儘管放心，開車的人是老手。」

流放之前，聖地牙哥有些地方即使閉上雙眼，我也分辨得出。好比說屠宰場，那兒有一股血腥味，好比說聖密戈爾 (San Miguel) 區，那兒有一股汽油和鐵軌摻雜的味道。我在墨西哥住過幾年，每次只要聞到紙工廠的臭味，就知道克南維卡 (Cuernavaca) 公路到了，只要聞到煉油的味道，就知道即將進入阿斯卡波薩可 (Azcapotzalco) 區。那天下午在聖地牙哥，儘管按捺不住好奇，一邊唱一邊嗅著，我卻分辨不出任何熟悉的氣味。第十首波麗露播畢，卡車嘎然而止。

「還不能張開眼睛，」司機警告我們，「現在我們下車，要遵守規矩，好好的走。全部手拉手，可別跌壞了一身笨骨頭。」

我們照辦無誤，順著一條陡峭小徑攀上爬下，只覺脚下泥地鬆軟，似乎很少見到陽光。終了，我們走進一個幽暗的地方，裡面寒氣較低，可以聞到陣陣魚腥味。一度我認為我們在

法耳巴拉索的海邊，然而行程又不像那麼遠。司機終於下令，要我們張開眼睛。原來我們在一個小房間內，房間牆壁空白一片，四處擺著幾件維護得很好的廉價家具。一個年輕男人站在我面前，衣著乾淨整齊，臉上黏著假鬍子，馬虎到令人發噱。

「你應該去整理整理，」我對他說，「那種鬍子騙得了誰。」

他笑了起來，順手扯下鬍子。

「我太匆忙了。」他解釋。

氣氛登時活潑起來，笑鬧中，我們移往隔壁房間。那裡面有一個男人躺在床上，年紀很輕，頭包紗布，顯然正在假寐。這時我才想到，原來我們在一間設備精良的秘密醫院裡，而床上的病人正是費南度·席戈爾(Fernando Larenas Seguel)，智利通緝的頭號人物。

他二十一歲，是羅德魁斯愛國陣線的一員。兩星期前有一天，凌晨一點，他單獨一個人，未攜武器，在聖地牙哥開車準備回家。突然之間，四個平民模樣的人圍過來，手上拿著來福槍，半句話不吭的，便有個人朝著他開槍。子彈穿過擋風玻璃，射進他的左手臂，貫穿到了腦殼。四十八小時之後，四個陣線幹部冒著生命危險，從「大眾醫院」(Clínica de Nuestra

Señora de las Nieves)救了他，當時他神智昏迷，身旁還有警員看守。他們送他進入陣線的秘密醫院；此類醫院共有四家。接受我們訪問時，他正逐漸復原，能夠說話並回答問題。

過了幾天，我們前往愛國陣線的最高指揮部，其間過程，依然謹慎，依然像在拍偵探片。

只是這次我們不再置身地下醫院，而是處於類似中產階級的房子裡，那裡面溫暖、舒適，有大量古典唱片，還有很棒的圖書館。按照原本計畫，我們拍地下領袖時，是要幫他們覆上頭罩的，以免他們曝光了，不過最後我們還是決定，改在燈光、角度方面下功夫。由拍竣的影片可以看出，這種方式更具說服力，更有人性，也不像一般訪問地下領袖那麼嚇人。

訪問過了反抗人士領袖，我和依蓮娜一致同意，她應該回去歐洲，繼續自己的工作。依蓮娜在歐洲居住已有一段時間，而且她負擔的任務一向重要，所以若非絕對必要，實在不該繼續暴露在危險之中。當時我已得到足夠經驗，相信即使沒有她幫助，也能夠應付影片其餘較簡單部份。那次一別，直到今天，我都沒有機會再見到她。當時我看著她走向地鐵車站，穿著從前的格子裙，神情也恢復學生的無邪，才深深體會，長假假扮情侶，擔驚受怕，將來我一定會非常懷念她，而且遠超出當初的想像。

我們的攝影人員都是外國人，爲了預防突發事件，導致他們必須離開智利，或是不得拍片，反抗人士組成一支年輕的攝影隊伍，隨時待命，準備支援。結果證明，他們表現的太好了。他們的工作效率既不遜於其他隊伍，成果也同樣的好，他們甚至更積極、更投入——或許出於本身與這件事情的政治關聯吧。他們的組織還向我們保證，他們絕對可靠，而且願意冒任何危險。拍到最後，我們的外國人不敷使用，可是帕布羅西尼仍需攝影人員，這支隊伍便接下任務，組織更多隊伍，然後再由這些隊伍去組織其他更新的隊伍。到了最後，共有六支智利攝影隊伍，在不同地方同時工作。在我看來，這些年輕人是一種象徵，代表新生代的決心：他們要按部就班，腳踏實地，將智利從獨裁、從不幸拯救出來。雖然年紀很輕，對未來也有憧憬，他們顧慮的卻不僅只是自己；他們默默耕耘，暗中結果，而且謙沖自抑，從不趾高氣揚，自以爲是。

圓圈逐漸包緊

就在我們訪問愛國陣線領袖的時候，法國組圓滿達成任務，回到了聖地牙哥。由於北方在智利的政治發展過程中，一直處於關鍵地位，因此，他們帶回的部份可說是整部紀錄片的核心。無論是最早的路易斯·路卡貝倫(Luis Emilio Recabarren)——他在本世紀初創立第一個工黨；或是近期的阿葉德，就意識形態或政治一貫性而言，都在北方紮根最深。上個世紀，英國人爲了商業目的，前來智利開採豐饒的銅礦，結果造就了本地的工人階級。從此智利便出現了社會運動，並且毫無疑義的成爲拉丁美洲的翹楚。

法國組的組長是讓·克勞德(Jean Claude)，他對影片的報告不僅詳細，而且完整。我必須一邊聽報告，一邊憑藉想像，假設影片出現銀幕上的情形，以便保持全片連貫；反正我們也不急著趕時間。如果回到馬德里才修改，四周景物早已全非，時間上自然會嫌太遲。基於安全，我們在聖地牙哥碰面，從不去固定地點。那天早晨，我和克勞德也是一邊談話，一

邊在城內四處遊蕩。我們漫步於鬧區，搭乘非熱門路線的公車，跑到生意鼎盛的咖啡店喝咖啡，吃蚌殼，喝啤酒。一直到深夜，我們才發現距離旅館已相當遠，於是決定搭地鐵回去。

地鐵的建造，始於法瑞(Frei)總統，由阿葉德承接，終於專制。我從未進入裡面，那天進去，感覺相當意外。我沒有想到裡面這麼乾淨、有效率，而我的同胞對於行走地下間的便捷，竟這麼習以為常。我們雖然很想拍攝地鐵，卻苦於找不到適當理由申請一張許可證。不過我們也想到，既然當初工程由法國承接，如今克勞德和他的組員說不定能因此獲准拍攝。我們一邊討論，一邊走進了維迪維亞(Pedro Valdivia)車站。走上階梯的當兒，我感覺到有人在監視我們。那是一名便衣警察，他正全神貫注的盯著我們，盯得那麼專心，以致我轉頭的剎那，我們的眼光竟接個正著。

回到智利這段時間，我已經學會分辨，輕易就能從人群中找出秘密警察。他們的特色是穿深藍西裝，頭髮短得像新兵，然後又自以為與平民百姓無異。另外一點也很明顯，他們喜歡盯著人看；智利人不喜歡在街上左顧右盼，無論走路或搭車，他們一向看著前方。這個人長得魁梧，雖然明知已遭對方察覺，仍然看個不休，由此，我更肯定他是警察。他兩手插在

外衣袋內，嘴上刁了一根煙，左眼隨煙圈眯著，顯然在模倣電影中的偵探，然而卻拙劣不堪。他讓我想起「胖子」羅莫（“Fats” Romo），一個政府的間諜，他裝成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卻出賣無數地下人士，使得他們悉數被殺。

我必須承認，回頭看他的確是犯了大錯，我不該如此的，但是當時一股衝動卻由不得已。衝動之下，我繼而看看左邊，然後右邊，我看到了另外兩個便衣。「說話，說什麼都可以，」我低聲告訴克勞德，「但是只能說話，別做出什麼表情，別東張西望，什麼事都別做。」他立刻明白了，我們按照原先步伐繼續的走，一直走上街道。夜色已深，較之前幾天，外面的空氣顯得較溫和，也較清爽。路上有許多行人，他們走在林蔭步道上，正要回家。準備和克勞德分手時，我告訴他：「暫時別露面，我會跟你聯絡。」

他朝右走去，我則混入人行道的人群裡面。有如神助般，一輛計程車適時在我身旁停下，我立刻鑽了進去。我可以見到那三個人，剛由地下道出來，一臉訝異，不知該跟我還是克勞德。計程車啓動，他們便消失在我視線之外。我向前穿過四條街，然後換一輛計程車走相反方向，然後另一輛，再一輛，一直到不可能再有人跟蹤爲止。當時我非常疑惑——現在還是

一樣，爲什麼他們要跟著我們呢？最後我看到一家戲院，才停了下車。我走進戲院，壓根沒注意放映的片子。也許是出於職業偏見吧，我一直深信，戲院不僅最安全，也最適合思考。

「喜歡我的屁股嗎？先生。」

原來除了電影，裡面還有現場表演。我才坐下，電影就結束了，室內燈光半亮，節目主持開始長篇介紹下面的節目。我仍然驚魂未定，頻頻回頭探望，希望沒有人跟蹤進來。我的鄰座出於好奇，也開始轉頭往後看；人類的好奇心真是自古皆然呀。不過在那麼一種地方，也許每個人都各懷心事，不希望有人發現自己。從燈光到裝潢，從電影到脫衣舞，房子裡每一樣東西都極低俗，觀眾尤其如此，臉上一副不知那兒來的難民表情。相信任何警察都會當他們為可疑份子，如今集中一處，正待發落呢。

由節目安排看來，似乎有違法內容要上場了。主持人開始介紹上台的脫衣舞孃，聽起來像介紹菜單的特殊菜色。每個女孩身上的披掛，比出娘胎的時候更少，舞孃們週遊一圈後，舞台上單獨留下一個身材極突出的黑女孩。她全身緩緩扭動，嘴唇一啓一合，跟著擴音器裡羅西亞·杜卡(Rocío Durcal)的歌聲對嘴唱著，聲量震耳欲聾。我盤算要冒險離開，卻見她

提著麥克風，曳著長長的電線，開始找觀眾問一些淫穢的問題，以逗眾人一笑。我正準備伺機離開，突然一股探照燈光迎頭罩下，眩得我兩眼幾乎睜不開。

「那位先生，頭頂禿一塊，好可愛的……」

她指的當然不是我的，而是我喬裝的那個人，不過我卻得代他回答問題。她拿著麥克風，直逼我面前，我甚至聞到她口中的洋葱味。

「你喜歡我的臀部嗎？」

「很漂亮，」我對著麥克風回答，「妳希望我怎麼說呢？」

她轉過身，背對著我，在我眼前扭動起下部。

「那我的屁股呢？你覺得怎樣？」

「很棒，」我回答，「太漂亮了。」

回答一個問題擴音器就播放一陣罐頭大笑聲，就像電視上播放的美國節目那樣。放眼四周，每個人似乎都希望自己能夠隱身不見。脫衣舞孀靠得更近，在我臉上摩挲一下，露出臀部上一顆真的痣，黑黝黝、毛絨絨的像個蜘蛛。

「當然了，」我說道，「妳整個人都很漂亮。」

「如果我今天晚上跟你上床，你打算怎麼做？快點告訴我，現在就說。」

「我不知道怎麼說才好，不過我會很樂意。」

真是殘酷的煎熬，更糟的是，我完全忘了要有烏拉圭口音，直到最後一分鐘才想到糾正。她模倣我口音的變化，並問我是那一國人。得到答案後，她驚叫起來，「烏拉圭人的床上功夫很了得的，你好不好呀？」

我別無選擇，只有板起面孔。

「請妳不要再問我了。」我告訴她。

她發現我不適合繼續糾纏，開始尋找其他可憐蟲。我找到一個機會，趁著沒人留意，盡快溜了出來，直接回到旅館。回到旅館後，我才定下心，確定當晚的一切沒有生出任何意外。

第八章

預備，有個將軍願意和盤托出一切



● 被警察逮捕的示威者（聖地牙哥，一九八四年）



● 在聖地牙哥國立圖書館前抗議刑求的示威者（一九八五年）

依蓮娜離開後，我開始與同情我的舊日朋友合作，他們不僅幫我找到智利攝影人員，還設法使我們能夠隨意進出帕布羅西尼。在所有舊友中，伊蘿莎(Eloisa)是我尋找的第一個人，她美麗而優雅，先生是商界聞人。

我和伊蘿莎是在大學時參加政治活動認識的，後來我們相繼投入阿葉德最後的一次總統競選，共同從事文宣，因而結為好友。回到智利沒有幾天，偶然中，我聽說她在一家著名公關公司任職，而且是公司的要角。爲了確定她正是我認識的那個人，我打了一通匿名電話給她。電話中，她的聲音溫柔而自信，正如從前，但是她的一些措詞卻讓我趑趄不前。爲了確定起見，我跑到她公司對面的咖啡屋，觀察進出人群。沒錯，是她，比從前更美麗，也更優雅了。我同時注意到，她不用司機，親自駕駛華麗的銀色BMW六三五，並不似我想像中有錢有勢的富商妻子。我留給她一張便條：「安東尼奧在此，他想見妳。」那個化名是我在大學參加政治活動時用的，我有把握她仍然記得。

她果然沒忘，一點整，那部銀色豪華轎車緩緩駛來，在雷諾經銷處門前打住。我跳入車內，關上車門。她看著我，滿臉愕然，直到我大笑出聲才恢復神色，顯然她也沒忘記我的笑

聲。

「你瘋了。」她說。

「妳以前懷疑過這點嗎？」我回答。

我們開往市內一家餐廳，我第一天回聖地牙哥時曾單獨去過那兒。但是那天餐廳入口卻封著木板，木板上還有一塊墓誌銘般的告示：永久關閉。我們最後在附近找到一家舒適的法國餐廳，餐廳對面正是市內最著名的汽車旅館。眼見汽車在那兒進進出出，伊蘿莎一邊吃午餐，一邊便辨認起客戶的車子，逗得自己高興不已，也讓我忍不住頻頻噴飯。

我毫無保留的告訴她秘密潛回的目的，希望她能幫忙聯絡一些人，以她的身份地位而言，我相信危險性應該是較低的。當時我們正因為缺少適當的政治背景，在拍攝帕布羅西尼上，頗遭遇了一些困難。我認為她可以幫忙我，找到一些我們兩人在「共同聯盟」時期一起結識的朋友，我和這些朋友在流放初期，便失去了聯繫。

她非常樂意的接下任務，還連續三個晚上，陪我參加地下組織在市內舉行的會議。搭她的車顯然安全許多，「有誰想得到，BMW六三五竟會是獨裁的敵人。」她滿意的做下評論。

不只如此，有一晚我跟伊蘿莎參加秘密會議時，意外遇上停電，多虧了這部BMW，才使我們免受逮捕。早先，反抗人士就警告過我們，當天會多次停電。他們表示，第一次停電大約有三十分鐘，接下來那次則是四十分鐘，到了最後一次，聖地牙哥會電力中斷二到三天。基於此，那天我們刻意提早開會，因為每逢停電，武裝部隊就會變得歇斯底里的，公路上的警察也會蠻不講理。但是後來不知怎麼的，我們的會議還沒結束，第一次停電就開始了。

籌劃會議的人員中，有一些是政治人士，他們決定，一俟停電結束，我和伊蘿莎就該立刻離開。於是，電力才恢復，我們就順著山邊，沿著一條未鋪柏油的道路，駕車離開了。我們在路上碰到一個彎道，才轉過去，就發現自己陷於車陣封鎖之中。道路兩旁，排著一輛接一輛的巡防車，好像隧道一樣。另外還有許多便衣人員，拿著手提式輕機槍站在路旁。伊蘿莎想停下車子，我要她繼續開下去。

「可是我們應該停車的呀。」她說。

「繼續走，」我告訴她，「不要緊張，繼續聊天，繼續微笑，除非他們叫你停，否則一直開下去。沒有關係，我的證件都齊備的。」

我一邊說話，一邊伸手掏口袋，結果心臟都給嚇停了，我竟然沒有把裝身份證的信封帶在身上！一名便衣走到路上，在我們面前舉起手，示意伊蘿莎停下車子。也用手電筒照照我們的臉，照照車子裡面，一句話不說，揮揮手，就讓我們過去了。伊蘿莎沒說錯，沒有人會懷疑那樣一部車子的。

喜歡跳傘的奶奶

就在發生這件事前後，伊蘿莎帶著我去找她的婆婆。我們兩人都喊她婆婆克萊蒙西亞 (Clemencia Isaura)，至於爲什麼這麼叫，如今也沒有人記得了。我們沒有事先知會她，在下午五點到達她家。她家相當豪華，門牌是七二七號，座落地點是聖地牙哥獨有的高地。克萊蒙西亞七十歲，是位孀婦，每天除了看看電視打發寂寞，就是夢想著早晚要出去冒險犯難，做一個女英雄。那天我們見著她，她的神情安祥，一如以往，正在看電視，喝咖啡，吃英國小餅乾；房間裡，盡是電視傳出來震耳欲聾的槍砲聲。那天她穿著一襲漂亮的灰色訂做套裝，還搭配有帽子和手套。她一向五點整喝咖啡，儘管只是單獨一人，也要打扮得像在參加宴會一般。只不過這些英國小說上看來的習俗，並不真正吻合她的性格。她在結婚生子之後，還遠赴加拿大，擔任滑翔機駕駛，後來更在跳傘紀錄上，累積出可觀的成績。

我們向她表示，有任務需要幫忙。聽到我們說任務很重要，也很危險，她回答：「太好

了！我正嫌生活太枯燥呢。每天除了化妝、服裝，再沒有其他事情可做了，真是沒有意義。」我說出需要幫忙的事——尋找五位舊日的朋友和同事，一時之間，她的臉色黯淡下來。

「如此而已，」她說，「我以為起碼要去埋炸彈呢。」

我不太想透過反抗組織的管道，尋找這五個人，因為他們都不是流亡之士。五個人當中，有一個就是在軍事政變那天通知伊莉，說他們要在電影大樓前處決我的人。另外一個在獨裁政府掌權的頭一年，一直待在集中營內，離開集中營後，他過著表面上與一般人無異的生活，實際上卻積極參與政治活動。還有一個在墨西哥待過一陣子，並在那兒聯絡上智利流亡人士，隨後文件齊備的回國，加入反抗組織。再來的一個，我與他相識於電影學校，日後又共同拍攝電影及電視，目前是活躍的勞工領袖。最後一個是卡車司機，他在意大利待過兩年，相信對我們的拍攝工作極有助益。五個人都搬過家，換過工作，改過身份，他們目前身在何處，我是一無所知。其實在智利境內，有上千人過著這種生活，他們活躍於反抗組織內，持用自一九七三年之後即變更過的假證件。總之，克萊蒙西亞必須自行理出線索，找到最終所繫的關鍵人物。

我希望她先出面接觸這幾位老朋友，探知他們的態度，然後才由我告訴他們，目前身在智利，需要他們協助。我一直不太知道，克萊蒙西亞是怎麼完成任務的。離開智利之前，我幾乎找不到時間見見她，和她深談，不過她倒是說過一句話：電視上演的再精彩，也不能跟尋找這五個人的過程相提並論。

我只知道她在貧民窟盤桓了許多天，根據我提供的零碎資料，不停的查詢，不停的比對。我事前警告過她，要留意身上衣著，免得與當地人格格不入。但是她毫不在意，漫步在屠宰區歧嶇不平的小路上，依舊是喝下午茶、吃英國餅乾的妝扮。當地人一定覺得很奇怪，這麼一位優雅的老太太，卻滿臉好奇，非常不協調的詢問一些含混不清的地址。可是她性格迷人，待人既真摯又誠懇，很快就贏得了所有人的信賴。一周結束，她不但找到三個下落不明的人，還約好他們用餐。那天她懇勤待客，彷彿在舉行一場高級社交晚宴。

尋找電子將軍的漫長過程

克萊蒙西亞忙著推展工作的同時，我經由伊蘿莎協助，利用拍片空檔，試著與高層權力圈打交道。有一晚，我和她在一家高級餐廳一邊吃晚飯，一邊等待一位密探（結果沒等到），正巧兩位戴著勳章的將軍走了進來。伊蘿莎向他們親熱的打招呼，那一瞬間，我甚至因為她的舉動，而對她的可靠性起了懷疑。一位將軍走到我們桌旁，與伊蘿莎攀談，前後幾分鐘，他似乎不知道旁邊還有我這個人。我不知道他是什麼階級，我一向分不清，將軍衣領上的星星和旅館門口的星星有什麼差別。待他走回位子，她壓低聲音告訴我，她是因為工作的關係，才有機會接觸一些高級將領。

在伊蘿莎看來，皮諾契特能夠掌權至今，有一點很重要：他讓同一輩的軍官退休，緊緊抓住年輕的一輩，由於這些人的官階一向較他低，既不是他的朋友，也不太了解他，因此對他幾乎唯命是從。但是這麼做也使他陷於危機，在這些新貴的心目中，無論是暗殺阿葉德，

篡奪政權，或是隨後的血腥年代，跟他們都是沒有關聯的。他們自覺雙手清白，認爲早晚要和民衆達成協定，回歸民主。見我面露訝異，她又說道：至少有一位將軍願意面對大眾，揭露軍隊內部的權力分裂。

「他恨不得一吐爲快。」她告訴我。

聽到這條消息，我全身禁不住的顫慄起來。如果我能在紀錄片中收進這個證詞，不知道會有多驚人呢！對於未來幾天，我開始充滿期望。只有一點很遺憾，伊蘿莎無法冒險爲我做好初步聯繫，事實上，她也沒有時間，幾天之內，她就要和先生一塊兒到歐洲旅行三個月去了。

過了幾天，克萊蒙西亞要我到她家去，並傳了一句伊蘿莎留下的暗語給我，使我能見著「電子將軍」——這是我們給這位異議軍官起的別號。她還給我一盤小小的棋盤電子遊戲，讓我在隔天下午五點，帶著前往聖法蘭西斯可教堂。

我已經記不得上次進教堂是什麼時候了；在那裡面，只見男人女人四處散坐著，或是看報紙、讀書，或是織毛衣、玩紙牌、猜字謎。我終於了解伊蘿莎給我棋盤的緣故，沒有了它，

才真奇怪呢。也有人避著午後的陽光，站在陰影下，默默沈思；我剛回智利的那晚，也見過這樣的人。其實在共同聯盟之前，智利人一直是這樣的，直到阿葉德競選總統期間，情況才完全改觀。那時跡象只是顯示他很可能會贏，然而等到他真的勝利了，國家便在一夜間翻轉了過來。我們跑到街上去唱歌，在牆壁上畫圖，表演街頭戲劇，還放映街頭電影；街道上擠滿了人潮，每個人都盡情慶祝渲洩自己的快樂。

連續兩天，我在教堂裡跟自己偽裝的烏拉圭人玩棋。到了第二天，我終於聽到一個女人說話的聲音，她離我很近，可是聲量極小。由於我是坐著的，而她則跪在我後面的凳子上，因此聲音正好穿進我的耳朵。

「別看我，也別說話，」她的聲量讓人覺得她在做告解。「記住下面的電話和暗語，不過你要等我走了至少十五分鐘，才能夠離開。」

等到她站起身，走向主祭壇，我才看到她是個年輕而且非常美麗的修女。我只需記住暗語就行了，因為我已用棋子在盤上標下了電話。我本以為這下子必可聯絡上電子將軍了，卻不料事情又發生變化。接下去幾天，我愈來愈焦急，因為每次只要我撥下電話，得到的都是

相同的答案：「明天再打來。」

第八章 預備，有個將軍願意和盤托出一切

辨認秘密警察

真是禍不單行，克勞德也帶來了壞消息。他在聖地牙哥看到一份一周前巴黎發行的法文報紙，說有三名意大利攝影人員，在智利拍片時，因為身份可疑而遭逮捕。逮捕當時，他們正在拍帕布羅西尼，然而身上卻沒有許可證。

弗朗基覺得我們也要遭殃了，我則設法讓自己表現得若無其事。克勞德跟意大利人一樣，並不知道有其他人跟我一起工作，他會感到害怕，完全是因為自己做了假設：如果有人在那種情況下遭到逮捕，他自然也可能步上同樣的後塵。我只有不斷設法向他保證，我們是不會受到波及的。

等他一離開，我立刻就查詢意大利人，並得知葛瑞西亞從歐洲回來了，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很安全，都還在應該在的地方。不過雨果卻證實，這篇報導也出現在意大利，只是隨後又給意大利新聞社撤了回去。而最糟糕的是，這篇報導明明是誤報的，可卻登載了他們的真實姓

名，而且正在四處流傳。聖地牙哥在獨裁統治下，不知何時，竟成了謠言大本營，任何消息到了這兒，都會給添油加醋一番，以倍數成長的方式，向四方快速散播。這些傳聞多少都有一些事實的根據，到了最後，也都會自動的消失；有關意大利人的報導，自然也不會例外。當晚他們到意大利大使館參加一項歡迎會時，外面早已傳得風風雨雨，結果出來招呼他們的不是別人，正是新聞處主任本人，他用全場都聽得到的聲量，向眾人說道：「各位，這三位就是你們要的人犯。」

葛瑞西亞甚至覺得，早在那篇報導出現之前，就有人在跟蹤他們了。當天他們一群人離開大使館，回到旅館後，發現衣箱和文件竟然都有搜查過的痕跡。也許是不安使他們產生了幻覺，也許的確是有人要警告他們，總之，我們應該了解，有些事情似乎真的要發生了。

爲了預防逮捕，我整夜未睡，寫了一封信給最高法院的首長；儘管智利實行的是軍事獨裁，法院首長還是保有部份的獨立權。我在信中，陳述了秘密潛回祖國的前因後果。我會寫這封信，絕不是一時的衝動，以前我就考慮過了，只不過，如今情況比以前還要危急，而包圍圈也比以前還要緊縮罷了。我開始寫信時，還抱著戲劇性的態度，就像一個人在荒島上，

準備丟一封瓶中信到海裡一樣。但是一旦動筆了，我才感覺到，我應該爲這信加上人道精神和政治意義，好爲幾千個飽受流亡之苦的智利人表達內心的感受。我寫了好幾次開頭，撕掉好多張紙；坐在旅館房內的幽暗燈光下，我好似在祖國的土地上，自行圈起一塊私人的放逐之地了。我的信還沒寫完，教堂鐘聲便已響起，彌撒的聲音驅散了宵禁的寂靜，清晨的第一線陽光穿過重重陰影，爲這難忘的秋季展開了另一個嶄新的一天。

第九章

連我母親也認不出我



● 要求廢止軍法審判和秘密警察制度的政治犯家屬
(聖地牙哥，一九八五年)



● 住在聖地牙哥貧民窟的一家

從許多跡象看來，警方應當知道我進了智利，也知道我們在做些什麼。我們在聖地牙哥待了快一個月了，平日裡，攝影小組出出入入公共場合，連不該出去的時候也出去。我們還接觸各式各樣不同的人，當中許多人知道了我就是影片導演。此外，我常常會忘掉自己偽裝的身分，忘記講話要帶烏拉圭口音。傳遞暗語或是和其他人聯絡的時候，也愈來愈疏忽懶散，有時候甚至拿自己的安全開玩笑。

剛開始拍片的時候，我們總是在車子裡開會。我們會讓車子在市內隨意繞行，而且每隔四、五條街就換一次車子。漸漸的，我們嫌事情麻煩，不再像從前那麼謹慎，結果就開始遭遇危險了。有時候，這些危險帶來的威脅，竟比我們真正想避免的危險還要嚴重。就舉個例子好了。有一天晚上，我在普維得西(Providencia)街和洛里尼(Los Leones)街交叉口上車，等五分鐘之後一部藍色雷諾十二來接我，這車子擋風玻璃上會貼一張保護動物協會的貼紙做爲識別。車子分秒無誤準時到達，是雷諾十二沒錯，是藍色也沒錯，我懶得再去看貼紙，鑽進了後座。裡面坐著一個女人，年紀不算輕，可是還很漂亮。她身上垂掛著珠寶首飾，渾身散發誘人的香水味，外面還罩著一件粉紅色的貂皮大衣，那衣服的價值起碼是那部車子的兩

倍到三倍。她算是典型的聖地牙哥上流社會人物了，這種人一般場合裡是不容易見得到的。看到我進車子，她的嘴巴吃驚得張了開來。爲了讓她安心，我趕緊說出暗語：「這個時候那裡買得到傘呢？」

前座穿制服的司機這時回過頭，對著我大叫：「滾出去，不然我就叫警察。」

我撇了一眼擋風玻璃，那上面當然是什麼貼紙也不會有。對於眼前的荒謬，我忽然有一種噁心的感覺。「抱歉，」我含含混混的說，「我好像上錯車了。」這時候，女人也恢復了正常神色，她拉住我的手臂，爲了讓司機放心似的，語音清晰的問他，「巴黎百貨公司現在還開著嗎？」

司機說他想是開的，她便堅持送我過去買傘。她的個性既可愛又熱誠，較之美麗的容顏，一點也不遜色。相信沒有人會不願意在她身邊多待一會兒，多享受一點有她陪伴的樂趣，暫時把那些壓迫、政治，甚至藝術，統統拋到九霄雲外的。她在巴黎百貨公司門前讓我下車，還一再爲不能陪我進去買傘致歉，只因爲她必須去接她先生參加音樂會，而她已经遲到了。

這一類的意外，對我們來說，簡直快成了家常便飯了。參加秘密會議時，我們漸漸不用

暗語辨明身分，和密使碰面時，也不再以辦正事爲第一要務；我們只是聚在一起高談闊論，或是批評時政，或是說電影，論文學，有時候還談到我們都認識而我又想見的朋友——儘管有人警告我，絕不能有這個念頭。也許是爲了減低懷疑吧，有一次，一位密使還帶著孩子一起赴會。他那孩子看到我後便睜著大眼，興奮的問：「你就是在拍『超人』的那個導演嗎？」到了這時候，我終於了解，秘密生活在智利其實是很容易的。好幾百個流亡人士都回來了，他們過著日常的生活，既不擔心，也不害怕，一點也沒有我剛回國時的戒慎恐懼。自從了解這點後，我心裡也蠢動了起來，若不是對影片還有責任，對國家、對朋友、對自己也還還有義務，我真想換個職業，換個環境，就以本來面目在聖地牙哥待了下來。

不過一旦考慮到警方很可能在監視我們，我還是保持了偽裝的模樣。當時我們申請拍攝摩尼達宮都好幾次了，卻一再的遭到延擱，原因在那裡沒有人知道，只知道還會再延下去。除了摩尼達宮，我們也計畫拍蒙特港(Puerto Mont)和中央谷地(Central Valley)，當然了，更要拍電子將軍——只是可能性似乎並不大。除了這些地方，我還想親自跑一趟中央谷地。我是在那兒長大的，到了青年期才離開。我母親仍在那兒，住在一個名爲波米拉(Palmilla)的

貧窮村莊裡，不過有人鄭重警告過我，要顧慮安全，不能去找她。

當時我處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新安排外國組員的行程，這樣他們才能少冒一點風險，盡快拍完，盡早回到自己的國家。除了意大利人要留下來拍摩尼達宮外，再過幾天法國組一拍完失業群眾的示威遊行，就會即刻束裝返國。

至於荷蘭組，則在蒙特港等我，我們打算遠赴南極圈附近拍攝。拍完這個部分後，他們會轉往智利邊境的小鎮巴瑞隆屈(Bariolche)，從那兒進入阿根廷。這三組人員離開智利的同時，影片也完成了百分之八十，安全送到了馬德里，開始在沖洗了。後來我發現，艾莉效率極好，我還沒回到西班牙，影片竟都準備好，可以剪接了。

立頓來了，拍好了，走了。

那幾天，情況很不穩定，最好的辦法，似乎就是讓我和弗朗基暫時離開，然後再非常小心的盡快回來。當時我們想到一個絕佳方式，我們發現，從阿根廷進入蒙特港，跟從智利過去並沒有差別，兩邊都一樣的方便。我於是要求荷蘭組到蒙特港等我，另外我還知會一組智利人員，要他們前往位於智利中央的可強瓜(Colchagua)谷地。接著，我和弗朗基便搭機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了。離境前幾小時，我打了個電話給〈分析家〉(Análisis)雜誌，跟一位名叫派翠西亞·柯里兒(Patricia Collier)的記者詳談，告訴她秘密潛入智利的過程。等我裝模做樣離開智利後兩天，文章便刊了出來。他們在雜誌封面上登出我的照片，標題則引用了羅馬的諺語：「立頓來了，拍好了，走了。」

爲了製造逼真效果，克萊蒙西亞特意開車，送我和弗朗基到普大宏機場，還跟我們擁抱、道別，並且誇張的灑下淚水。我們就這樣喧喧嚷嚷的走了，其實機場裡還有反抗組織的人暗

地看著我們，萬一有人逮捕我們，他們立刻就會公諸於衆的。我們在離境時發現，機場裡沒有人監視我們，可是萬一日後警方有後續行動，要追查我們的蹤跡，他們一定可以從機場紀錄上發現，我們早就離境了。

我決定拿合法護照進布宜諾斯艾利斯，畢竟沒有人願意在友善國家做違法事情的。站在阿根廷移民官員窗口前，才準備掏護照，忽然間，我想到一個問題：護照上的照片是我在偽裝前照的，跟現在的我根本是兩回事。如今的我眉毛拔掉了，頭頂禿了一大塊，還戴上厚厚的眼鏡，跟原來差別太大了。記得早在出發以前，美容專家就告訴過我，成爲全新的一個人固然困難，恢復原本的自己卻一點也不簡單。而今，就在最需要記住這點忠告的時候，我卻忘得一乾二淨；還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官員沒有看我的臉。就這樣，我又過了一次難關，只不過這次的問題是，我想扮演自己，卻沒扮成。

由於弗朗基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後，還得打電話到馬德里，和伊莉討論剩餘行程的細節，因此我們商議好到聖地牙哥再見，就分手各自上路了。我搭機到阿根廷西部的門多薩(Mendoza)，按照計畫，拍了一些智利主要山脈的風景。從門多薩進到智利非常容易，只要通過一

條管制鬆散的隧道就行了。我帶著一架輕盈的十六釐米攝影機，單獨步行過去，拍完該拍的鏡頭後，便搭一個智利警察的車子回來了。那警察完全是出於同情，想幫助一個沒辦法回阿根廷的可憐烏拉圭記者。

回到門多薩後，我往南到了另一個邊境城市巴瑞隆屈。在那兒，我搭上一條擠滿各國乘客——有阿根廷人、烏拉圭人、巴西人、智利人——的老舊木船，穿過極圈特有的景色，看到冰崖，經歷過暴風巨浪，到達智利邊境。接下來便是前往波維多蒙特的最後一程，這次我改搭渡船前往。那渡船的窗子破了，冷風全都灌了進來，呼嘯耳際，就像狼群在四周嗥叫似的。儘管寒風刺骨，我卻找不到一點掩蔽的地方。船上也沒有喝的東西，沒有咖啡，沒有酒，什麼都沒有。這一路的行程都是我們事先計畫好的，我們是想，如果我們離開時的確引起了機場警察的注意，那麼他們一定想不到，我會在第二天，從遠離聖地牙哥六百多哩的地方，重新回到智利。

我們到邊境檢查站沒一會，護照就全部集中到一處去了，大約有三百本之多。檢查的人幾乎不看護照一眼，就蓋上印，還給了大家。至於智利人，則必須比對一長串的名字。這些

名字全部列在名單上，貼在檢查官員旁邊的牆上，都是不得回國的流亡人士。若不是中途冒出兩個人，要大家打開行李讓他們檢查的話，連我在內的所有外國人，原本都是可以很快通關的。這兩人都穿著厚重的禦寒衣，所以才沒認出他們國家警備隊員的身分。他們檢查得相當仔細，可是我一點也不擔心，我的行李中並沒有什麼東西會洩露我的身分。我打開了袋子，突然間，一大堆的吉塔尼空煙盒掉出來，散了滿地，許多盒上還寫滿字，都是我拍片時的札記。

當初決定回智利我便放了足夠兩個月消耗的吉塔尼在行李箱中。每抽完一包，我都不敢把空盒子扔掉，我擔心那種硬紙板做的大盒子太醒目，會留下一些線索給警方。抽完煙的時候如果正好拍片，我會把空盒子放進口袋，稍後再安置到幾個固定地點。我還在一些盒子上面塗鴉，記一些東西，這麼一來，盒子當然更不能丟了。到了最後我發覺自己終於成了變魔術的人。在我四周，到處都是空的煙盒子；櫃子裡，衣服口袋都是滿的，床墊下也是滿的，連袋子裡都滿了。所有的盒子都在等待，等我想到一個好辦法，處理掉它們。我就像準備越獄的犯人，地道都挖好了，只是不知道怎麼處置挖出來的沙土。

每次我打好包要換旅館了，就會煩惱這個問題，然而每次我都想不出更理想的辦法，只好再度把它們放進行李箱。我會想過湮滅它們，可是又擔心有人出其不意的撞見了，平日增添許多疑惑。我也想過到阿根廷丟棄它們，可是真到了那兒，時間卻又變得非常的緊迫。在到達這個南方邊境前，我一直沒有機會打開袋子，如今不得不打開，也不得不面對武裝警察吃驚中摻雜著懷疑的表情了，我能做的，也只是戰戰兢兢的，低頭猛撿滾落四處的盒子了。

「裡面是空的。」我說。

他們當然不相信了。兩個人當中，年紀較輕的那個忙著檢查其他的旅客，較年長的則打開每個盒子，裡裡外外的查看，想把那些「札記」弄個明白。這時我稍微恢復了點勇氣。

「都是我靈感來的時候寫的短詩。」我說。

他不答腔，繼續檢查。最後，他抬起頭，照直看著我的臉，想從我的表情裡得到一些線索，解開這些空煙盒的秘密。

「你可以把它們都留下來。」我建議道。

「我留著它們做什麼？」他回答。

接著他便幫忙我，把盒子全部整齊的放回行李箱，然後轉身檢查下一位旅客。當時我太慌亂了，居然沒想到當著武裝警察的面，把盒子全部倒進垃圾堆，反而繼續拖著它們，走完剩下的行程。回到馬德里後，我不讓伊莉丟了它們，我特意留下它們，細細的欣賞，讓它們帶我回想在智利遭遇的種種磨難。

「爲國家未來的主人翁照一張吧」

荷蘭組如約在波維多蒙特等我。我們去那兒拍攝，不只是爲了那兒無法名狀的美景，更爲了當地在智利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那塊土地一直是非不斷，法瑞總統當政期間，曾經殘酷的鎮壓當地的民衆，使得政府在那兒僅餘的一點德澤，也給抹煞得一乾二淨。經過那次，左派民主人士才真正了解，唯有團結，才能讓這塊地方有希望，並且讓這個國家有希望。接下來，事情便發展得迅速而且停不下來，到了最後，終於使得阿葉德當選成爲總統。

拍完波維多蒙特，連帶也拍完南方部分後，荷蘭組便經由巴瑞隆屈，進了布宜諾斯艾利斯。他們還帶著爲數可觀的影片，要去馬德里交給伊莉。至於我，則獨自一人搭乘夜車前去塔耳卡(Talca)。車子很舒服，路上也沒發生什麼事，只除了一件——我和一隻烤雞短兵相接一陣之後，又讓它完整無缺的給送回了廚房，因爲我實在想不出辦法，在那個鐵甲似的屍身上弄出一點點缺口。到了塔耳卡之後，我租了一輛車子，開到位於可強瓜山谷中央的聖法南

度(San Fernando)鎮。

小鎮廣場一點兒也沒變，還是我記憶中的模樣；那兒的每一棵樹，每一堵牆上的磚頭，都有我兒時的記憶在裡面。最難忘的仍要屬那間老學校了，那是我學會讀書、寫字的地方。我找了張凳子坐下，想拍些畫面，以備日後影片需要。這時廣場漸漸來了許多兒童，吵吵鬧鬧的，正往學校走去。有些人走到攝影機前，停下來擺一個姿勢，還有人故意拿手擋住鏡頭。一個小女孩在鏡頭前做了幾個舞蹈動作，姿勢之純熟，讓我不得不另外找個較好的背景要她重來一次。就在這時候，幾個男孩走過來，坐在我旁邊，問道：「想不想幫國家未來的主人翁照一張呀？」

這話嚇了我一跳，讓我想到記在空煙盒上的一句話：談到未來，似乎每個智利人都有一套自己的想法。這點在兒童身上尤其明顯。這一代的兒童，其實從未經驗別種社會體制，可是他們對未來的信念，仍然堅定異常。

我約好了智利組，早上十一點在麥桂斯(Maquis)橋碰面。十一點整，我準時到達河的右邊岸上，當時攝影機在另外一邊也架好了。那天早上天氣晴朗，空氣裡溢著的都是百里香的

氣味。在那兒，我覺得很安全，很自在，完全沒有那種身在國土心在放逐的感覺。那幾天，我想暫時拋掉偽裝，於是拿掉脖子上的領帶，身上的英國西裝，換穿自己的羊皮夾克和牛仔褲。此外，我的頰上還有兩天未刮的鬍子，是來去一趟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傑作，那也讓我覺得更像本來的自己。

我等攝影師在鏡頭裡對準了我，便跨出車子，慢慢走過橋面，讓他有足夠的時間拍我。拍完後，我便跟攝影人員一一握手致意。他們都很熱誠，都有超乎年齡的成熟，輕易就讓人感受到活潑輕鬆的氣氛。我很意外，他們都還只是大男孩，一個十五歲，一個十六歲，一個十九歲；導演雷卡度廿一歲，其他人就叫他「老頭子」了。那時候最讓我鼓舞的不是其他，正是從這些組員身上得到的信心。

我們一邊倚著橋上欄杆，一邊就計畫好了拍攝的內容，並且立刻著手進行。我必須承認，那天我有點兒心神不寧的，一直在回憶兒時的各種生活片段。我還記得十二歲那年，一群粗魯的表姊妹便是在這個橋上，硬把我推下水，想讓我學會游泳和潛水。於是那天我就從那條橋開始拍起。

不過等到開始拍攝，我還是恢復了常態，並沒有忘記當天的主要目的。聖法南度山谷是一片廣大的農業區，從人們有記憶開始，那兒的農人就是奴隸。一直等阿葉德的共同聯盟政府上台了，他們才破天荒第一次真正有了民權。那地方從前是封建寡頭政體的大本營，無論是選票或選舉結果，都操縱在諸侯的手上。法瑞的基督教民主黨時期，第一次大規模的農民示威，就是由那兒發起的，當時阿葉德也走在遊行行列裡面。後來阿葉德掌權了，便削去地主過度的特權，還協助農民，組織主動而且互助的團體。如今，皮諾契特的夏季別墅就在這山谷裡，具體象徵出了智利在歷史上的倒退現象。

到了這兒，我可不能不多少拍一些帕拉修斯(Don Nicolás Palacios)的雕像。此人是《智利民族》一書的作者，在那本怪書裡，帕拉修斯堅持，真正的智利人——比巴士克人(Basque)、意大利人、阿拉伯人、法國人、德國人更早的移民——是古希臘人的直接後裔，所以，智利人註定了要成爲拉丁美洲的領導中心，要帶領這個世界通向真理，獲得解救。我就是在這附近出生的，小時候，我每天要從這雕像前面走過好幾次，可是從來沒有人告訴過他是誰。皮諾契特堪稱帕拉修斯的第一號崇拜者，他另外在聖地牙哥豎立一座雕像，把這人從

歷史塵埃中拯救了出來。

我們拍到晚上才收工，由於必須在宵禁前趕回聖地牙哥，而兩邊距離有九十哩之多，所以時間便顯得很急迫了。除了我，還有坐我車子的雷卡度(Ricardo)之外，所有的人都直接回去聖地牙哥。至於我們，則沿著海岸線繞了一大段路，好為隔天選擇拍攝的場景。我們全神貫注在選景上面，連過了四個警方檢查站，都忘了緊張這回事。不過在通過第一個檢查站後，我還是提高了警覺，換掉導演密戈爾·立頓的休閒裝，變回他拘謹的烏拉圭伙伴。我們完全忽略了時間，等到察覺時，都已經是午夜，宵禁早就開始半小時了。等察覺了時間，我們才忽然恐慌起來。我要雷卡度立刻開下高速公路，順著一條泥路走去。我仍記得那條路，印象中，好似昨天才走過一樣。我指揮他左轉，過橋，走向右邊一條路跡模糊的小徑，然後關掉車前燈，沿著另一條有許多彎道和陡坡的泥路前進。就在這樣一陣慌亂之後，我們進了一個沈睡中的村子。一進去，所有的狗都讓我們給吵醒了，而我們的車子居然正停在我母親的屋子前面。

「你一定是我孩子的朋友」

波米拉這村子有四百個居民，從我有記憶起到現在，它從來沒變過。我的祖父生在巴勒斯坦的貝斯沙加耳 (Beith Sagur)，我的外祖父生在希臘的克利卡坎米 (Cristos Cucumides)，本世紀初，他們隨著首批定居火車站附近的移民，來到了此地。過去，波米拉是鐵路終站，頗有一點重要性，而今，鐵路卻從聖地牙哥一直延伸到海岸去了。從前，旅客們在這兒上下車，貨物在這兒裝卸；正由於這些來去不斷的旅客和貨物，波米拉才短暫的繁榮過一陣子。然而不消多久，鐵路便延長到了海邊，而車站也變成火車頭停下十分鐘，義務性加水的地方。只不過，加水總不時的會延宕下去，最後就變成需時全天的大事了。每次火車走到我的阿拉伯裔祖母瑪堤蒂 (Maidie) 的屋子的位置，都會嗚笛宣示快到了。這村子的人口從沒多過現在這個數目。村裡有一條長長的馬路，馬路兩邊零星的散佈有一些房子，另外還有一條叉路，那兒的房子就更少了。村子底有個地方很有名，叫拉卡立瑞 (La Calera)，在那裡，家家戶

戶都自釀很棒的葡萄酒，他們還會邀請所有過路人進去品酒，兼而評鑑誰的酒最出色。有一陣子，拉卡立瑞甚至變成全智利酒鬼的天堂。

波米拉最早出現電影雜誌，是由瑪堤蒂帶進來的，從那時候開始，我對這類雜誌就如痴如醉了。她還大方的借出房子對面的果園，讓馬戲團、巡迴劇團、木偶戲藝人在那兒表演。我也在那兒看到了電影，在我們這種偏僻小村，能夠看到電影並不是容易的事。記得那年我五歲，坐在祖母腿上，看了生平第一部片子後，就確定了未來的人生志向。那部片子的名稱是「勇敢的熱內亞人」(Genevra of Bravante)，直到現在，我還記得那時候的感覺——嚇呆了。過了好幾年，我才弄懂：馬匹怎麼會在銀幕上狂奔，巨人頭又怎麼會在樹上懸掛的被單上出現。

那天晚上我和雷卡度去的房子，原本是我祖母的，現在則由我母親克莉絲汀娜住在裡面。在那兒，我度過了童年，到了青年時期才離開。房子是很久以前蓋的，屬於傳統智利鄉村的樣式，有長長的迴廊，幽暗的廳堂，廳堂旁邊是迷宮一樣房間，還有一個大廚房，馬廄和牧草地就在房子附近。這房子座落在一個叫洛斯納隆荷斯(Los Naranjos)的地區，那兒到處

可見茂盛的九重葛，空氣裡也總是飄著濃濃的苦橘香。

當時我心裡只想著「到家了」、「到家了」，結果車子還沒停穩，人就跨出了車門。我穿過空蕩蕩的走道，越過漆黑的院子，只見一隻笨狗纏著我的腿，略略表示牠的歡迎。我一路走下去，一路都見不到一點人影。每走一步，我就會回憶起過去的一些片段；或是每天裡一個特殊的時候，或是一些久未嗅過的氣味。走過長長的廳堂，到了末端的起居室，我跨了進去，頭頂卻撞到了門框。裡面只亮了一盞燈炮，有點昏黃，我的母親就在那兒。

眼前的景象有些奇異；起居室的面積很大屋頂很高，牆壁卻一片空白，而且裡面除了兩張有扶手的椅子，沒有任何家具。我母親坐在椅子上，背對著門，旁邊是一個火盆。另一張椅子上則坐著她弟弟，我的帕布羅舅(Uncle Pablo)。他們靜靜的坐著，臉上的表情在滿足中帶著穩當，好像正在看電視一樣，其實他們那兒都沒在看。我走向他們，儘管走路時有聲響發出，他們卻一動也不動，我只好說，「這屋子裡的人都不打招呼的嗎？」

我母親站了起來。

「你一定是我孩子的朋友，」她說，「讓我擁抱你一下。」

自從我十二年前離開智利，帕布羅舅就沒見過我，此時他仍紋風不動的坐在椅子上。去年九月，我母親曾來馬德里和我碰面，如今她也擁抱過我了，卻仍不能認得出我。我只好握住她的雙臂輕輕的搖晃，想把她那點困惑的神色搖掉。

我緊盯住她的雙眼，我說，「看清楚，克莉絲汀娜，是我。」
她更仔細的湊向我，不過還是認不出來。

「我不知道你是誰。」她說。

「怎麼會不知道呢？」我說，禁不住大笑起來，「我是你兒子，密戈爾。」
她再一次看我，這次她臉上的血色開始消退了。

「唉呀！」她說，「我要昏倒了。」

我上前扶住她，免得她倒下，帕布羅舅此時也站了起來，臉上同樣是困惑之極的表情。

「我做夢也想不到能在這兒見到你，」他說，「現在我就算立刻瞑目，也不會有任何遺憾了。」

我衝上去抱住他。他好像一隻小鳥，頭髮全白了，身上還裹著老人用的毯子，然而事實

上，他只比我大五歲而已。他結過一次婚，可是離掉了，後來就搬進我母親的房子住了下來。他一直就那麼孤孤單單的，即使還在小孩的時候，也像個老人一樣。

「少來這套，舅舅，」我說，「少拿這來嚇我。還是拿酒出來，慶祝我回家吧。」

我母親打斷我們，讓我們見識到所謂超自然的感應力。

「我準備好了麥絲脫 (mastul)。」她說。

我根本不敢相信她說的，直到走進廚房親眼看見了，才不再懷疑。希臘家庭只為最重要的節日準備麥絲脫這道菜，因為它的製作過程太繁複了。這菜的成分有羊肉、山藜豆、粗小麥粉球，很像阿拉伯人吃的庫司庫司 (Arab couscous)。那年我母親還是頭一次做這道菜——沒有特別原因，純粹是一時興起。

雷卡度和我們一塊吃過東西，就上床睡覺了，好讓我們有時間單獨相處。我舅舅很快的也去休息，只留下我和母親，繼續聊到東方發白。我和母親的年齡差距不大，我們之間就像朋友，一向有話說。我母親在十六歲那年嫁給我父親，一年後就生下我了。至今，我還能很清楚的記得她二十歲時的模樣，那時她很漂亮，很溫柔，總當我是個洋娃娃，而不是個孩子，

常常的跟我玩。

她雖然因我回來而滿臉燦然，但是又因我的衣著而略顯沮喪。「你看起來像個牧師。」她對我說。我沒有解釋，也沒有說出回智利的目的，或是回來的方法，這樣她才會以為，從我回來，到站在那兒，一切都是合法的。我寧可她蒙在鼓裡，對我的冒險一無所悉，也不願她擔心，更不願她發生危險。

眼看黎明就要來臨，她拿著插有一根蠟燭的燭台，拉住我的手，一句話不說的穿過院子；一時間，我們彷彿走進狄更斯的小說了。我在院子後端，看到此行最大的意外，最特殊的驚喜——我聖地牙哥房子的書房。從房間的建構，到屋內的擺設，那書房都跟我離開聖地牙哥，開始流亡生涯時，沒有一點差別。

士兵最後一次搜索我房子時，我、伊莉和孩子都在墨西哥了。等搜查一結束，我母親便僱了一位建築師朋友，把我書房的木板一塊一塊的拆下，在我們波米拉的房子旁邊，重新一模一樣的蓋了一間。從房內擺設看來，我好像從來沒有遠離過，所有我寫過的文稿，兒時的遊戲之作，電影場景的大綱，背景設計，都一樣不差的擺在那兒，就連凌亂程度也沒有差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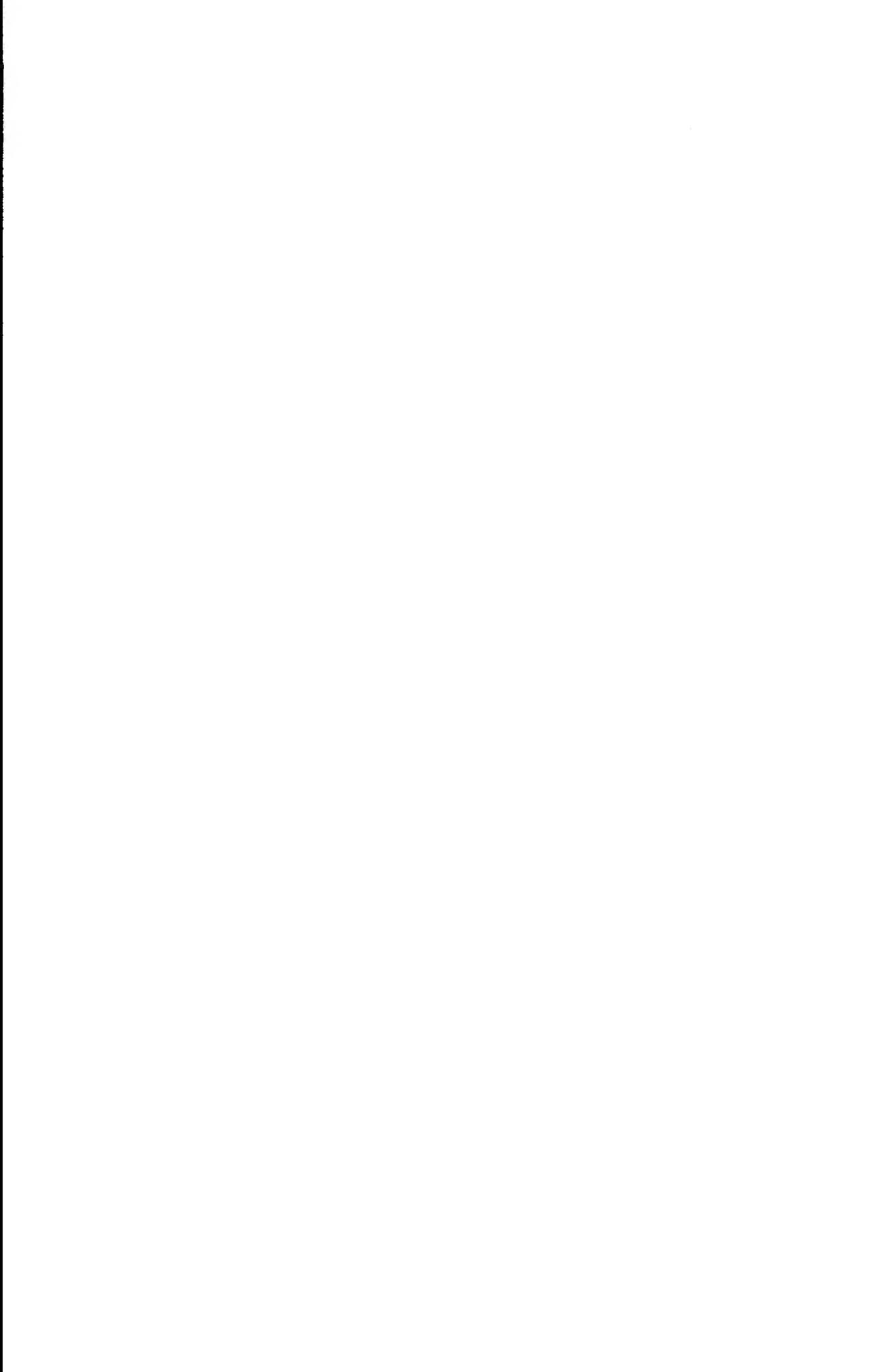
我可以感受到房裡的氣氛，嗅到空氣裡的味道，一切都是那麼的熟悉，恍然間，彷彿我又回到那天的那個時刻，站在那兒看著書房，向它說著「永別了」；那分感覺竟又重新鮮明的回到了我心中。經過十二年，我站在院子裡，再度望著我的書房，心裡卻不明白，母親忍著悲痛，蓋出一間同樣的房子，是爲了有朝一日我回國時可以免去思物之苦嗎？還是爲了他日我若客死異鄉，她可以睹物而思人？

第十章

警方獻上的最後慫勤



● 密戈爾·立頓(左)與賈西亞·馬奎斯合影



我們才回聖地牙哥，便感覺到了瀰漫四周的風暴之氣。首先是包圍圈愈來愈緊，幾乎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其次便是在前不久才舉行過的失業人士大遊行中，警方野蠻的痛毆參加者，而我們也有好幾名人員遭到波及。除此之外，雖然我們精心安排了離境的一幕，工作伙伴們卻不以爲瞞得過他人耳目，連克萊蒙西亞都覺得，我們就像無知的小綿羊，正一步一步走進獅子的洞穴。我不斷和異議人士電子將軍聯絡，卻不斷受到挫折，得到的答案永遠一成不變：「明天再打來。」就在這時候，突然間，意大利組接到通知，表示拍攝摩尼達宮的准許已經下來，隔天早上十一點就可以前往了。

此時此地，很難相信那不是個陷阱、雖然我不在乎冒這個險，卻不能要求意大利人跟著進去，畢竟沒有人知道裡面是否有埋伏，而我個人又負擔不起可能發生的意外。不過意大利組在自行考慮後，還是決定不計危險，按照原定計畫前去。此時法國組的事情都辦完了，已經沒有必要再留下來，於是就在我們召開的一次緊急會議中，我要他們盡早搭機離開，並且帶走他們拍好的片子，以便送到馬德里。他們走的那個下午，意大利組正在我的指導下，拍攝皮諾契特將軍的辦公室。

我在進摩尼達宮前，就把準備寄去高等法院的信交給弗朗基了。在此之前，我一直把信放在隨身公事包裡，不能決定要不要拿去寄，不過在把信交給弗朗基的同時，我卻要他立刻寄走，而他也確實照辦了。我還給他幾個電話號碼，都是依蓮娜留下，以備情況危急時用的。

那天早上十點四十五分，弗朗基在街角放下我。意大利組已經到了，正在等候，我們於是一起進宮去。當時有件事極端諷刺：那天我根本沒有偽裝成烏拉圭廣告商，直接就穿著自己的牛仔褲和兔毛邊夾克了。外國人的證件事先都得仔細檢查，因此，包括記者葛瑞西亞，攝影師雨果，音效師蓋多在內，自然無一人倖免了。反觀其餘的助理，雖然名字也列在申請表格上，卻不需要遞交任何證件。這點對我非常有利，我帶著燈光設備和大捆電線，也混了進去。

我們連續拍了兩天，表現得有條不紊，而且極具效率。當時一直有三位年輕軍官在旁邊看著我們，他們不僅態度親切還輪流陪我們四處走動。房子裡，只要有重建過的痕跡，就特別引起我們注意。葛瑞西亞事先就做好了準備，仔細研究過意籍建築師托斯卡和智利境內的意大利式建築，免得拍片時露出破綻。那些軍人也是有備而來的，只見他們自信滿滿，長篇大論，不只說明摩尼達宮裡每個房間的歷史和特色，還說出根據原建築重建的過程。只不過，

他們卻刻意閃爍其詞，遺漏掉許多事實，以免提到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那天。其實，如果暫且不提阿葉德政權，也不提他在宮中建構的部份，這房子倒真是一點不差，照著原型建起來的。我們在拍攝時，只見入口有些關著，有些開著，牆壁有敲掉的，磚塊有移動過的。到了最後，拍攝終止於莫內達八十(Morandé 80)門口，那兒一向是總統接待私人訪客的地方。宮內改變最明顯的，要屬公共走廊以及出入大門了，即使是熟悉舊宮的人，如今也無法分辨正確的方向。

多年來，部長會議室一直展覽著「獨立的一幕」這幅畫，可是當我們要求觀看時，官員們的臉色卻難看了起來。我們早知此畫已遭炸毀，但是那些官員卻不肯承認，只是一再敷衍：稍後拿到許可就可以拍了。等到最後我們都拍完了，他們還在說著稍後。此外，他們也說不出唐·笛哥·波特耳(Don Diego Portales)的桌子那裡去了，更別提那些前任總統留下，放在小陳列館展覽的遺物，因為這些東西早就在大火中燒得一乾二淨的了。我們在猜想，說不定所有自歐赫金(O' Higgins)以來的總統半身像，也都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儘管市井普遍傳聞，軍事政府從陳列室挪走頭像，無非是不想讓阿葉德也出現其中。任何人只要在宮內走

過一圈，一定會獲得一個初步印象：每一樣東西都徹底的改變過，目的無他，只是不想讓遭暗殺而死的那位總統，在人們心中留下一絲一毫痕跡。

我們在摩尼達宮的第二天，大約十一點的時候，突然聽到了一陣急促的軍靴聲，以及伴隨而來的金屬撞擊聲。聽到聲響，陪伴我們的軍官神態大變，立刻非常粗魯的要我們關燈停機。兩名便衣保鏢還站在我們面前，非常明顯的，是預防我們有任何拍攝動作。我們正自納悶，不知出了什麼事，卻見到臉色泛青、滿面橫肉的皮諾契特將軍，正往辦公室走去，旁邊還跟著一名軍官和兩名社會人士。那一瞥其實極其短暫，但是由於我們靠他非常近，所以甚至聽到了他走過時說的話：「女人就算說實話，也不能相信。」

雨果僵立原地，手指癱在攝影機開關上，眼睜睜的看著機會從眼前溜逝。「如果有人蓄意殺他，」事後他說，「可真是易如反掌。」那時我們雖然還有三小時可用，卻沒有人有心情再繼續拍下去了。

餐廳裡瘋瘋癲癲的人

我們一拍完摩尼達宮，意大利組就立刻離境，沿路上都沒有遭遇任何難題。他們同時帶走了影片的最後一部份，加上這部份，影片全長將可達十萬五千六百一十六呎。後來經過我在馬德里的六個月剪接，出來的成品包括了四小時的電視版，以及兩小時的電影版。

至此，我們算是達成了最初的計畫，照理說，是離開智利的時候了。不過我和弗朗基卻又多待了四天，以便接觸到電子將軍。我按著電話指示，連續兩天，每隔六小時，就到同一家咖啡店等候。在那兒，我會選一張桌子坐下，耐心的等，一邊還看那本搭飛機時的護身符《消失的足音》。在倒數第二次的單人約會中，久候未至的中間人終於出現，是一位二十歲，有張天使臉孔的可愛女孩。她穿著梅遜(La Maisonette)女子學校的制服，帶給了我下一步行動的指示：我必須在當天六點到達波特耳(Portales)街著名的餐廳查士亨利(Chez Henri)，同時要帶一份水星(EI Mercurio)日報，以及一本漫畫。

由於路上有人舉行政治性示威，我超過了預定時間才到餐廳。發起示威的是一個新團體，他們繼承坎塞普遜的阿奇維多(Sebastián Acevedo)自我犧牲的精神，標榜非暴力的抗爭。警方以消防水柱攻擊大約兩百人的示威群眾，使他們渾身都濕透了。儘管如此，卻沒有一個人顯露退縮之意，他們全部背牆而立，詠唱愛的讚美詩。我在吧台旁坐下，一邊仍為剛才的一幕感動不已，一邊就拿出水星日報，翻到社論版。根據那名年輕學生的說法，自會有人過來問我：「你對社論特別有興趣嗎？」我要回答「是」，那個人接著會問為什麼，我就要說：「因為裡面談到了經濟，對我的工作很有幫助。」說完這話，我就要離開餐廳，到門口一部等我的車子上去。

在我開始第三次翻閱社論的時候，有一個人走過我後面，用肘部撞了我一下。「來了。」我心裡暗想。我回過頭，看到一個男的，三十歲左右，雙肩寬闊，正朝洗手間緩緩走去。我覺得他在暗示我跟他過去，不過我還是坐著沒動，畢竟他沒有說暗語。我不停的盯著洗手間，直到他出來，循著原路走回來。這回他又碰了我一下，就跟剛才一模一樣。現在我才清楚看到他的臉，他有一對受過傷的耳朵，雙唇發紫，眉上還有疤痕。

「喂，怎麼樣，」他說，「還好吧？」

「好呀，」我說，「很好。」

他在我旁邊的凳子坐下，語氣熟稔的開始攀談。「你還記得我吧！」

「當然記得。」我答道。

漫無目的閒聊一陣後，我放下報紙，擺出表情，非常明顯的要他傳出暗語。可是他卻視若無睹，繼續坐在那兒看著我。

「那麼，」他終於開口了，「請我喝杯咖啡吧？」

「有什麼問題，老兄，樂意之至。」

我點了兩杯咖啡，可是服務生只放了一杯在我面前。

「我點兩杯，」我告訴他，「還有一杯給這位先生。」

「沒問題，」他回答，「他的那杯馬上就來。」

可是咖啡一直沒來，怪的是那人好像也不在乎。我開始覺得事情不太平常，心裡慢慢緊張起來。這時他把手放到我肩膀上，說道：「我跟你說，其實你根本不記得我，對不對？」

我當場決定立刻離開那裡。

說完話，他拿出皮夾，取出一張泛黃的剪報，伸到我面前。

「這就是我。」他說。

這時我認出來了，他是前任拳王。他在聖地牙哥固然有過一段光榮紀錄，但是拿來跟因打拳而變得癡呆的個性相比，則又顯得不夠輝煌了。

我立刻要求買單，免得情況惡化下去，抽不了身。

「我的咖啡呢？」他問。

「到別處去喝，」我告訴他，「我會給你錢。」

「你要拿錢給我？少給我那些大便！你以為我給人撻倒就一文不名，沒有尊嚴了？」

他開始大吼大叫，四周目光紛紛向我們投注。我握住他那兩個打拳用的寬肘，用力擠壓。

算我運氣好，自父親那兒遺傳到了兩隻巨掌。

「你現在就給我安靜，聽懂沒有？」我說，直直看向他的雙眼。「一個字都不准再說。」

還好，他的脾氣來得快，去得也快。我匆忙付過帳，向外走進寒夜之中，叫了部計程車

回到旅館。我在桌上發現弗朗基留下的字條，上面寫道：我把你的行李拿去七二七了。這是我與弗朗基之間的秘密號碼，意指克萊蒙西亞的房子。他會這樣匆匆忙忙，拿著行李離開旅館，只說明了一個事實，包圍圈已經扣緊了。我衝出旅館，換了好幾次計程車，往不同方向轉來轉去，最後才轉到克萊蒙西亞的房子。她坐在電視前面，莊嚴平靜一如以往，正在看希區考克的電影。

出去或潛伏

據弗朗基告訴她，曾有幾名便衣到我們住的旅館，詢問我們的下落，並寫下我們登記的資料。弗朗基從門房那兒聽到這些消息後，一直裝得若無其事，當那是戒嚴時期的例行檢查，與他本身無關。他輕輕鬆鬆的到櫃檯結賬，請門房幫忙叫計程車去國際機場，還跟他握手道別，並留下一筆可觀的小費。門房卻不買賬。「我可以安排你住另一家旅館，他們絕對找不到你。」他建議道。當然了，弗朗基還是假裝聽不懂他說的那些話。

克萊蒙西亞早幫我打理出房間，還遣退了女僕和司機。一邊等我，她一邊就準備好了精緻的晚餐，有燭光，上等葡萄酒還有她最愛的布拉姆斯奏鳴曲。老年生活的淒清無味，使她不願輕易中斷我們的談話。她似乎無法相信，自己竟將多年生命浪費在教養孩子成爲資產階級上，在跟沒有大腦的太太們玩紙牌上，在鈎毛衣、看哭哭啼啼的連續劇上。活到七十歲，她終於找到了真正的職志，她要武裝戰鬥，要運籌帷幄，還要決戰千里。

「總比躺在牀上，等著五臟六腑慢慢腐爛要好。」她說。「我寧可走到大街上，帶著全副槍彈，跟警方大幹一場。」

隔天早上，弗朗基開著車子前來，那是他新租的車子，已不同於原來的那部。他自三處來源，得到緊急消息給我：「出去或潛伏。」後者意謂著停止活動，躲起來。但是那根本不是我一貫的做風。弗朗基同意我的想法，並設法弄到當天下午最後兩張前往蒙特維多的機票。

最後的一幕要落下了。前一天晚上，弗朗基就付清酬勞給第一組智利攝影人員，並囑咐他們代轉給其他組員。他同時將最後三卷影片，轉交反抗組織的密使，以便盡快運送出境。他們的效率極高，過了五天我到馬德里時，片子已經交到伊莉手上。後來據伊莉告訴我，帶影片到家裡的是一位年輕迷人的修女，像極了聖·特雷莎(雅維拉的 Santa Teresita de Jesus)。她不讓伊莉留她吃午飯，趕著要在中午之前，達成其他三個秘密任務，並在當天晚上回到智利。不久前，我偶然得知，她與我在聖地牙哥聖方濟各教堂接觸的修女，竟然是同一人。

其實我還不想離開智利。畢竟我們仍有一線希望，能夠詢問到電子將軍。那天早餐後，

我不願餐廳裡搭線沒有成功，從克萊蒙西亞家再度撥下電話。話筒裡傳出先前的女人聲音，要我兩小時後打回去，最後確認一次。我告訴自己，如果能在飛機起飛前得到正面答覆，我就要不計後果，留在聖地牙哥，否則，就飛往蒙特維多。這次採訪是否成功，已成了關乎榮譽的事；如果我不能將過去六周的禍福好惡，以這次勝利做個總結，對我將會是個深沈的打擊。

我再次撥下電話，答案依舊不變：「兩小時後再試試看。」從當時算起，到飛機起飛前，我還有兩次機會。克萊蒙西亞有一把公路綁匪用的手槍，是從前她丈夫放在枕頭底下，嚇阻小偷用的，她堅持要我們帶著上路。我們費盡唇舌，才讓她相信，這麼做對我們並沒有幫助。道別的時刻終於來臨，思及往後不再有冒險機會，也思及多日來的真摯情誼，她的雙眼溢滿了淚水。至於我，則把另外一個自己留在了智利。我只在一個小提箱裡，裝了一些私人必需品帶走。我把其餘物品悉數放進一個大衣箱，留給了克萊蒙西亞。那裡有英國西裝，還有繡有奇奇怪怪名字縮寫的襯衫，手繪圖案的意大利領帶，和奢華的配件。只要把這些東西全部組合起來，就成了我生平最憎恨的一種人。其實，那天我還是留了幾樣那個人的東西在身

邊，也就是我穿在身上的衣服。不過，三天後，等我到了里約熱內盧，這些東西就讓我刻意的給忘在旅館裡了。

接下去的兩個小時，我們上街買智利紀念品，以便帶給我的孩子，以及流放的朋友。我在離阿瑪斯廣場不遠的一家咖啡店裡，第三次撥下電話，答案依舊是：「兩小時後再試一次。」不過，這次回答的卻是個男人，他先告訴我暗語，然後說明，如果下次打去還是沒有肯定答覆，就必須等上兩個星期。我們決定出發去機場，到了那兒，我還有機會再打一次電話。

由於路上許多地方在修築工事，我們的車子走得非常不順暢。再加上路標模糊，岔路不斷，我們連著轉錯了好幾個彎。若是前往舊機場洛斯賽利洛(Los Cerrillos)，我和弗朗基都不會有困難的，但是前往普大宏機場就不然了。我們還來不及弄清方向，就陷進了一處糾結難解的工業區。我們不停打圈圈，想找一個出路，結果不知不覺又走錯路，進了一條單行道。這時來了一輛警方巡邏車，要我們把車子停到路邊去。

我走下車，想好好的解釋一番，結果弗朗基卻先開了口。他鼓起如簧之舌瞎編一番，聽得兩名警官迷迷糊糊，信以為真。他說我們來這兒和交通部長簽約，想要運用衛星，設立全

智利的交通控制網路。他同時誇張的強調，我們如果不能在半小時內趕到機場，搭機前往蒙特維多，整個計畫就可能要泡湯。眼見我們毫無方向感，不知如何開上高速公路，前往機場，兩名警察終於跳上自己的車，命令我們一路跟著。

有待完成的故事

我們跟著警車尖銳的警笛，閃爍的紅燈，以七十哩的時速，橫掃過街頭，到達機場。弗朗基首先衝向「赫茲」(Hertz)租車櫃檯還車子，我則向著電話跑去，第四次撥下電話，可是電話卻在講話中。我又試了兩次，終於通了，只不過接電話的是個女人。她對我的暗語毫無回應，還很不耐煩的掛上電話。我立刻再打回去，這次是那個男人的聲音了，他以同情的語調，緩緩的解釋：還要等兩個星期，才能有下次機會。當初他正是這麼警告我的。我掛上電話，心裡又生氣又失望，這時距飛機起飛還有半小時。

我和弗朗基協議，他留下來繼續和「赫茲」理清帳單，由我先通過過境室。萬一我遭到逮捕，他才能設法通知最高法院。不過到了最後一刻，我還是決定在過境室外，幾近空洞的迴廊上等他。過了很久，他還沒有來，照理說，事情早該辦完了。我站在走廊上，旁邊堆著我自己的手提箱，兩個衣箱，以及一大堆的禮物。眼看著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我感覺自己愈

來愈成爲衆人注目的焦點。不久，擴音器傳出女聲，最後一次催促飛往蒙特維多的旅客趕快上機。焦急無奈中，我提起弗朗基的衣箱，連同一大筆小費，交給一名搬運工，並告訴他：「把這箱子拿去『赫茲』櫃檯，告訴正在付帳的那個人，如果他再不立刻過來，我就要獨自登機了。」

「你自己過去或許更快。」他對我說。

我轉身要求航空公司櫃檯職員，「請等兩分鐘，我去叫我的朋友，他正在付租車的錢。」

「你只有十五分鐘。」她告訴我。

我再也不顧旁人異樣的目光，拔腳就向「赫茲」租車跑去。我心中太過著急，結果另一個我所該有的矜持自制，剎時都給丟到了九霄雲外。此刻的我，又回復爲原本那個衝動異常的電影導演。儘管我花了很多時間，不斷的苦心研究，不斷的細心模仿，不斷反覆痛苦的演練，到頭來，卻在不到兩分鐘的時間裡，全部化成了泡影。我找到弗朗基，他狀甚平靜，正在跟職員爭執匯率問題。

「搞什麼東西，」我對他說，「把錢付掉就是了。我到飛機上等你，我們只剩五分鐘了。」

我設法集中意志，讓自己冷靜下來，向著出境室窗口走去。檢查官先看過我的護照，再拿眼睛盯著我，我兩眼眨都不眨，直直的回看他。他又看看照片，看看我，我就一直回看著他。

「要去蒙特維多？」他問。

「去吃媽媽的好菜。」我回答。

瞥過一眼牆上的鐘，他說：「去蒙特維多的班機正在起飛。」經我堅持，他才查問航空公司職員，得到的答案是，只等我們上機，機門就要關了。我們還有兩分鐘。

檢查官在我的護照上蓋上戳印，微笑著說了聲：「旅途愉快。」

我才走過過境室，擴音器就大聲的廣播出我的名字。該來的還是來了，我心裡暗想，我一直以為只會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終於也發生在我身上了，而我能做的也只是一籌莫展，默然接受。只不過奇怪的是，這時我的心情反而輕鬆起來。後來我才發現，原來是弗朗基在廣播找我，他的登機證在我身上。我只有再跑向出口，要求在我護照上蓋戳印的官員讓我出去，把弗朗基給拖回來。

我們是最後登機的旅客，匆忙緊張的情形，當時我竟沒有想到，跟我十二年前去墨西哥，登機時的紊亂相比，根本如出一轍。我們在機上找到最後兩個位子，坐下的瞬間，我忽然體驗到全部行程中，最矛盾的一種心情；裡面有傷心，有激憤，有流亡在外不能名狀的痛苦，更有極大的滿足——畢竟所有參與冒險行動的人，都安全無恙的出來了。然而機上擴音器的廣播，卻使我重新跌回現實，並使我了解冒險還沒結束。廣播中說：「請所有旅客拿出機票接受檢查。」

兩名穿便服的檢查員隨即登機。他們可能是政府派來的，可能是警方人員，也可能只是航空公司的人。我搭機無數，卻是頭一遭遇到這種事，人都上機了，還得檢查機票，接下來，什麼事都可能發生的。我深感懊喪，只有求助於空中小姐。她有雙明亮碧綠的眼睛，正忙著分發糖果給乘客。

「小姐，這種檢查還真是少見呀？」我問道。

「該怎麼說呢，先生？這種事情也不是我們控制得了的。」

即使在這種緊張時刻，弗朗基仍不忘一貫的玩笑態度。他問空中小姐，是否準備在蒙特

維多過夜，她則回敬他道，那得問問她丈夫，也就是這飛機的副駕駛。至於我，則到達爆發的邊緣了，我覺得自己再也不能忍受恥辱，戴著另一人的假面生活。我只想等檢查的人過來，一股腦站起來，對著他大吼：「滾去死吧，我是電影導演密戈爾·立頓，我的父母是赫南和克莉絲汀娜。你們兩個沒有資格，任何人都沒有資格不讓我用自己的名字，以自己的面目，在我自己的國家生活！」可是一旦面對現實情況，我能做的，也只是隱身保護殼，搬出偽裝的面貌，盡量做出冷靜的表情，遞上機票了。檢查的人幾乎不看我的機票，還我機票時，他連正眼都沒瞧我一眼。

五分鐘後，我們飛臨安地斯山脈，夜色掩映下，只見雪地上妝點著一層粉紅的色彩。我心底明白得很，過去六周，並不像我原先預期的，成了我一生最足以自豪的日子，只因爲更重要的是，那六周早成了我一生最有意義的日子。在此同時，皮諾契特必將在左右跟隨下，踩著厚重的足音，拖著我們釘在他身後，長十萬五千呎的尾巴，穿過狹長而空曠的展覽室，踏上鋪著華麗地毯的樓梯。我想起了依蓮娜，心中只覺無盡的感激。

空中小姐閃著翡翠般的雙眼，爲我們端來登機後的雞尾酒。不等我們詢問，她就告訴我

們：「當局認為，有一名違法乘客溜了上來。」

我和弗朗基共同舉杯，向此人致意。

「兩個溜上機的人向你敬酒，乾杯！」我說。

〈附錄一〉

智利檔案：一九七〇～一九九〇

吳繼文／輯

一九七〇年

總統大選，無任一黨派的總統候選人獲過半數選票，由國會選出「人民團結」陣線(Unidad Popular)領袖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出任總統。阿葉德就任後大力推行國有化、農業改革與所得平均分配等社會主義經濟政策。

一九七一年

四月，「人民團結」陣線在自治市選舉中獲百分之五十選票，但經濟情況持續惡化、通貨膨脹失去控制，社會與政治陷入緊張狀態。

一九七三年

三月，所有反阿葉德政權的政黨合組的「民主同盟」(Confederación Democrática)在國會選舉中未獲三分之二以上的絕對多數票(只獲百分之五十六)，無法改變阿葉德的社會主義政策。九月十一日，在美國政府暗中支持下，上任不到一個月的陸軍總司令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發動政變，智利武裝部隊衝進摩尼達宮，推翻民選總統阿葉德的政府；阿葉德在摩尼達宮中彈死亡。政變之後，由陸、海、空三軍與警察部隊首腦組成四人軍事執政團，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實施戒嚴及宵禁，停止施行憲法並解散國會及左派政黨，開始大規模逮捕反對派人士。在這場政變及隨之而來的整肅中，有一千五百人喪生，數以萬計的反對派人士下獄，超過一萬名左派分子遭軍政府驅逐出境。

一九七四年

九月廿六日，前阿葉德政府的陸軍總司令普拉特斯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被汽車炸彈炸死。

一九七五年

皮諾契特開始任命芝加哥學派經濟學者規畫實施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外籍跨國企業嚴重打擊本地企業。

一九七六年

四月五日，美國卡特政府因智利違反人權，宣布取消軍售智利。九月廿六日，前阿葉德政府的外交部長萊特列爾及一名友人在美國華盛頓遭汽車炸彈炸死。十二月十七日，智利共黨領袖科瓦爾蘭獲釋流亡，以交換蘇聯釋放異議作家布卡夫斯基。

一九七七年

皮諾契特宣布無限期禁止所有政黨及工會活動，並加強出版品之管制。

一九七八年

一月四日，皮諾契特要求公民投票以反對聯合國通過譴責智利侵犯人權決議案。七月廿四日，空軍總司令古斯塔沃·雷(Gustavo Leigh)因反對皮諾契特獨裁遭革職逐出執政團。

一九八〇年

三月廿二日，前菲律賓總統馬可仕取消邀請皮諾契特順道訪問菲律賓。九月十一日，智利公民投票通過軍事政府制定的新憲法，獲百分之三十選票的反對派指責軍方舞弊；新憲法規定八一到八九年為軍政府還政於民的過渡階段，皮諾契特繼續擔任總統，並享有無限制的權力，過渡時期結束時，舉行全民投票以決定是否贊成軍政府提名的總統候選人，如多數公民不贊成，則必須在八九年底同時舉行總統和議會選舉，新總統將於九〇年三月十一日就職，民選議會亦同時成立開議。然而憲法亦保障皮諾契特不管屆時是否續任總統，都將繼續擔任陸軍總司令至一九九五年為止。

一九八一年

三月十一日，皮諾契特依新憲法宣誓就職為智利總統。

一九八三年

五月十一日，受經濟危機刺激，由工會主導爆發反軍方抗議，並持續至八四年。

一九八四年

十一月，皮諾契特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一九八五年

八月二日，警方涉嫌謀殺三名共產黨員，警政署長門多薩引咎辭職。八月廿五日，羅馬天主教號召全國左、中、右共十一個政黨簽署「國民協議」，要求民主、人權、新聞自由等措施，皮諾契特政府嚴厲加以指責，拒絕對話。十一月，美國新任駐智利大使伯納斯（Barry Barnes）赴任不久即會晤反對派領袖並公開敦促皮諾契特採取改革措施；美國對智利政策明顯改變。

一九八六年

三月，雷根政府一反過去態度，支持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決議，並公開指責智利的人權紀錄；七月三十日，雷根政府美洲事務助理國務卿在國會表示除非智利人權紀錄改善，否則他反對貸款給智利。九月七日，羅德里格茲（Manuel Rodríguez）領導的「愛國陣線」左派游

擊隊行刺皮諾契特總統未遂，總統的五名貼身侍衛喪生，全國再度進入緊急狀態。九月十八日智利獨立紀念日，曾發動八五年「國民協議」的聖地牙哥紅衣主教佛雷斯諾（Juan Francisco Fresno）打破傳統，拒絕主持所有政要均出席的彌撒，以抗議三名法國神父被驅逐出境。

十一月廿八日，智利內政部在法耳巴拉索（Valparaíso）沒收並銷毀一萬五千冊西班牙文版《智利秘密行動》。

一九八七年

年初，解除緊急狀態及首都聖地牙哥施行十三年之久的宵禁。二月廿五日，開放組黨。四月，教皇訪問智利，皮諾契特在教會呼籲下陸續允許兩千名流亡國外的政治犯返國。

一九八八年

八月卅日，軍人執政團提名皮諾契特為十月總統大選的唯一候選人。九月一日，皮諾契特允許仍放逐在外的四三〇名反對人士返國。九月廿四日，阿葉德遺孀布西返回智利。十月五日公民複決反對皮諾契特候選。

一九八九年

十二月，艾爾溫當選智利新任總統，任期四年。

一九九〇年

三月十一日，皮諾契特將政權交給文人總統艾爾溫，但仍續任三軍統帥，其用以鎮壓異己的中央情報局在被撤銷前銷毀全部檔案。